

# 靜 宜 人 文 社 會 學 報



西元2025年5月  
第十八卷第二期

## 研究論文

■不只是回到學校：社會化理論下的中輟輔導新思維

─蔡心媛

■明帝國的「標準化」意欲與落實情況之初探─以

《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為中心 洪長成

■原住民族傳統飲食文化價值與現代食安規範之調和

─許博偉、潘穎、楊品裕、邱惠娟、許德訓

■青少年偏差行為防治教育與輔導策略之研究

─楊安仁、潘孝勤、郭俊巖、莊慧民、胡宜芳

## 研究紀要

■以繪圖課程共創社區新景觀之問題本位學習實踐

研究 徐雁、汪淑珍、廖啓旭



#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

Providence Studies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第十八卷第二期 2025 年 5 月

## ◎ 研究論文

不只是回到學校：社會化理論下的中輟輔導新思維

/ 蔡心媛

明帝國的「標準化」意欲與落實情況之初探——以《大明玄教立  
成齋醮儀範》為中心

/ 洪長成

原住民族傳統飲食文化價值與現代食安規範之調和

/ 許博偉、潘 穎、

楊品裕、邱惠娟、

許德訓

青少年偏差行為防治教育與輔導策略之研究

/ 楊安仁、潘孝勤、

郭俊巖、莊慧民、

胡宜芳

## ◎ 研究紀要

以AI繪圖課程共創社區新景觀之問題本位學習實踐研究

/ 徐 雁、汪淑珍、廖啓旭

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出版





#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 林思伶（靜宜大學校長）

總編輯 賴松輝（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

執行編輯 楊安仁（靜宜大學社會企業與文化創意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編輯委員 王香蘋（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教授）

何華欽（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李明穎（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汪淑珍（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胡憶蓓（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劉鶴群（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副教授）

賴麗娟（靜宜大學生態人文學系副教授）

出版者 靜宜大學

地 址 (43301)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7段200號

電 話 04-26328001 # 17001~17002

E-mail pu20600@pu.edu.tw

網 址 <http://www.huso.pu.edu.tw/puchess/index.htm>

本期售價：新台幣600 元；美金20 元整。

ISSN 2223-7461



# 目 錄

---

## 研究論文

不只是回到學校：社會化理論下的中輟輔導新思維……………01

明帝國的「標準化」意欲與落實情況之初探—以《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為中心……………25

原住民族傳統飲食文化價值與現代食安規範之調和……………59

青少年偏差行為防治教育與輔導策略之研究……………77

## 研究紀要

以AI繪圖課程共創社區新景觀之問題本位學習實踐研究 ……123



# Providence Studies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18, No.2, 2025

## Research Articles

Not Just Returning to School: New Perspectives on Dropout Counseling Under Socialization Theory.....01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ten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rdization" in the Ming Empire—Taking Da Ming Xuanjiao Licheng Zhaijiao Yifan (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 as the Center of Discussion.....25

The Harmonization of Indigenous Traditional Culinary Values with Modern Food Safety Regulations.....59

A Study on the Prevention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Strategies for Adolescent Deviant Behavior.....77

## Research Note

A Practical Study on Problem-Based Learning to Create a New Community Landscape Using AI Drawing Courses.....123





## 研究論文

# 不只是回到學校：社會化理論下的中輟輔導新 思維<sup>\*</sup>

蔡心媛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候選人

---

收稿日期：2024 年 10 月 01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5 年 02 月 19 日。

<sup>\*</sup>本文通訊作者為蔡心媛，E-mail：hyhy1012@hotmail.com。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正意見。

## 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社會化理論在中輟輔導工作中的應用價值，並提出新的實務思維。近年來，中輟問題呈現新的樣態，已不僅是行為偏差或逃學，更多出現拒學、身心症狀或受疫情影響而難以持續就學等複雜情形。傳統偏重個案工作的輔導方式，往往將回歸學校視為唯一目標，難以完全回應中輟生的需求。本文以教育社會學中的社會化理論為基礎，結合實務工作經驗，從社會規範內化、角色能力發展與社會關係建立三個面向，分析學校教育的社會化困境。透過社區師傅方案的實務經驗，說明如何透過多元社會化情境的營造、角色轉換的促進，以及社會連結網絡的重構，協助中輟生重建自我認同與社會連結。研究發現，當中輟生能在社會中找到適合的角色，建立正向的互動經驗，往往能自然發展出返回教育系統或尋找其他適性發展管道的動機。本文期待透過社會化理論的新視角，開創中輟輔導工作的多元可能性，同時深化學校社會工作的專業內涵。

**關鍵詞：**社會化理論、中輟輔導、學校社會工作、多元社會化情境

# **Not Just Returning to School: New Perspectives on Dropout Counseling Under Socialization Theory**

**Hsin-Yuan Tsai**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unghai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in dropout counseling work and propose new practical approaches. In recent years, dropout issues have presented new patterns, no longer limited to behavioral problems or truancy, but increasingly manifesting as school refusal, psychosomatic symptoms, and other complex situations. Traditional counseling approaches that emphasize casework often view returning to school as the only goal, which cannot fully address the needs of dropout students. Based on socialization theory in educational sociology and practical work experienc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ocialization challenges in school edu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internalization of social norms, development of role competency, and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Through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a community mentorship program, the article explains how to assist dropout students in rebuilding self-identity and social connections through creating diverse socialization contexts, promoting role transitions, and reconstructing social connection network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when dropout students can find suitable roles in society and establish positive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they often naturally develop motivation to return to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r seek other appropriate developmental channels. This article hopes to create diverse possibilities for dropout counseling work through the new perspective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while deepening the professional content of school social work.

**Keywords :** socialization theory, dropout counseling, school social work, diverse socialization contexts

## 壹、前言

近年來，中輟問題呈現新的樣態，引發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相較於過去以行為偏差或逃學為主的中輟類型，當前的中輟生更多出現拒學、身心症狀，或受疫情影響而難以持續就學的情形。洪美鈴、王麗斐、林正昌與張在蓓（2020）指出，疫情後學生不到校的原因已不再單純是因為討厭或抗拒到校，而是源於線上教學模式帶來的新型態學習觀念轉變，使得中輟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和隱蔽。中輟問題的複雜性，正如周憐嫻（2000）所指出輟學率與犯罪率乃同樣肇因於不良的社會結構，兩者存在的只是共變關係，並不具因果關係。鄧煌發（2000）進一步強調，中輟行為是個人、家庭及社會等多重因素交互影響的結果。

面對這樣複雜的中輟樣態，當前的輔導工作仍偏重個案工作取向。程秋梅與陳毓文（2001）的研究發現，傳統的中輟復學模式著重在改善個人的行為問題或情緒困擾，或是透過資源連結來處理家庭功能不足的問題。這種個人取向的輔導方式雖然能處理部分學生的即時困境，但難以完全回應中輟生的需求，更遑論處理其背後的結構性問題。張雄盛與張世雄（2019）建議應將中輟生視為不同生命發展路徑之群體，而非偏離常規的問題個案，這提醒我們需要採取更全面的視角來理解與處理中輟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場域中社會化功能的弱化已成為全球教育界關注的議題。Freire（1970）首先發難，揭露學校已逐漸被簡化為知識傳播的機構，忽視了學生的全面發展需求；Goodlad（1984）的實證研究則具體呈現了學校如何因應學術壓力而犧牲社會化教育的現象。Apple（2011）更進一步指出，當代教育改革過度強調學術成就和標準化測驗，使學校更像是培養經濟競爭力的場所，而非社會化的培育地。Ballantine 與 Spade（2011）則從教育社會學的視角，提醒我們學校的社會化功能正被學術成就的追求所掩蓋。在台灣，學校社會化功能弱化的現象同樣值得關注。近十年來，隨著教育改革重點轉向學習成效和升學表現，學校作為社會化場域的討論逐漸邊緣化。然而，中輟問題的癥結恰



恰在於主流教育未能滿足學生的社會化需求，導致其透過中輟來脫離學生角色（Alexander, Entwisle, Kabbani, 2001）。Grusec 與 Hastings（2014）指出，社會化是個人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學習社會文化並內化為個人行為模式的過程。因此，中輟輔導的關鍵在於營造有利於學生再社會化的機會，重新思考如何協助中輟生與教育系統和社會建立連結。

在此脈絡下，學校社工師的角色顯得特別重要。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11 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設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其中學校社工師主要負責處理學生家庭、社會環境與教育資源之議題。在中輟輔導工作中，學校社工師的法定職責包括：執行中輟通報與追蹤、進行家庭訪視評估、連結社區資源、提供個案管理服務，以及建立跨專業合作網絡。相較於其他教育人員，學校社工師具有社會工作專業的系統觀點，能同時關注個人與環境的互動，並具備運用社區資源的專業知能。這樣的專業定位和工作職責，使得學校社工師得以從第一線觀察到學校教育中社會化功能的弱化及其對中輟問題的影響。從實務工作經驗來看，社會化理論不僅沒有過時，反而能為當前的中輟輔導工作提供新的思考方向。社會化不僅是個體成長和融入社會的關鍵歷程，也是社會工作與教育專業之間共通的基礎觀點。重新檢視社會化理論在中輟輔導工作中的應用價值與策略，不僅能深化學校社會工作的專業內涵，更能為教育體系提供重要的反思與改進方向。

本文立基於研究者十餘年學校社會工作實務經驗，從教育社會學的視角，探討社會化理論在中輟輔導工作中的應用價值與實務策略。透過在第一線服務的觀察與反思，社會化理論不僅能為理解中輟現象提供更完整的分析框架，更能開展多元的實務策略。本文首先介紹社會化理論的內涵，並探討其與國中生發展特點的關聯，作為實務工作的理論基礎。其次，討論學校是國中階段作為關鍵社會化場域的重要性，剖析主流教育體制的侷限及其對中輟生社會化的影響。最後，結合實務工作經驗，闡明社會化理論在中輟輔導中的具體應用，提出學校社工師促進中輟生再社會化的多元實務策略。雖然社會化理論無法涵蓋

中輟問題的所有面向，但研究者期望透過理論與實務的對話，為當前的中輟輔導工作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同時促進社會工作與教育專業的交流合作。

## 貳、教育社會學視角下的社會化

### 一、社會化理論的發展與當代教育視角

社會化理論的發展可追溯至 20 世紀初期的社會學。Durkheim (1956) 首先從社會學的角度提出，社會化是新一代被有系統地培養成為社會成員的過程。此觀點強調教育在社會化中的核心地位，為後續教育社會學的發展奠定基礎。Cooley (1902) 則從社會心理學的視角，提出「鏡中自我」的概念，說明個體如何透過與他人的互動建構自我認同，開啟了對社會化互動面向的探討。隨著理論的發展，社會化的概念內涵不斷深化。Berger 與 Luckmann (1966) 將社會化區分為初級社會化與次級社會化，強調制度化場域（如學校）在次級社會化中的重要性。這個觀點至今仍深刻影響著教育社會學對學校功能的理解。而 Bourdieu (1977) 則從文化再製的角度，揭示了社會化過程中權力關係的運作，指出教育社會化可能強化社會不平等的面向。這種對社會化過程的批判性觀察，為後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在這一脈絡下，當代教育社會學對社會化的理解轉向三個核心面向：社會規範的內化、角色能力的發展，以及社會關係的建立（陳奎熹，2021）。社會規範內化指個體學習並遵循社會認可的價值觀與行為準則；角色能力發展涉及個體對社會角色的認知、學習與實踐；社會關係建立則關注個體如何與他人互動、發展社會支持系統。這些向度理解特別適用於分析中輟現象，因為學齡兒童及青少年的社會化危機往往反映了這三個面向的斷裂，而有效的教育介入必須同時關注這些層面的重建。特別是在數位科技日益滲透日常生活的情況下，社會化的場域與媒介出現質變，使原本依賴實體場域（如學校、家庭、社區）的社會化過程變得更加複雜，也更加碎片化。

此外，社會化理論的發展也展現出其多重內涵：一方面，它透過制度化結構與過程，使個體逐步學習並內化社會認可的價值觀與行為準則，這展現了社會化的規範性；另一方面，它提供個體發展自我、培養能力與形塑身份認同的機會，展現其發展性（時蓉華，1996；張春興，1987；葉至誠，2022）。換句話說，社會化的過程不僅涉及規範的內化，更反映在個體如何在不同社會環境中逐步適應與調整。在青少年時期，特別是國中階段，社會化的適應與發展過程更顯複雜，需在學校、家庭、同儕等多重場域中建構自我，既要回應制度規範，又要尋求自主發展，呈現出調適與抗衡的複雜互動。因此，誠如陳奎熹（2021）所指之社會化面向，中輟輔導工作需集中關注三個核心面向：（1）在社會規範內化方面，透過正式輔導與非正式互動，協助學生理解並接納社會期待；（2）在角色能力發展上，透過不同學習情境，如班級活動、社團參與，提供學生練習與體驗的機會；（3）在社會關係建立方面，透過家庭訪視與社區活動，協助學生與同儕、師長重建連結，拓展支持網絡。這種多面向的輔導策略，有助於中輟生在重返校園的過程中，逐步重建自我認同，實現社會化的目標。

## 二、教育場域中的社會化機制

在從教育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學校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遞場域，更是影響學生社會行為、價值觀與人際互動的重要環境（陳奎熹，2021）。謝高橋（1982）認為學校應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教育活動來促進學生社會化。正式教育包含課程學習、班級活動等制度化的安排；非正式教育則涉及師生互動、同儕關係等日常經驗。而這兩種途徑的有效整合，對學生的社會化歷程具有關鍵影響（謝高橋，1982）。因此，教育場域中的社會化機制涉及複雜的制度運作與互動歷程。Wang and Eccles（2012）研究發現，學校中的社會支持系統，包括教師支持、同儕接納和家長參與，對學生的學習投入與學校適應具有顯著影響。這些社會支持不僅提升學生的行為投入（behavioral engagement），還影響其情感投入（emotional engagement）與認知投入（cognitive engagement）；若老師能夠提供更多情感支持，同儕之間能夠建立包容與互助的關係，家長能夠積極參與學生的學習歷程，那麼學生的學校適應將會更為順利（Wang & Eccles, 2012）。

反之，若這些支持系統薄弱，學生可能更容易出現學業低落、人際疏離甚至中輟等問題。換句話說，學校的社會化機制不只關注制度安排，還需要透過具體的支持系統，來塑造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校歸屬感。

進一步說，社會化機制是透過多元途徑運作的。Plenty 與 Jonsson (2017) 研究青少年同儕互動時發現，移民學生的社會融入程度受到班級內移民比例的影響，班級環境與同儕的接納度將影響移民背景學生的社會地位與歸屬感，間接影響適應結果。學校環境本身就具有社會結構性的影響力，不同學生群體的組成與互動方式，將決定個體能否順利融入校園生活，因此學校如何營造包容性環境，減少特定群體的邊緣化，將成為影響學校社會化成效的重要因素 (Plenty & Jonsson, 2017)。換言之，學生在學校適應的過程中，不只是被動接受社會規範或文化，而是透過與同儕、教師的持續互動來建構自身的社會角色與適應策略。因此，學校社會化機制的核心在於「互動關係」，而非單向的制度影響，不能僅靠制度性的約束來要求學生的社會適應。除了學校場域外，Kim 與 Page (2013) 研究發現學生與父母的情感連結品質，以及其情緒調節能力，與學校行為問題密切相關。從這個角度來說，學校適應問題除了校內環境，還受到學生家庭情境與個人心理調適能力的影響。如果學生在家庭中缺乏安全感，無法有效調節自身情緒，那麼即使學校提供了適當的支持，學生仍可能因為內在因素而難以融入校園。因此，在思考學校社會化機制時，不能忽視家庭系統的作用。學校與家庭應該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例如透過親師溝通、家庭訪視等方式，來提升學生的情感支持系統，進而促進其學校適應。

中輟往往被視為學生個人的學業失敗或挫折，但根據前述研究所述，學校教育若只強調學業成就，忽視了學生的社會與情感發展、忽視學校裡的社會結構，將可能使學生在高壓環境下產生學校疏離感，導致中輟。學校是青少年重要的社會化場域，其功能不僅限於學業成就的提升，更包括人格發展與社會適應能力的培養 (張春興，1987)。換言之，學校的社會化機制不應該只關注個別學生的表現，而應該更全面檢視學校環境、社會支持系統與家庭背景如何共同影響學生的發展，不僅能預防中輟問題的發生，更能為已經中輟的學生提供

重返校園的支持性環境。這樣的觀點也提醒，教育政策與實務應更強調跨領域合作，包括社會工作、心理輔導、家庭教育等提供學生更全面的支援，確保學校能成為真正促進個體成長的社會化場域。

### 三、社會化的類型與教育實踐

在教育社會學領域，社會化可依其性質分為五種類型：早期社會化、預期社會化、發展社會化、反向社會化，以及再社會化（宋尚倫，1981；時蓉華，1996）。其中發展社會化、反向社會化與再社會化三種類型，對於中輟輔導工作有提醒作用。發展社會化是學校教育的主要功能，著重於協助學生適應新的角色要求、培養符合社會期待的行為模式。然而，當這種主流的社會化管道無法回應學生需求時，學生可能轉向負向的次文化尋求認同（Baldwin, 1897），產生反向社會化。這意味著，所謂的偏差或問題行為，往往是反映主流教育體系在社會化功能上的侷限，而非單純的個人適應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再社會化便顯得特別重要，因為它強調個體如何在既有經驗的基礎上，重新建構與社會的連結，發展新的社會參與途徑和角色認同。對中輟輔導而言，這三種社會化類型的交互理解，提醒不能只著重於發展社會化的矯正功能，更要理解反向社會化背後的結構性因素，並透過再社會化的過程，協助中輟生找到適合自己的社會參與方式，而不是單純要求其符合既定的教育規範。

Wentzel 與 Muenks（2016）的研究指出，在教育實踐中，不同類型的社會化往往同時進行且相互影響。例如，在同儕互動中，學生既經歷發展社會化以培養新的社交技能，同時也透過團體認同形成預期社會化，學習理解並準備未來的社會角色，當學生能在正向的同儕關係中獲得支持時，不僅有助於其當下的學習動機與社會適應，更能促進其對未來社會角色的正向期待。在教育實踐層面，Hallinan（1992）透過對中學教育的研究發現，學校的組織安排會影響不同類型社會化的實現程度。例如，異質性的分組方式不僅有助於發展社會化，促進學生學習與不同背景者互動，也能預防負向的反向社會化。Hallinan 更強調，當學校能夠提供多元的社會參與機會，並在制度設計上重視學生的主體性時，更有助於學生發展積極的社會角色認同。Baumrind（2013）的研究提醒我們，



任何形式的社會化都需要在支持與自主之間取得平衡。她發現，當教育環境能夠提供明確的期待同時尊重個體的自主性時，最能促進正向的社會化結果。對於已經離開主流教育體系的中輟生而言，再社會化的過程應被視為協助個體在新的生命階段，發展對自我與社會的新理解，而非重返校園達成不中輟之目的。這提醒進行中輟輔導工作時，必須超越單純的行為矯正或學業補救，而是要從更宏觀的社會化視角，協助中輟生重新建構其社會參與的途徑。綜上所述，在面對中輟議題時，這種多元的理解提醒我們：教育與中輟輔導的目標不僅是知識的傳遞或行為的規範，更是要協助每個個體找到適合的社會化途徑，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社會參與方式。Allen-Meares（2015）強調，學校社會工作者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關鍵的橋樑角色，不僅要協助中輟生重建學習信心，更要促進其與各種社會系統的正向連結。這樣的理論基礎，將有助於我們在下一章探討學校教育在促進學生社會化方面所面臨的具體困境。

### 參、學校教育的社會化困境

依據教育社會學的觀點，學校是青少年社會化的主要場域。作為教育活動的核心場所，學校應透過知識傳授、行為規範和價值觀塑造，引導學生內化社會認可的自我概念和行為模式（Erikson, 1950；陳奎熹，2021）。而學生的實際經驗，尤其是來自第一線的觀察，往往能最真實地揭示教育體制的問題。李瑞霖、陳惠平與廖宥甯（2022）針對全台高中生進行的大規模問卷調查，深入探討學生在課本編排、學習歷程檔案、自主學習、升學方式及素養等五大面向的實際體驗，清楚揭示了當前教育體制在社會規範內化、角色能力發展、社會關係建立等三個面向上的問題，茲論述如下：

#### 一、社會規範內化的困境

學校應該是學生學習社會規範、培養價值觀的重要場域，但學生的實際經驗反映了其中的侷限。如報告中指出：「在這個具有標準答案的考試制度下，就算把題目改成手寫題，學生也無法真實說出自己的看法。我們所寫出來的每

個字都必須要切合標準答案，否則皆為錯誤答案。」（李瑞霖等人，2022，頁19）。這種以考試為導向的教育體系，使學校淪為單向傳遞與篩選的工具，而非社會化的有機場域。從教育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這不僅阻礙了學生對社會價值的深層理解，更違背了教育社會化培養獨立思考、價值判斷能力的核心目標（Dupper, 2003）。現今對中輟問題的理解與處遇多從「問題—原因—解決—預防」的角度出發，過度聚焦在個人與家庭層面，而忽略了教育系統的結構性影響（張雄盛、張世雄，2019）。

## 二、角色能力發展的限制

當前的教育體制對學生角色發展形成嚴重限制。在學業與多元學習的時間分配上，學生面臨無法兼顧的困境。每週高達八小時的上課時間，加上考試導向的教學方式，使學生被迫將大部分心力投注在考試準備上。然而每個學生都有其獨特的特質和需求，若無法提供多元的角色學習途徑，容易使部分學生在社會化過程中遭遇挫折。特別是處於身份認同關鍵期的國中生，學校教育在培養學生角色能力時，常採用標準化的模式，缺乏對個別差異的包容，容易產生抗拒與疏離，進而影響其角色認同的發展。

## 三、社會關係建立的障礙

在社會關係的建立方面，學校教育往往忽視了關係網絡的複雜性。以中輟問題為例，長期以來，學校傾向將中輟歸因於個人的不適應或違規行為，忽視了背後的社會結構因素。這種簡化的理解，導致對中輟生的標籤化，反而阻礙了他們與學校系統建立正向連結的可能。雖然教育部門推出了中途班、實驗教育等措施，但這些方案仍將中輟視為個人適應問題，在實施上也面臨資源不足、門檻過高等困境（張雄盛、張世雄，2019）。

從教育社會學的視角來看，上述三個面向的困境反映了學校教育在實踐社會化功能時的結構性問題。這些困境往往導致部分學生無法在學校體制中獲得成功的社會化經驗。由於單一的學習方式影響了知識技能的傳遞與同儕互動，進而造成學生在團體中建立和維持關係的困難。在缺乏歸屬感、面臨排斥與孤

立的狀態下，學生更難以獲得支持性的社會環境，最終可能導致學校疏離，無法完成社會化的過程。因此，重新思考學校教育的社會化功能，需要更宏觀的教育社會學視野，在個體和環境層面共同努力，才能使學校成為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和社會適應的有效場域。

### **肆、中輟輔導實務案例—社區師傅方案**

承前述社會化理論的討論，以及社會工作者於實務工作中對中輟生社會化需求的觀察，研究者在任職學校社工師時於國中推動的社區師傅方案為例，說明如何將社會化理論應用於具體實務工作。正如前述分析所示，個別輔導方式能處理的是部分學生的即時困境，但難以完全回應中輟生的需求與結構性問題，在滿足其社會化需求仍有其侷限，方案形式的介入有利於營造結構性的學習情境，透過社區網絡的整合，建立其社會化支持系統。

故本方案有別於過往偏重職涯探索或技能訓練的能力取向，以社會化理論作為基礎，強調透過角色體驗來建立自我認同、內化社會規範並重建社會連結。本方案透過邀請社區商店經營者擔任師傅，中輟生擔任學徒的方式，創造社會化情境。在實務推動過程中，方案著重於透過真實的職場互動，協助學生自然內化社會規範；透過師徒關係的建立，促進學生發展新的角色認同；透過社區參與，幫助學生重建社會連結網絡等三大面向。本段以研究者實際執行之方案設計、實務案例、困境反思說明之。

#### **一、社區師傅方案的理論設計與執行**

##### **（一）方案目的與內涵**

##### **1. 社會化支持系統的建構**

社區師傅方案其目的在建立多面向的社會化支持系統。社工師作為方案的核心協調者，負責串連各個支持系統，包括學校、家庭及社區資源。在學校方面，社工師與教師密切合作，關注學生的社會化發展歷程，

並適時調整課業要求；在家庭方面，透過定期會談與家訪，強化家長對子女發展的支持功能；在社區系統方面，則致力於開發並維繫適合的商家資源，建立穩定的師徒關係。透過多重系統的整合，為中輟生提供多元的支持，創造有利於其社會化的環境脈絡。

## 2. 師徒互動的設計原則

方案強調師徒互動的品質，採用「做中學」的互動模式，強調在真實情境中的觀察學習與實踐。師傅們採用示範、共同操作、指導等不同層次的教學方式。師傅不只展示技術操作，更著重傳達職業倫理與工作態度；透過共同完成工作任務，創造自然的互動學習機會；逐步放權讓學生獨立作業，培養其自主性。前述這種漸進式的互動設計，符合中輟生的心理特質與學習需求。

## 3. 階段性的介入策略

方案採用階段性的介入策略，包含前置、適應、實作和統整四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特定的社會化目標與介入重點，形成一個完整的社會化歷程。階段性的規劃係回應社會化理論中關於角色學習與認同發展的觀點，透過逐步深化的學習經驗，幫助中輟生重建自我認同，發展社會適應能力。

# (二) 方案執行階段

## 1. 前置階段

本階段有三項主要工作，首先是透過會談了解中輟生的興趣傾向與復學意願，評估其參與方案的準備程度。這個評估過程不只是單向的訊息蒐集，更需要提升參與動機，透過對話幫助學生發掘潛能與可能性；其次與家長和教師溝通說明方案目的與規劃，同時也了解各方對學生的期待與顧慮，取得支持與合作承諾；再來是尋找合適的社區商家，評估其教學意願、工作環境安全，以及是否能提供適切的學習內容。這個階

段的社會化目標在於為中輟生建立適配的學習情境，開始重建中輟生與社會系統的連結，因此在與中輟生的會談過程中，需開始進行初步的社會化工作，包括協助其思考社會角色、認識職場文化，以及建立對未來的正向期待。

## 2. 適應階段

進入本階段後，師傅需根據學生的興趣和能力，規劃循序漸進的工作任務。這個階段以簡單基礎的工作任務為主，例如在咖啡店的環境整理、美髮店的工具準備等，但這些看似簡單的任務實際上是培養工作態度與建立人際互動的重要基礎。社工師需關注學生的適應狀況，協助其克服初期的焦慮與不適，包括出席情形、工作投入度，以及與師傅的互動品質。當學生在執行這些基礎工作時展現出穩定性後，便能逐步安排更具挑戰性的任務，以提升其能力感。

## 3. 實作階段

在確認學生已建立基本工作習慣後，師傅開始計畫性教導專業技能，讓學生逐步承擔更多責任。這個階段須強化學生的自主性發展，鼓勵其在工作中主動發現問題、尋求解決方案。社工師需觀察學生的角色轉換過程，包括工作態度的改變、人際互動的提升，以及對職場文化的適應程度。這個階段的社會化重點在於透過具體的工作成就，強化學生的自我效能感與自我認同。

## 4. 統整階段

本階段著重學習經驗的統整與未來發展的規劃。社工師需協助學生回顧整個學習歷程，肯定其進步，同時也引導其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本階段需評估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能夠逐步重返校園或是發展其他適性的學習途徑。師傅在這個階段的角色也從指導者轉變為支持者，提供



未來生涯發展的建議與鼓勵。這個階段的社會化重點在於強化學生的自我認同，以及與社會的連結。

## 二、社區師傅方案的實務案例

透過方案執行，研究者觀察到不同中輟生在社區師傅方案中展現出獨特的社會化歷程。以下透過兩個典型案例簡要說明方案如何回應不同中輟生的需求，並促進其社會化發展。

### 案例一：從缺乏動機到建立自信的咖啡學徒

小明（化名）是一位就讀國三的學生，因長期對學校課程缺乏興趣，拒學在家而導致中輟。研究者與小明會談時發現他對咖啡有興趣，經過與學校、家長溝通並取得同意後，開始尋找合適的社區商家。在與咖啡店長初次會面時，小明表現得較為退縮，但並未抗拒與店長的討論，故雙方約定後續時間，師徒關係也得到確認。在剛開始，小明常常找藉口遲到或早退，師傅稍作策略調整，讓小明先體驗咖啡沖煮的過程，並在過程中解說不同步驟的意義，有效提高小明的動機，出席較為穩定，但在被指派清潔、整理等基礎工作時，他又開始出現抗拒，認為這些工作「很無聊」。經過研究者、師傅與小明的討論後，決定在基礎工作之外，讓他開始學習簡單的沖煮技巧，同時說明環境清潔對咖啡品質的影響。

在反覆練習的過程中，小明漸漸開始在沖煮咖啡時注意細節，例如水溫的控制、沖煮時間的掌握等。雖然做出的咖啡品質時好時壞，但他能接受失敗，並主動詢問改善的做法。到後期，他已經能在例行的清潔工作之外，完成基本的餐飲服務，顧客的正向回饋也增加了小明的信心。歷時半年的時間，小明在咖啡店中展現出不同於校園的一面，雖然仍有偶爾遲到或工作怠惰的情況，但他開始對自己的表現有所要求，也會在導師來訪時主動分享工作經驗。後續小明開始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願意討論以返校上課的可能性。

從社會化的觀點評估，小明在社會規範內化方面，從最初經常遲到早退，到後來能大致遵守工作時間，雖然還不夠穩定，但已經展現出對規範的基本認知。在角色能力發展上，除了掌握基本的清潔與簡單沖煮技巧外，也開始學會觀察顧客需求，展現服務意識。在社會關係的建立方面，在與同事的互動雖仍較為被動，但從顧客端感受到成就感，進而提升互動信心，乃至後期主動與導師重建關係，這些歷程最終促使他開啟討論重返校園的可能性。

#### 案例二：從被動逃避到願意面對的麵包學徒

小華（化名）為一名國三學生，因學習障礙，在學校學習成就低落、人際關係不佳而感到挫折，為逃避挫敗感導致中輟。研究者在與小華會談時，談到對於其他學習方式的可能性，小華不排斥，研究者經過討論與評估後，開始尋找適合的店家，最後與住家附近的麵包店老闆（師傅）取得共識，讓小華開始到店裡學習。

研究者觀察到小華在店裡顯得畏縮，對於任何指令都只是點頭，卻不敢實際嘗試。與師傅討論後，從最基礎的材料認識開始，讓小華觸摸、聞香與品嚐不同的麵粉。在操作時，小華因為無法準確掌握重量而感到挫折，有時是忘記放酵母，有時是發酵時間抓不準，導致多次失敗的成果，甚至出現想要放棄的念頭。研究者與師傅討論後，設計了視覺化的輔助工具，如標示刻度的量杯，讓小華能更容易理解份量的概念。慢慢地，小華在師傅的協助下找到較適合自己學習的方式，也感受到師傅的信任，不同於過去在學校遇到挫折就退縮的反應，他開始學會詢問原因。特別是在幾次麵包發酵失敗後，他開始會觀察並記住自己製作過程中的細節，興趣與專注力皆有提升。學期結束前表達了想要繼續學習烘焙的想法，他開始蒐集職業學校烘焙科的資訊。

從社會化歷程來看，小華的轉變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但正是在克服這些挫折的過程中展現出社會化的意義。在社會規範內化方面，他從最初對規範的抗拒，經歷了理解、接受到願意遵守的歷程。例如在食品衛生觀念上，他一開始常抱怨戴手套、帽子很麻煩，但在理解這些規範的重要性後開始能自主遵守。

在角色能力的發展上，雖然過程緩慢充滿挫折，但他從最初需要完全依賴指導或環境協助，到後來能主動觀察並說明原因，表現出面對困難的態度轉變。在社會關係的建立方面，起初他常因挫折而退縮，但在師傅的耐心陪伴下，慢慢學會表達自己的困難，也能接受他人的建議。

值得探討的是，這些在方案中累積的正向經驗，雖然沒有直接促使小華重返原有教育體制，但仍幫助他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向。社會化的成功不應該以回歸原有教育體制為唯一標準，更重要的是協助中輟生在面對挫折時培養韌性，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路徑，進而建立長期的社會連結。

### 三、社會化理論在社區師傅方案中的應用

從社區師傅方案的執行經驗中，研究者從多元社會化情境的營造、角色轉換與重構的促進，以及社會連結網絡的建立等三個面向，反思社會化理論在中輟輔導工作的應用與價值，以及對中輟輔導工作的啟發。

#### （一）多元社會化情境的重要性

在學校體制中，社會化往往被簡化為規範遵守與角色適應，而忽略了社會化的發展性面向。學校教育主要透過課本閱讀、考試等認知學習形式進行，對於某些學生而言，這種單一的學習管道可能造成極大的挫折與限制。然而，在職場這樣的非正式教育場域中，社會化得以透過多元的媒介激發出豐富的可能性。無論是透過咖啡沖煮、麵包烘焙，或是機車維修等具體的操作性活動，都能成為學習的媒介。這些不同的媒介不只提供了技能學習的機會，同時是鑲嵌在真實的社會情境中。不同於學校模擬的學習環境，職場提供了真實的社會互動場域，學習者能從作品的具體呈現、顧客的直接回饋中獲得成就感。師傅雖然也是權威的教導者，但因為共同工作目標的關係，使得師徒關係更近似於合作夥伴的性質，這種既有權威又需互賴的關係特質，往往能降低學習者的抗拒，也有別於教師的角色。同時，職場中的人際互動更為多元，透過與同事、顧客的日常接觸，學習者有機會在不同的社會關係中發展互動能力。

多元社會化情境的價值不在於取代學校教育，而是提供了互補的學習空間。在職場中，社會規範不是透過說教傳遞，而是在具體工作中自然展現；角色學習不是被動接受，而是在實踐中逐步發展；社會關係不是制式安排，而是在真實互動中建立。這種情境式的學習方式，更符合社會化理論中強調的互動性與發展性原則，且因著學習是發生在生活化的社區脈絡中，透過在地的人際網絡與文化支持，更能強化社會化的效果。

## （二）角色轉換與重構的策略

社會化理論強調角色學習的重要性，尤其對中輟生而言，如何從「問題學生」的標籤中轉化，重新建立正向的角色認同，是其重返社會的關鍵。在社區師傅方案中，研究者發現角色轉換與重構不是一蹴可幾的，而是需要在不同階段、不同面向中逐步建立的過程。職場環境提供了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讓中輟生能夠擺脫既有的負向標籤，從一個新的身份開始學習。職場中的角色學習是建立在實際貢獻的基礎上，當學習者能夠完成具體的工作任務，看到自己的努力對工作場域產生實質的幫助時，這種貢獻感往往能強化其角色認同。例如，能夠獨立完成顧客的需求、協助店家的營運，這些經驗都能幫助中輟生建立新的自我概念，從被幫助者轉變為具有貢獻的參與者。

從學生到學徒的角色轉換，不只是名稱的改變，更是賦予新的社會意義。學徒的角色與學生不同，它暗示著專業技能的學習、職業倫理的培養，以及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在這個過程中，方案幫助中輟生從一個已經放棄學習或學習失敗的角色，重新轉換回學習者的位置。「學徒」意味著保持著「學習者」的身份，而非被定位為職員或工作者，這樣的角色設定不僅維持了學習的本質，也為未來重返校園保留了連結的可能。

## （三）社會連結網絡的重新建構

社會化理論強調社會關係與連結對個體發展的重要性，對中輟生而言，重建社會連結不僅是回歸學習的基礎，更是重建自我認同。社區師傅方案協助中輟生的社會連結重構，從小範圍的互動開始，逐步擴展到更廣泛的社會網絡。

在方案中，社會連結的重建首先從師徒關係開始，這種一對一的關係提供了安全且可預期的互動經驗，讓中輟生能在較為單純的人際關係中，重新建立與他人連結的信心。之後才進一步與顧客、同事建立日常的互動。這些互動經驗雖然短暫，但這些社會連結是建立在「能力」的基礎上，而非過去在學校中容易被標籤化的「問題」上。

當中輟生在職場中能建立起這些基於能力的正向互動後，也會回頭影響原有社會網絡的互動，改變原生系統看待他們的視角。例如，教師看到學生在職場中的表現後，更容易調整對學生的評價與看法；家長在看到子女能獨立完成工作任務後，也較能肯定其能力並產生信任。這種跨系統的正向連結，為中輟生重返校園或發展其他學習，建立重要的支持基礎。

#### **四、實務建議與未來發展方向**

根據前述社會化理論的討論及社區師傅方案的實務經驗，本研究提出以下反思與建議。首先，在實務工作上，需要重新思考中輟輔導的目標。傳統中輟輔導往往以「回歸學校」為單一目標，但從社會化的觀點來看，應該更重視中輟生與社會連結的重建過程。當中輟生能在社會中找到適合的角色，建立正向的互動經驗，自然會發展出返回教育系統或尋找其他適性發展管道的動機。

在方案設計上，應更重視非正式教育場域的價值，學校社工師可以積極開發社區資源，建立多元的學習管道。在選擇合作對象時，除了考量技術層面的學習內容，更要評估商家是否具有教育理念，能否提供適切的社會化支持。同時，也要建立跨專業的合作模式，協助教師、家長理解非正式教育的價值，降低對中輟生接觸職場環境的疑慮。

在評估指標上，應發展更全面的觀察指標，除了出席率、行為表現等量化指標外，更要關注中輟生在社會化過程中的質性改變，例如人際互動的品質、角色認同的發展等。目前多是以學校社工師的質性觀察與評估為主要方法，但若建立客觀評估指標，不僅能幫助實務工作者更準確掌握介入成效，也能為未來方案的發展提供重要參考。

## 伍、結語

中輟「不只是回到學校」，而是關於如何協助學生重新建立與社會的連結。本文透過社會化理論的視角重新審視中輟輔導工作的本質，其目標不應僅限於讓學生返回校園，而是幫助他們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連結。當我們擴展輔導目標的視野，便能看見更多可能性的開展，如本文的案例所示，有些人的選擇是回到學校，有的則找到了其他適合自己的發展管道。這些不同的結果都應被視為有效的社會化歷程，而非以復學作為單一評判標準。

從這個視角出發，中輟輔導的實務工作應突破結果導向的限制，轉而關注學生在社會化歷程中的體驗與成長。社區師傅方案的經驗顯示，當他們能夠在真實社會情境中找到適合的角色，並獲得積極的互動經驗時，學生往往能逐步發展出與社會重新連結的意願與能力。本研究亦顯示，當學生能夠主動參與選擇，而非被動接受單一輔導目標時，其學習動機與適應能力會有顯著提升。此外，社會化的歷程不僅關乎學生是否回歸體制，更涉及他們在角色轉換與社會網絡重構過程中的主體性與能力展現，因此中輟輔導的核心應著重於如何支持學生發展自主的社會適應能力，而非僅將焦點放在問題行為的消除。

本研究透過具體案例探討社會化理論在中輟輔導工作中的可能運用，發現它不僅能夠提供新的實務框架，也有助於深化社會工作與教育專業之間的跨領域合作。然而，社會化理論作為社會工作與教育專業的共同理論基礎，具備促進兩個專業領域對話的潛力，但在實務應用上的討論仍相對有限。本研究的貢獻在於將社會化理論具體應用於中輟輔導，探索其在實務層面的運作方式，並提出可行的輔導框架。透過分析不同中輟生的社會化歷程，本研究不僅提供了理論與實務結合的視角，也突顯跨場域合作在中輟輔導中的關鍵作用。未來的中輟輔導工作應更強調環境與系統層面的介入，建立跨專業、跨場域的合作模式，並發展更細緻的評估指標，以捕捉社會化過程中的質性變化，而非僅關注復學率等量化數據。

最後，我們也需要反思教育體系本身的社會化功能。當教育環境能夠更具包容性、更能回應個別差異時，中輟問題或許就不再被視為個別學生的「適應不良」，而是反映了教育系統回應多元需求的能力。唯有教育專業與社會工作專業的對話與合作，才能為中輟生開創更多元的發展路徑，實現社會化的本質，協助每個人找到適合自己的社會參與方式，建立有意義的社會連結。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 宋尚倫（1981）。**社會化之社會心理觀**。臺北：巨流。
- 李瑞霖、陳惠平、廖宥甯（2022）。**108課綱觀察報告**。臺北：臺灣一滴優教育協會。
- 周憐嫻（2000）。社會結構、中途輟學率與青少年犯罪關係之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31**，243-268。
- 洪美鈴、王麗斐、林正昌、張在蓓（2020）。從校園輔導工作初探拒學議題之生態指標。**教育心理學報**，**51(4)**，585-612。
- 陳奎憲（2021）。**教育社會學**。臺北：三民。
- 時蓉華（1996）。**社會心理學**。臺北：東華。
- 程秋梅、陳毓文（2001）。中輟少年的復學適應：傳統復學模式與另類復學途徑之比較。**臺大社會工作學刊**，**4**，45-96。
- 張春興（1987）。**教育心理學**。臺北：東華。
- 張雄盛、張世雄（2019）。國民義務教育制度下中輟生生命歷程政策。**靜宜人文社會學報**，**13(3)**，29-62。
- 葉至誠（2022）。**社會學概論**（二版）。臺北：揚智。
- 鄧煌發（2000）。輟學少年之家庭與社會學習因素的比較分析。**犯罪學期刊**，**5**，233-275。
- 謝高橋（1982）。**社會學**。臺北：巨流。

### 外文部分

- Alexander, K. L., Entwisle, D. R., & Kabbani, N. S. (2001). The dropout process in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Early risk factors at home and school.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03(5), 760-822.
- Allen-Meaers, P. (2015). *Social work services in schools* (7th ed.). NY: Pearson.



- Apple, M. W. (2011). *Education and power*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 Baldwin, J. Mark. (1897). *Social and ethical interpretations in mental development: A study in social psychology*. NY: Macmillan.
- Ballantine, J. H., & Spade, J. Z. (2011). *Schools and society: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4th ed.). NY: Sage.
- Baumrind, D. (2013).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revisited: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us. In R. E. Larzelere, A. S. Morris, & A. W. Harrist (Eds.),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Synthesizing nurturance and discipline for optimal child development* (pp. 11-34).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Y: Doubleday.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oley, C. H. (1902).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Y: Scribner's.
- Dupper, D. R. (2003). *School social work: Skills and interventions for effective practice*. NY: John Wiley & Sons.
- Durkheim, É. (1956). *Education and sociology* (S. D. Fox, Trans.). Fre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2)
- Erikson, E. H. (1950). *Childhood and society*. NY: Norton.
- Freire, P. (197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Y: Continuum.
- Goodlad, J. I. (1984). *A place called school: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NY: McGraw-Hill.
- Grusec, J. E., & Hastings, P. D. (Eds.). (2014). *Handbook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2nd ed.). NY: Guilford Press.
- Hallinan, M. T. (1992). The organization of students for instruction in the middle schoo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5(2), 114-127.
- Kim, H. Y., & Page, T. (2013). Emotional bonds with parent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school-related behavior problems among elementary school truant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2(6), 869-878.

Plenty, S., & Jonsson, J. O. (2017). Social exclusion among peers: The role of immigrant status and classroom immigrant densit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6(6), 1275-1288.

Wang, M. T., & Eccles, J. S. (2012). Social support matters: Longitudinal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three dimensions of school engagement from middle to high school. *Child Development*, 83(3), 877-895.

Wentzel, K. R., & Muenks, K. (2016). Peer influence on students' motivatio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social behavior. In K. R. Wentzel & G. B. Ramani (Eds.), *Handbook of social influences in school contexts: Social-emotional, motivation, and cognitive outcomes* (pp.13-30). NY: Routledge.

## 研究論文

# 明帝國的「標準化」意欲與落實情況之初探—以 《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為中心<sup>\*</sup>

洪長成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

收稿日期：2024 年 01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4 年 05 月 18 日。

<sup>\*</sup> 本文通訊作者為洪長成，E-mail：kimpopo6366@gmail.com。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正意見。

## 中文摘要

華琛（James Watson）提出「標準化」理論後，引起學者們爭相討論並檢驗其理論的內涵。目前學者們最關心的是「標準化」如何地進行？雖然學者們也早已就此發表許多看法，但多數焦點是放在所謂的「標準」或「正統」是「由上至下」或「由下至上」所形成，亦即把「標準化」視為一種有共同方向的共謀（accomplice）過程。本文認為，所謂「標準化」是在不斷鬥爭的過程中形成的，該過程時而「由上至下」，時而「由下至上」。且所謂的「標準」，並非透過有形的強制力（或暴力）去形成，而是在交換論述中進行。本文試圖以明代政府透過訂立《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以「標準化」宗教儀式的管制政策為例，觀察在政策制定後，宗教論述是否會完全照著執政者的意思發展，或完全不理會政府的政策？並透過周思得編撰《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的過程，展現受管制者與管制者間的「對話」過程，說明「標準化」具體的落實路徑。

**關鍵詞：**標準化、華琛·周思得、《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ten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rdization" in the Ming Empire—Taking Da Ming Xuanjiao Licheng Zhaijiao Yifan (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 as the Center of Discussion**

**Chang-Chen Hung**

Ph.D. Candidate at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s**

After James Watson proposed the "standardization" theory, scholars rushed to discuss and test the connotation of his theory. At present, what scholars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is how to carry out "standardization"? Although scholars have already expressed many opinions on this, most of them focus on whether the so-called "standards" or "orthodox" are formed "from top to bottom" or "bottom up", and regard "standardization" as a process of accomplice with a common direction.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it is rather formed in a process of constant struggle, sometimes "from top to bottom" and sometimes "from bottom to top." And when standards are created, they are not achieved through tangible coercion (or violence). They are usually carried out in exchange discussion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ake the Ming Dynasty government's policy of "standardizing" the control of religious rituals by formulating the "Da Ming Xuanjiao Licheng Zhaijiao Yifan (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 as an example, and observe whether the religious writings after the formulation of this policy will fully follow the intentions of the rulers, or ignore government policy? An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Zhou Side's compilation of "Shangqing Lingbao Jidu Dacheng Jinshu (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 it shows the "dialogue" process between the regulated and the regulators, and explains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 of "standardization"

**Keywords :** standardization 、 James Watson 、 Da Ming Xuanjiao Licheng Zhaijiao Yifan (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 Zhou Side 、 Shangqing Lingbao Jidu Dacheng Jinshu (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

## 壹、概說—關於標準化與《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之關係

首先提出「標準化」理論(standardization)的學者是華琛(James L. Watson)，所謂「標準化」理論是在談國家如何透過有形的干預手段(例如：朝封、官祀...等)推導某種文化理念，並透過文人的推動，將中國精英階層的文化象徵符碼滲透到群眾的生活當中(華琛，2003/2006)。

但必須強調的是，國家在標準化的過程當中，並不具體地形成細部的文本，其具體內容的型塑，是交給地方精英(指對土地和商業有興趣的識字階層)去完成的。國家僅提供「結構性」的、「儀式性」的框架，是一種儀式上的正確行動(ritual orthopraxy)，而不管制信仰與思想，這個架構讓許多相互衝突、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細部文本都被置放在這個框架底下，而形成一個文化大一統的結構(華琛，2006)。

華琛(2006)同時指出，地方精英願意將自己的思想投入經國家標準化的大意識流中，主要的原因在於，這個作法可以使他們的家族或社群被納入「開化」社會的主流中，因而得到知識份子的認同並提升其地位。詳言之，因為知識份子較容易從政府出版的刊物接受其內容中所形塑的神明形象，而這些形象通常是抹去祂們「較人性」的那一面，僅保留具教化意義的部分，因此對讀書人較有感召力，並願意在縣誌或其他著作提到這樣的祭祀活動與贊助人物。而在這些著作中被提到的士紳會感到自己好像進入某種「文明」的境地當中，而自覺地位被抬昇。<sup>1</sup>另一方面，祭祀一位政府所認可的神，而放棄政府所認定的邪教，也是一種歸順朝廷，與政府當局合作的表態行動，因此地方精英會主動順應政府所推動的框架性論述，甚至自主性地深化該論述的具體內涵。

華琛的理論提出後，最早提出質疑者為美國學者宋怡明(Michael Szonyi)，他以福州地區的儀式與信仰為例，認為所謂的標準化頂多是存在於表層的「話語」或「認同」的層面，而這往往與人民實際的行動層面有所落差，所謂的標準化

---

<sup>1</sup> 華琛的文章中所提到天后具有捍衛社會的正面形象，同時也有嫉妒與復仇的陰暗面。但國家為確認這些神明的正當性，往往會刻意忽略其陰暗面(華琛，2006)。

不過是地方精英與歷史文獻作者的幻想與說辭（視角問題）而已，蓋人民的信仰泰半是根基於「靈驗性」而非是否被國家認同。當國家不認同，而計劃將自己的信仰對象加以排斥時，人們並不會因此改變自己真正的信仰對象與內涵，在某些情況，是找個“合法的標籤”來掩護自己所真正認同的“非法”的信仰，而這種現象，被宋怡明稱為「偽標準化」(pseudo-standardization) (宋怡明，2011)。直到近期，仍有以清政府容受中國穆斯林參與政治為例，試圖推翻標準化理論於中國社會的適用可能性者（孔維德，2022）。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則從中國的戰神神話中發現一個更細緻化的「標準化」過程，他認為人民對於來自政治面的標準化規制並非全然地「陽奉陰違」，當政治力量所建構的「神話」與人民原本所信仰的神話故事有若干重合時，該信仰文化是有可能逐步產生「位移」，甚至在若干時日的演變後，可以呈現與「原始」信仰完全不同的面貌，因而提出了「刻畫標誌」（superscripting symbols）理論（杜贊奇，2006）。

必須注意的是，在「刻劃標誌」的過程中，國家、地方精英、宗教勢力與平民間對於神話的建構，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合謀（accomplice），他們之間對於神話的論述，呈現出一種相互建構的現象，在多數的情況下，不會消滅對方的說法，甚至如果官方或地方精英試圖完全消滅平民心中的神話圖像，則或許官方或地方精英所建構的新故事將對平民的神話重構過程不起任何作用，而這樣的現象即便在像清朝這樣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亦復如此，因此，國家只能在刻劃標誌的過程中給予某些力量（或新定義），並保留地方的原有神話架構，否則最後，可能就會出現人民只是表面上接受官方的神話構造，但實際上仍有自己的另一套信仰邏輯的現象。但杜贊奇非常敏銳地觀察到，儒士集團總能透過某種力量，在國家或民眾依自己的利益建構屬於自己所持之神話時，以一種非支配性的形式在此二者的論述中取得某些權威性的影響作用（杜贊奇，2006）。

此後，陸陸續續還有陳春聲提出的士大夫化理論（陳春聲，1995）、科大衛、劉永華提出「正統化理論」（科大衛、劉志偉，2008）、蘇堂棟（Donald Sutton）提出由下而上的標準化活動等見解（蘇堂棟，2009），或是批評，或是深化標

準化理論，但不約而同的，近期的學者都注意到在國家的標準化意欲下，似乎還須注意有一股來自非官方的力量在促進「標準」的型塑（見徐天基，2013；張珣，2015；謝貴文，2016；徐雨村，2018；李忠達，2020）。<sup>2</sup>

本文的個案—《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下稱「明立成儀」）。雖然稱為「立成」齋醮儀範，然其與道教傳統的「立成儀」並不相同。蓋所謂「立成儀」是列載儀式的具體程序及規矩的科儀文本，是可供道士於行法時直接照本宣科的科儀書（呂鵬志，2008）。而這個齋醮儀範基本上就是一個「結構性」、「框架性」的文本，並不具有可直接操作性，只規定了齋醮科儀的日程、應行的儀節與順序及基本的高功口白與小咒語，雖有指定必須要唸哪些經典，但並沒有訂定標準本，也未對所謂的「行科」（文中稱「法事」）內容進行規範，似乎是有意留待各門派自行填補，可想而知，每一個門派落實下來應也各具姿態，某程度與華琛所主張的「標準化」理論之情況相似（華琛，2003；科大衛與劉志偉，2008）。<sup>3</sup>

本文將比對同樣作成於明朝，惟成書較晚（宣德年間）的《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周思得所編著，下稱《大成金書》），觀察其科儀文本的編撰是否服膺於《明立成儀》所訂立的儀式規則？假使其並未完全遵守《明立成儀》的程式，亦即將齋醮儀式限定於須三日內完成的原則，其是否在其所參考的文獻—《靈寶領教濟度金書》（林靈真著）（下稱「濟度金書」）的基礎上，將儀式簡化，某程度也展現對王朝意志的尊重？而這樣的現象又與上述的哪一種理論較為貼合？或可用哪種理論加以詮釋？

## 貳、《明立成儀》之規範對象與目的

### 一、《明立成儀》的「玄教」究何所指—管制對象

<sup>2</sup> 本文就因篇幅及主題所限，僅就早期的經典論述進行回顧與介紹。

<sup>3</sup> 華琛歸納出中國喪禮的九個核心環節，即哭喪、易服帶孝、沐浴更衣、設奠薦祭、設神主、禮聘儀式專家、奏樂安魂、大殮、出殯這九個儀節是一基本框架，在這個框架下，容許人們依地方的狀況而調整。



### (一) 非張留孫的「玄教」

元末明初曾有教派稱「玄教」，其創教人為張留孫，留孫曾師侍第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根據《元史》的記載，張留孫乃因於至元十三年（1276年）隨張宗演謁見元世祖後，遭留置元大都，因此經常出入宮廷、立於君側，又數次顯現神跡而獲皇室信賴，逐漸在自己周圍集合起大批龍虎山道士，形成獨立的支派，因而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受封為「玄教大宗師」（酒井規史，2013）。因此，「玄教」一詞，在元末明初時，可能是指涉張留孫在元大都所領導的道士集團。

### (二) 《明立成儀》的「玄教」為道教與佛教的合稱

明初朝廷不承認「玄教大宗師」的地位，張留孫所創之玄教解體（酒井規史，2013）。也因此《明立成儀》所指的「玄教」應不會是前揭所談的玄教。

再者，從〈御製玄教齋醮儀文序〉不難看出，明太祖乃試圖透過《明立成儀》同時規範道、釋二教的齋醮儀式。<sup>4</sup>以上的論述我們再仔細地看一次這兩段原文，便會更清楚：

...官民之家，若有喪事，非僧非道，難以殯送。若不用此二家殯送，則父母為子孫者是為不慈，子為父母是為不孝，恥見鄰里。...今之教僧教道，非理妄為，廣設科儀，於理且不通，人情不近。...勅禮部會僧道，定擬釋道科儀格式，遍行諸處，使釋道遵守。庶不糜費貧民，亦全僧道之精靈，豈不美哉。（明·宋宗真等，1374/2004）

因此，可以推斷，雖然此儀範是由宋宗真、趙允中、傅同虛、鄧仲修、

<sup>4</sup> 至於，此科範如何讓佛教法師操作？是否有實行困難，或是否因窒礙難行而最後選擇另立佛教專屬的簡式儀軌，因與本文的論述主軸不相涉，故暫且擱下。

周玄真等道士共同擬定，且於序言也提到此科範乃「...欽奉聖旨，編定道門科儀，去繁就簡...」，且「行之於幽顯之間，有所益利，實道門萬世之幸」，仍未將此齋醮儀範訂名為「大明『道教』立成齋醮儀範」並非沒有原因。

又《明立成儀》乃是朱元璋指派禮部會同僧、道訂立，作供為為官民之家操辦喪事的僧道遵守的科儀規範，這個部分可從〈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序略〉略見端倪：

...欽遇皇帝陛下...入貢總三教，如江漢朝宗。昭事上帝之誠，郊焉而享；懷柔百神之禮，感而遂通。用斂福於庶民，復留神於兩教。洪武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臣宋宗真...等欽奉聖旨，編定道門科儀，去繁就簡，立成定規進奏。臣宗真等性質凡昧，學識淺陋...謹編定儀式，錄藁進呈...行之於幽顯之間；有所益利，實道門萬世之幸。（明·宋宗真等，1374/2004）

從上述的序，我們也可以知悉，修訂齋醮儀範的道士深知，皇帝設立此儀軌的目的，乃欲兼融三教，使三教的精靈要義，如江漢朝宗的景況，即如百川均歸於海。因此，所謂「玄教」，可以確定的是至少包含道、釋二教。<sup>5</sup>又如從明朝三教歸一、暗翊王綱的思想看來，將「玄教」二字論指道、儒、釋三教亦非無可能。

## 二、《明立成儀》的訂定的目的

### （一）導民歸儒—倡導誦經以啟良心論

明政府雖於政權未穩時即開始拉攏 42 代天師張正常等道教人士，甚

---

<sup>5</sup> 丁煌早期的研究已發現，明朝自洪武以降，推行一系列的儀式改革運動，混淆釋道，甚至雜採密宗喇嘛教之法（丁煌，2009）。

至於建國後履建齋醮並敕建大型國家宮觀，看似為頗崇信道教，然而，事實卻非如此，據日本學者滋賀高義的分析，其作為大體上有三個目的：1. **便利性考量**：在戰亂之後，須祭祀天地神祇，宣示自己的正統地位，此時—新政府需要有祭祀能力的文化團體，而佛、道團體可擔此任。2. **收買人心**：親近佛、道團體可展現新國家的好意。3. **政治上考量**：透過道士具有神通能力的形象，以道士對統治者的認同證明新政府奪得政權乃上合天意，具合法地位（滋賀高義，1963）。

從朱元璋所著的〈釋道論〉，我們更可以知悉，其乃欲透過釋、道之理詮釋儒教而使三教歸一，以助王朝的統治及綱常，其云：

假如三教，惟儒者凡有國家不可無。夫子生於周，立綱常而治禮樂...除儒官叩仰，愚民未知所從，夫子之奇，至於如此。釋迦與老子雖玄奇過萬世，時人未知其的...人民焚香叩禱，無時不至。二教初顯化時，所求必應，飛悟有之。於是乎感動化外蠻夷。及中國假處山藪之愚民，未知國法，先知慮生死之罪，以至於善者多而惡者少，暗理王綱，於國有補無虧，誰能知識？（朱元璋，1936）

即言“愚民”百姓，有時無法理解國家的法度，而無法遵守法律，但往往由於相信道與佛所顯化的神跡，而能信其罪報之說，故得多能從善棄惡，道佛也因此暗助了國家的綱紀，在這樣的前提下，道釋二家對國家是有幫助的（趙軼峰，2008）。

而在《明立成儀》的序言，朱元璋也在前述的思想背景下指出：

...今之教僧教道，非理妄為，廣設科儀，於理且不通，人情不近。

其愚民無知者，妄從科儀，是有三、五、七日夜諷誦經文。經乃釋道化人為善、戒人為惡之言，猶國家之有律令。若誦經而使鬼魂聽之，以發揮其善念則可。若誦經而欲為死者免罪，如犯刑憲而讀律令，欲免其罪，是為不可。...（明·宋宗真等，1374/2004）

亦即，朱元璋否認誦經可以解罪的想法，而這不僅與道經所宣示的價值不同，無疑也更曝露其透過宗教論述暗渡王綱倫常理念的心機。朱元璋將這樣的論述放在供僧道遵守的齋儀典範中，更顯示朱不僅在乎人民客觀的祭祀行動，更想要「糾正」人民的想法，使人民服膺於其宣示的理念。

道教經典如何看待誦經的功用，我們觀察以下的經典記載可以看得更清楚。《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約出於南北朝末或隋唐之際）（Schipper, Kristofer Marinus & Verellen, Franciscus, 2004）云：

道君曰：...若人命過，誦念是經，開度亡人，上生華胥。常誦是經，九祖超昇。凡誦是經，功德無量，各隨其力，罪業消除，生死蒙恩，兆民歡喜，天下太平。（「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1988）

《太上洞淵神咒經》（成書不晚於唐末），卷 15，〈步虛解考品〉亦云：

道言：吾今告汝衆生，汝從年七以來，乃有呵風罵雨之考。又有不敬天地之考。或有不敬日月星辰之考。...。如是衆考，不可一一盡言。今專轉誦之次，陳露前愆，亡願蕩除，一時矜赦。罪沈九地，...。（「太上洞淵神咒經」，1988）

據此，道教經典所體現的，是誦經具有解除罪業的功能（山田利明，1999）。而朱元璋在起義前對佛、道及混雜佛道的白蓮教均有參與交往，不可能不知到這淺顯的道理，其仍出「...若誦經而欲為死者免罪，如犯刑憲而讀律令，欲免其罪，是為不可。...」的言論，顯然是另有考量。

## （二）簡約儀式—節省民力對宗教的投入

明朝建國之初，因久經戰亂，國家急需可有效從事生產的人力（包括可生產更多人力的婦女），故而訂立許多制度，避免正處於可為國家效力狀態的人口投入宗教活動，例如：不許 40 歲以下的婦女出家、管制僧道人口，以避免有效人力為逃避勞役而出家。<sup>6</sup>

而明朝鼓勵簡省對於宗教之投入的政策，不僅表現在對人力資源的掌握，對於宗教儀式的舉行，也鼓勵盡量縮短日程。洪武 2 年 3 月，翰林學士朱升等人奉敕撰齋戒文，朱升擬定完畢後，便拿給朱元璋看，他看完後，便趁此機會對大臣訓示：

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神之格與不格，皆繫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為不敬，可止於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著為令（明·李景隆等，明太祖實錄，卷 40，1966）。

而這種簡省宗教儀式時程的作法也表現在《明立成儀》的擬定上，在其序言，朱元璋說：

---

<sup>6</sup> 此學者研究已多，不再舉例證明（趙軼峰，2008）。

...今之教僧教道，非理妄為，廣設科儀，於理且不通，人情不近。其愚民無知者，妄從科儀，是有三、五、七日夜諷誦經文。...。蓋糜費家資，僧道蠢蠢之徒，將以為儀範之美，致使精神疲倦。...。僧甚至日三遍對佛宣揚，道乃日三朝而敷奏，以此觀之，釋迦與老子非重聽而瞽目，故煩之於再三。若不如此，果何理耶？勅禮部會僧道，定擬釋道科儀格式，遍行諸處，使釋道遵守。庶不糜費貧民，亦全僧道之精靈，豈不美哉（明·宋宗真等，御制玄教齋醮儀文序，1374/2004）。

即朱元璋批評，當時的僧道為貪圖錢財，廣設浮濫的科儀，使得民眾參加儀式時，不僅耗費了錢財，也喪失了誠心。他更進一步指出，老子又不是眼盲耳背，豈需一天之內對祂朝禮三次，並再三陳報齋主所求之事。他認為類似此類不合理的科儀具應捨棄，因此敕命禮部會同僧道擬定改善方案（張超然，2019）。

而宋宗真等高道在訂定《明立成儀》時，也就此作出了回應：

洪武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臣宋宗真、趙允中、傅同虛、鄧仲修、周玄真等欽奉聖旨，編定道門科儀，去繁就簡，立成定規進奏（明·宋宗真等，御制玄教齋醮儀文序，1374/2004）。

也因此《明立成儀》中，最長的度亡醮不過三日，後續我們可以再從周思得編撰《大成金書》的歷程觀察，究竟這種政策是否有效地使萬民咸遵？

### （三）整理禮制

明政府為貫徹其統治權，亟欲強化人民的儒式思維，因此有意識地進行禮制的改革，並透過官祀的建立與倡導以及在官祀中推行儒禮，使儒家的思想能更貫徹於人心。

是故，明帝國建立後，明朝便開始對神祇、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展開敕封與祭祀，且以其一貫地「佛道暗翊王綱」的策略，特別突出城隍信仰，要透過「陰陽共治」以強化貫徹統治權的效率。因此，在明洪武二年，大封天下城隍，並以統一的制度，將城隍祭祀納入國家祭祀體系，甚至成為官制中的一部分。

然而，根據日本學者濱島敦俊的考據，在城隍信仰的推崇上，朱元璋並無意以城隍信仰的原貌加以推廣，除了在城隍廟的設置上比照人間的衙門外，更禁止人民為城隍塑像，僅能以「木主」祭祀城隍，而所謂「木主」的祭祀方式無疑也透露了其在民間信仰（或民間道教）暗渡儒家思想的目的（濱島敦俊，2011）。相同的思想也被應用在淫祀的打擊上。<sup>7</sup>

如前所述，《明立成儀》是朱元璋考慮到官民之家每遇喪事必筵請僧道，而僧道科儀之繁瑣與不合理有改革的必要，因而指派禮部訂立範本。若放在前揭所指的明洪武年間的這個歷史脈絡來觀察，此齋醮儀範的出現，可能也是其整理禮制之政策的一環。

這個目的我們可以從宋宗真等道士於〈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序略〉中的回應看得更清楚：

神龜龍馬，圖書出應於明時...~~一~~三十六部，蘊奧之文，極披詳而莫既；五千餘言，道德之旨，與治化以同符。自經義隱而失真，致科範傳而寢廢。百家異戶，歷代濫觴。唱讚繁，則質實之弗專；

<sup>7</sup> 明朝將許多五通神廟查禁並以可彰顯儒家價值的神明取代之，例如：文昌帝君、關帝、城廟。蔣竹山認為，官方對於五通信仰的查禁，其部分的原因在透過這些「正神」的形象回復儒家的聖德形象，以便教化百姓（蔣竹山，1995）。

晝夜多，則精誠之必懈。考之於禮樂制度，既或僭差；質之於天地神祇，寧無冒瀆。喜有聖人之在上，庶幾仙道之重新（明·宋宗真等，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序略，1374/2004）。

#### （四）小結—標準化理論的反省

華琛的理論認為，國家只在乎人民的祭祀行動的外觀，而不在乎人民對信仰認知的內容。然而，信仰與行動是否可以分割已非無疑，且按照華琛的理論推斷，亦將產生一些不合常理的現象。亦即，如果華琛所描述的狀況是存在的，則將產生人們去敬拜一位自己所不認同的神之情況。此不僅早經科大衛（David Faure）及劉志偉的批評（科大衛與劉志偉，2008），且也與本文個案中的情況不符合。蓋從上述的情況我們可以發現，明政府不僅要控制人們外表上的行動，更想透過行為形式「灌輸」若干的價值觀念。

### 叁、《明立成儀》對齋醮科儀的簡化與落實—以黃籙齋為中心

#### 一、概說—比較對象的說明

早期的黃籙齋儀乃以「拔度先祖」為其主要功能，自杜光庭以後，黃籙齋的功能擴充，其儀式的作用不再限於拯救幽靈，更成為「人天普修，家國兼利，功無不被」的齋法。<sup>8</sup>

根據日本學者淺野春二的研究，宋元時期的黃籙齋法仍保有杜光庭的遺風，其黃籙齋共分為「黃籙開度」與「黃籙祈禳」，前者是用以救濟亡者的齋儀，而後者是用以為生人解除災厄的齋儀（淺野春二，2015）。不論其分類方式是否過於簡化，由於《明立成儀》中的〈御製玄教齋醮儀文

<sup>8</sup> 包括《洞玄靈寶道學科儀》、《道教義樞》、《唐六典》及朱法滿《要修科儀戒律鈔》等六朝唐初的作品論及黃籙齋儀，均以「拔度先祖」為其主要功能（周西波，2003）。



序〉已點明，<sup>9</sup>此齋醮儀範是為用於官民百姓的喪事而訂（即目的為開度亡者），<sup>10</sup>因此在探究《明立成儀》所彰顯之簡化祭祀的國家政策是否確實有效落實於其後所訂立的齋醮科儀時，本文選擇以「黃籙開度儀」或與此儀式意旨相同、所費日數一樣的科儀作為比較對象。

據此，本文選擇以《大成金書》中所收的〈平常三晝夜齋儀〉做為主要的比較對象。而選定此一文本的另一個原因是，其作者周思得在明初頗富影響力，且《大成金書》編定於《明立成儀》訂立之後（宣德 7 年），正好可觀察在明朝明確宣示科儀簡化政策並製定範本之後，是否確實為官民所遵守。

另一方面，為進一步檢證，即使周思得在編輯《大成金書》時，並未確實制定一部符合《明立成儀》之簡約標準的儀範，惟其仍試圖簡化前代科儀，以表示服膺於國家政策。本文將以周思得編輯《大成金書》所參考之主要科範，即林靈真所編《濟度金書》與周思得後編之科範進行比對，以觀察科儀演變歷程與政策落實的情況。

## 二、《明立成儀》建度亡醮三日節次分析

在進行比較前，我們先來看一下《明立成儀》建度亡醮三日的節次（以下經筆者配合儀範內文重新整理）

第一日 發直符（灑淨、法事、召將、三獻、讀關文、遣將、化財回向）  
揚旛（法事、白文、祝旛、吟偈、諷經、回向）  
安監壇（請神、法事、誦經）  
安監齋（請神、法事、誦經）  
敷座演經（法事、諷靈寶經、生神章、救苦經、生天經）

<sup>9</sup>〈御製玄教齋醮儀文序〉：「…。官民之家，**若有喪事**，非僧非道，難以殯送。若不用此二家殯送，則父母為子孫者是為不慈，子為父母是為不孝，恥見鄰裡。…今之教僧教道，非理妄為，廣設科儀，於理且不通，人情不近。…勅禮部會僧道，定擬釋道科儀格式，遍行諸處，使釋道遵守。庶不糜費貧民，亦全僧道之精靈，豈不美哉。」

<sup>10</sup>丁煌教授也認為《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大抵上是在規定黃籙度亡齋儀（丁煌，2009）。

靈前召請（破地獄、咒食、諷經、化財、回向）  
立寒林所（法事、吟偈、召孤施食、諷經、化財）  
第二日 灑淨（法事）、諷經（靈寶經、生神章、救苦經、生天經）  
禮懺（或朝天懺，或九幽懺，或三官懺）  
至晚接待孤魂施食（吟偈、焚符、遍召、咒斛、諷經）  
第三日 淨壇 請師 降神通意  
安鎮五方符 告符簡  
關燈召亡（焚符、灑淨、略意、豐都咒、焚召魂符、三遍召）  
沐浴更衣 參禮  
咒食 濟孤 施斛  
鍊度傳戒  
設醮（法事、獻供、祭酒、讀疏）  
送神（化財 滿散）

上述的程序大致上保留了從杜光庭所創，先齋後醮的傳統。

### 三、《大成金書》是否落實簡化科儀之精神—以平常三晝夜黃籙齋儀為比較對象

第 43 代天師張宇初於其所著《道門十規》記載：「…不可僭亂定規，一遵太祖皇帝立成儀範，恪守為則。凡其符籙、簡札之類，亦不得增損移易。」（張宇初，道門十規，1988）其中所謂的「太祖皇帝」，根據其記載的格式及編者對此皇帝的稱謂判斷，所指應為「明太祖」，則所謂「立成儀範」，應指《明立成儀》（楊士霽，2014）。由此看來，明太祖欲透過訂立統一的儀範，以簡約人民在儀式上的花費，的確有得到道教圈的正面回應。

另一方面，同時代許多一卷本的科儀書被編入道藏，我們似乎可以斷定，明太祖清整道教、簡約祭祀的政策獲得一定程度的成效（寇鳳凱，2016）。然而，道藏終究是皇家授權所編的叢書，在經典的揀擇上，難免須考量國家的政策立場。一卷本的經書入藏，或許可以證明，官家從明洪

武年間至正統年間的宗教政策在大方向上不敢違背明太祖所訂下的祖制。然而，一卷本科儀書即便在明朝才大量「出現」，也不代表這些一卷本的經典或科儀書始編於明代，或直到明代才被始用，蓋有些經典品秩繁浩乃成於後世之手（謝聰輝，2008）。

由是，本文必須再回到本文，從較細處重新觀察，究竟明太祖清整道教、簡約祭祀的政策，具體落實的情況為何？從書籍編制的形式面觀察，《大成金書》共 40 卷（不含目錄），較之前代分別由王契真、金允中所編的《上清靈寶大法》（分別為 66 卷、44 卷）、林靈真的《濟度金書》（明《正統道藏》本共 320 卷）在編輯上似有精簡科儀的傾向，惟卷秩的減少可能僅是科門品目減少所造成，而這可能是肇因於某些科儀已因不符合時代的需求而使科門品目減少，被保留下來的科品可能仍耗時曠日、所費不貲，因此我們必須拿出一些相同或相近的科品，比較其細部的儀節，才能進一步確認，周思得在編撰《大成金書》時，究竟秉持什麼樣的態度？

#### （一）作者周思得

周思得（1359-1451 年），浙江錢塘人，字養真，號素庵野人。年輕時最先師侍杭州宗陽宮提點丘月庵學習雷法，後又師從第 43 代天師張宇初，為明朝一代高道，經歷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宗五代帝王（汪桂平，2006）。

從一些人對他的描述我們可以知道，周思得非常精於靈官法，且能降神附體預知未來，故經常隨明成祖朱棣北征，並因預知禍福而建奇功，頗受朱棣重視。<sup>11</sup>朱棣於永樂 18 年（1420 年），在紫禁城西側建天將廟（即

<sup>11</sup>而這無疑是種非常弔詭的現象，蓋《大明律》規定：「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燒香集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且張宇出在《道門十規》亦云：「又等**圓光附體、降將附箕**、扶鸞照水諸項邪說，行持正法之士所不宜道，亦不得蔽惑邪言，誘眾害道。」，但仍重用行靈官法的周思得，可見在明朝皇帝的心中，他們一來並非真正反對「降神附體」，而是別有目的。另，他們對於代表「道教正統」的張天師之宗教論述並不完全採納，更可看出他們的核心信仰內涵並非以「道教」為中心，保守地說，他們並非純粹的道教徒，明朝皇帝心中的那個「道教」究竟為何，是非常值得觀察的。詳可再參王福梅（2013）。

後來的大德觀)命周思得兼領焚修。<sup>12</sup>

《明史》記載：「...永樂中，以道士周思得能傳靈官法，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50，諸神祠，1739)、明倪岳的《青谿漫稿》記載：「...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轉引自汪桂平，2006)、《帝京景物略》記載：「...永樂中，道士周思得行靈官法，知禍福先，文皇帝數試之，無爽也。至招弭祓除，神鬼示魁，逆時雨，衿災兵，遠罪疾，維影響...」(轉引自張廣保，2015)

由上可知，周思得可行能靈官法「附體降神」，不論他是使他人附體，親自擔任附體的乩童，其做法明顯與張宇初於《道門十規》中所行之教示有所衝突。張宇出於《道門十規》云：「又等圓光附體、降將附箕、扶鸞照水諸項邪說，行持正法之士所不宜道，亦不得蔽惑邪言，誘眾害道」，這是否也種下後世(邵以正)修道藏時不敢將周思得的《大成金書》入藏的遠因，非常值得進一步觀察。然若排斥「附體降神」對於張家人及當時的道教徒而言是至為重要的價值，為何第 45 代的天師張懋丞又肯為《大成金書》作序？頗值完味。

《大成金書》為何沒有入藏，除可能受周思得本身所處的政治環境及其與邵以正等負責編藏者的關係等因素影響外，<sup>13</sup>對於探討此部著作究竟是否被統治者所認可？及究竟宗教政策受人文環境的修正是否也為主政者計劃範圍內之結果？有著若干的關係，這也影響到「標準化」措施究竟是國家獨力完成或官民、讀書人共同完成？然限於篇幅及時間壓力，只能再另待時機補充。

## (二) 《大成金書》之編撰過程

《大成金書》乃周思得於宣德 7 年(1432 年)前後，在宋代王契真所

<sup>12</sup> 「焚修」在道書中有多義，①精進修行②禮拜祭祀③主持宮觀。此處乃意指「主持宮觀」。

<sup>13</sup> 張宇初及張宇清奉旨編修道藏時，周思得的著作尚未問世。

編之《上清靈寶大法》、林靈真所輯之《濟度金書》的基礎上，編成的道教教科儀文本（姜生、郭武，1999）。

周思得於《大成金書》的自序中提到，他曾親眼看過師父丘月菴在看林靈真所集田靈虛及甯全真之靈寶法書（推測應為《濟度金書》的部分（否則不需再向吳大節、楊震宗等人取得「真集」），邱師極推崇此書，並將是書責付予周。<sup>14</sup>

周思得於〈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序〉云：

...吾少從學於月菴邱先生，一日窺其披閱水南林真人所輯田甯二真人靈寶法書，喟然嘆曰，是書有益於吾教，豈淺淺哉，奈何不得有為者，而責付之予，...先生欣然嘉其言，遂開示遠大蹊徑，朝夕誨訓，...，余沉潛反復於其間迄今二十餘年，朝夕拳拳不敢自逸，深愧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仰副當日期待之意。無以見先師於洞府，遂訪求於演法吳公大節，提點楊公震宗，復得真集，間嘗竊附己意，補其散失，訂其訛謬，參以簡錄，佐以符章，通為四十卷，名之曰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周思得，1433）

又據楊震宗〈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後序〉云：

...暇日，乃以所傳靈虛田宗師符章奧旨，集為《金書》三卷，散施四方，與同志者共，猶慮未廣。復以水南林先生修撰濟度之書。參以平昔所用諸品科範，校讎成帙，命之曰《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凡四十卷...。（周思得，1433）

<sup>14</sup>據此，有學者認為周思得乃傳承了「靈寶東華派」的道法，而制定了《大成金書》（陳文龍，2015）。惟學者謝世維認為，「東華派」只是學者以後期歸類的模式來回溯宋元道教的一種權宜範疇，這樣的宗派歸類，忽略了宗派譜系的歷史事實及宗派傳承本身的複雜性（謝世維，2012）。

從周思得的自序及楊震宗的談話可以得知，《大成金書》乃綜合周思得平時常用的科範、林靈真之《濟度金書》、田靈虛之《金書》，並參以己意校輯而成。因此，我們可以從林靈真的《濟度金書》觀察周思得於明代編撰《大成金書》時，究竟有無試圖將過去的科儀簡化。

附帶一提，張懋丞嘗言，「大德觀高士周思得，遭際明朝，棟樑吾道，恭沐聖恩，屢脩金籙。其壇（土遺）典儀，一依此式（明·張懋丞，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序）。」，即周思得曾數次依《大成金書》的典儀格式為國家修建金籙醮儀。惟此說法頗有可議。

據周思得自己於〈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序〉所說（該序作成於宣德7年），他自得師傳「靈寶法書」至編成《大成金書》計20餘年，推估他得到此書的時間大約是在1412~1402年之間，他當時最少已44歲（而這是最保守的算法，蓋此乃以周思得獲「靈寶法書」至編成《大成金書》已跨30年計算）。一位已屆中年的道士如何重新學習一套新的科儀已頗值推敲。

周思得履為國家主持金籙醮儀或許不假，然張懋丞究竟根據那些證據證明，周思得是以《大成金書》的格式典範為國家作醮不得而知，蓋周思得雖曾師侍第43代天師張宇初，然其最早是從丘月庵學習，其科儀傳承非盡出於龍虎山系統，<sup>15</sup>而一般的道士對於所行法事的科儀書籍、章奏、書表、典式不輕易示人，即便數次參與道士的科儀展演，若未盡得其科書、秘本，未必可知其全貌，因此，張懋丞即便在周思得舉行的數次金籙醮典均全程參與，也未必可以得知其乃依《大成金書》的典式主醮。

據此，尚需有更多的資料交互比對才能確定，這個說法是張懋丞為強調此書的重要性才講的“過譽”之言，或是這是當時科儀現場的時況描寫。

### （三）《大成金書》的簡式型黃籙齋儀—平常三晝夜齋儀

<sup>15</sup>據丁煌的考據，周思得道法之淵源，尚可上追田靈寶（靈虛）、甯全真、張繼先、王文卿、林靈素、薩守堅、林靈真（丁煌，2009）。

《大成金書》中，典型的黃籙齋儀 5 日之道場，若與《明立成儀》的典型齋醮儀式一度亡醮 3 日道場相比，顯然是一個較繁瑣的科儀，比較兩者間的差異已無太大的意義。

而《大成金書》簡式型的黃籙齋儀計有「開度正三晝夜」、「平常三晝夜」、「二晝夜」、「一晝夜」道場。首選的比較對象，當然是以演法日數相同者為先，即「平常三晝夜」道場。惟「開度正三晝夜」道場雖實際上需演法達四日，與《明立成儀》三日度亡醮日數不同，本可不必分析比較，然觀察其程序有助理解「平常三晝夜」之內容，故列下表合併分析之。

◆平常三晝夜齋儀、開度正三晝夜的節次如下：

平常三晝夜齋儀			開度正三晝夜（需演法 4 日）		
日	時	儀節	日	時	儀節
前日			前日		發文書
					揚幡
第一日	上午 下午	建諸司神幕	第一日	上午	建監廚幕
		建寒林所			建幕
		發文書			拜表
		揚幡			誦經
		建神幕			禮懺
		建寒林所		下午	宿啟、朝儀
		建幕			燃燈破獄、催攝亡魂
		拜表			沐浴更衣、朝參
	晚上	誦經		晚上	咒食、濟接孤爽
		關九陽燈、接濟幽爽			三朝行道
第二日	早上	啟師	第二日	上午	二上轉經
		捲簾、分燈			關燈
		敕水、安鎮、行香		下午	供王
	下午	宿啟告符			宣靈前懺悔
		關燈破獄、召魂			鍊度
	晚上	沐浴			

		安靈咒食			
		濟接孤爽			
第三日	上午	三朝行道	第三日	上午	發請醮文書
	下午	二上轉經		下午	散醮 朝儀
	晚上	鍊度			誦諸品經誥
		設醮		晚上	設醮送聖、圓滿

上述「平常三晝夜齋儀」項下的表格設網底處之捲簾、分燈、敕水、安鎮、行香、宿啟告符等程序，依照《大成金書》卷 24〈黃籙大齋逐日節次·宿啟節次〉所載，原屬宿啟的節次，「平常三晝夜齋儀」顯系將典型的宿啟科儀分拆來作。

另「平常三晝夜齋儀」除了移除禮懺、朝參、供王、宣靈前懺悔等程序，其設醮的時程也較短，因此可推斷其乃一較略式的儀式。

又「平常三晝夜齋儀」似乎是多了一個關九陽燈的程序，九陽燈應即係九陽梵炁燈，<sup>16</sup>此燈法乃用於破獄，從下面的引文可以知道，此乃關燈破獄中的一個程序，因此，可以推斷「平常三晝夜齋儀」乃是將關燈破獄的程序拆開來作，分別儀式的第 1 日及第 2 日舉行。這個作法與將宿啟儀式分拆許多段落來進行的內在邏輯應屬一致。<sup>17</sup>

《大成金書》卷 23 之〈諸真玄奧品·燃九陽梵炁燈法〉記載：「玄師曰**破獄**開昏先點九陽梵炁燈為首，請九天生神上帝隨方化現，降九天靈光，遍佈燈壇，上照九天、中照九州、下燭九地...。」（周思得，1433）

#### （四）平常三晝夜齋儀與《明立成儀》度亡醮三日道場之比較

<sup>16</sup>比對《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的目錄之〈燃九陽燈法〉項及開目錄所指引的記載處即可得知。見周思得（1433），卷 23，頁 51 b。另詳細的九陽燈儀可再參見《大成金書》，卷 11 所載之〈九陽燈科〉。見周思得（1433），卷 11，頁 5-12。

<sup>17</sup>依筆者的壇場經驗，其理由可能是要配合人員休息的時間及各種儀式有其適合舉行的時間，例如：關燈破獄以夜間為佳。此論尚須有更多論證，姑先隱於註釋。



《大成金書》平常三晝夜齋儀			《明立成儀》度亡醮三日道場		
日	時	儀節	日	時	儀節
第一日	上午 下午	發文書	第一日	上午 下午 晚上	發直符 （發文書之一環）
		揚幡			揚幡
		建神幕			安監壇 <sup>18</sup> 、安監齋 （建神幕之一環）
		建寒林所			敷座演經
		建幕			靈前召請 （破地獄、咒食、諷經）
		<b>拜表</b>			立寒林所 （召孤施食、諷經）
		誦經			
	晚上	關九陽燈、接濟幽爽			
第二日	早上	啟師	第二日	上午 下午	灑淨、諷經
		捲簾、分燈			禮懺
		敕水、安鎮、行香		晚上	接待孤魂施食、諷經
	下午	宿啟告符			
		關燈破獄、召魂			
		沐浴			
	晚上	安靈咒食、濟接孤爽			
上午 下午		<b>三朝行道</b>	第三日	上午 下午	淨壇、請師、降神通意 （可類比「啟師」）
	二上轉經	安鎮五方符、告符簡 （可類比「宿啟」）			
晚上	鍊度	晚上		關燈召亡	
				沐浴更衣、參禮	
	設醮			施食濟孤	
				鍊度傳戒	
設醮					

基本上，除了「拜表」以外，《大成金書》平常三晝夜齋儀與《明立成儀》度亡醮三日道場的程序都具有對應關係，只是從《明立成儀》度亡

<sup>18</sup>所謂「監壇」神，多指地方裡社裡的正神。若與《明立成儀》簡省建幕程式合併觀察，似乎與明朝皇室信仰的民間化、通俗化有關，可再進一步觀察。

醮 3 日道場的細部程序來看，其內容是更簡略的。因此，某程度來說，《明立成儀》的規範意旨並沒有「完全」地落實在《大成金書》的編撰過程，至於《大成金書》的作者是否已盡量縮減宋代的儀式內容，以呼應執政者的意志仍待透過與《濟度金書》比對才能得知。

#### 四、與林靈真《濟度金書》的黃籙齋儀比較

##### (一) 關於《濟度金書》的編撰歷程

《濟度金書》原題為南宋甯全真傳授、宋末元初林靈真編。二人皆為宋元道教靈寶東華派宗師，是故此書可某程度代表宋元時期，所謂東華派的道教理念及科儀範式。

明朝英宗正統年間所修《道藏》其所收之《濟度金書》共 320 卷，從書中屢見『大明國』字樣，可知該書非盡出於林靈真之手，乃後世之人編補而成，是現存卷數最多的道教類書（林靈真，1988）。

惟據〈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嗣教錄〉之記載：

...公自視欲然，乃退居琳宇，盡三洞領教諸科，及歷代祖師所著內文秘典，準繩正一教法，謄輯為篇，目為《濟度之書》一十卷。《符章奧旨》二卷。大而告天祝聖之文，小而田里禴禴之事，修齋奉醮，...（林靈真，1988）。

可見《濟度金書》原僅 12 卷。又從明宣德 7 年，時任神樂觀提點的楊震宗為周思得所編的《大成金書》作的序可看出，《濟度金書》在明初尚非一大部頭的巨著，蓋據楊震宗的說法，當時的《濟度金書》僅 34 卷。其序言是這樣寫的：

靈寶通玄弘教仙師水南先生，...學道于虛一林先生東華薛先生，紹

開東華之教，蔚為一代真師，遂以三洞領教諸科及歷代祖師所著內文秘典，準繩正一教法，輯撰為濟度之書，符章奧旨三十四卷，流行于世...

不論究竟《濟度金書》原僅 12 卷或 34 卷，其原先均非一過份龐大的道書，其可實際運用於科儀現場而具操作性的可能性就大為增加了。

又〈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嗣教錄〉乃出自元朝林天任之手（林靈真，1988），而楊震宗為《大成金書》作的序成立於明朝宣德年間，在元朝時其僅 12 卷，明朝宣德年間增為 34 卷，至明英宗年間編成《正統道藏》之前，又擴增為 320 卷，可見《濟度金書》多數的科儀本乃增編於明朝一代，<sup>19</sup>以此種趨勢看來，朱元璋早年推動的儀式簡化運動似未獲得貫徹。後世的皇帝在編藏時，似乎也沒有及時地糾正此違反「祖制」的狀況。

惟事實恰好並非如此，宋朝的黃籙齋儀乃以繁複著稱，由王契真所撰，且與《濟度金書》同被歸類為東華派之儀式文本，並最貼近宋朝民間實際信仰生活的《上清靈寶大法》（陳文龍，2015），未見有類似《濟度金書》中所載之三日型黃籙齋儀（王契真，卷 54~58，2004），反而是以五日型的齋儀為典型。據此，似乎可以推論，明朝人在增補《濟度金書》時，確曾考慮到國家精簡儀式的政策。惟《濟度金書》中的三日型黃籙齋儀，是否於明代才加入，尚缺乏明確的證據。據此，以《正統道藏》版的《濟度金書》與《大成金書》之科儀進行比對，似無法突顯周思得是否針對他所得之《濟度金書》進行精簡的動作。

惟若《濟度金書》的三日型黃籙齋儀乃增補於明代，則明朝人在增補《濟度金書》時，即確實考慮到國家精簡儀式的政策。退萬步言，若《濟度金書》的三日型黃籙齋儀乃編訂於宋代，若能比較《大成金書》與《濟度金書》的三日型黃籙齋儀，並發現《大成金書》的同型齋儀確實有較《濟

<sup>19</sup>丁煌認為《靈寶領教濟度金書》320 卷的型制定型於元大德 6 年的見解，似乎仍待斟酌。參見丁煌（2009），頁 278。

度金書》更精簡，也非不能證明周思得在編撰《大成金書》時，的確有考慮到國家政策的問題。

(二) 《濟度金書》三日型黃籙齋儀之程序分析

《濟度金書》中，典型的「黃籙開度」齋儀為「開度黃籙齋五日齋儀」。其餘的簡式「黃籙開度」齋儀分別為：明真齋三日齋儀（需耗四日）、拔度道場二日齋儀、九天生神齋三日齋儀、青玄黃籙救苦齋三日齋儀、血湖道場一日齋儀、五鍊生尸齋三日齋儀、師友命過行道誦經道場（耗時二日）。前揭齋儀中，實際耗時三日者本文姑定義為「三日型黃籙齋儀」，其分別為「九天生神齋三日齋儀」、「玄黃籙救苦齋三日齋儀」、「五鍊生尸齋三日齋儀」

本文選擇以《濟度金書》中的三日齋儀作為比較對象的首選，其理由如前述，不再贅述。以下分別列表與《大成金書》的「平常三晝夜道場」進行比較，觀察其程序的演變。

1. 九天生神齋三日齋儀的分析與比較

《大成金書》 平常三晝夜齋儀			《濟度金書》 九天生神齋三日齋儀		
日	時	儀節	日	時	儀節
第一日	上午 下午	發文書	第一日	上午	發文書
		揚幡			建師幕、淨壇
		建神幕			揚幡（九天幡）
		建寒林所			建幕 （六師幕、三官幕）
		建幕			拜表
		拜表			
		誦經		下午	頒赦、召魂
	晚上	關九陽燈 接濟幽爽	晚上	分燈、宿啟	
				設靈官醮	
關燈（九天神燈）					

					攝召正度亡魂 及祖先冤仇
					沐浴
					全形醫治
					咒食安奉
第二日	早上	啟師	第二日	上午 下午 晚上	三朝行道
		捲簾、分燈			設供普度 (玉清溟滓甘露大梵淨供)
		敕水、安鎮、行香			鍊度傳戒
	下午	宿啟告符			
		關燈破獄、召魂			
		沐浴			
第三日	上午	三朝行道	第三日	上午 下午	誦經(生神章)
		二上轉經			散壇、言功上表
					辭幕、送聖
	晚上	鍊度		晚上	設鍊度醮 (鍊度正薦亡靈)
					傳授符命、 發詣朱陵府
		設醮			送聖
					設謝恩醮

很明顯《濟度金書》的「九天生神齋三日齋儀」較《大成金書》的「平常三晝夜齋儀」更為複雜。除了實質上多設了「頒赦」、「靈官醮」、「全形科」及「言功表」的節次以外，也因為要將正、副薦亡魂與一般的孤幽分別處理，而重複進行召魂、設供施食與鍊度等程序（雖然兩個脈絡的儀式繁簡不一）。因此，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周思得確實有在進行某程度的儀式簡化工作。

## 2. 玄黃籙救苦齋三日齋儀的分析與比較

《大成金書》	《濟度金書》
--------	--------

平常三晝夜齋儀			玄黃錄救苦齋三日齋儀		
日	時	儀節	日	時	儀節
第一日	上午 下午	發文書	第一日	上午	發文書
		揚幡			建師幕、淨壇
		建神幕			揚幡（遷神幡）
		建寒林所			建幕 （六師幕、三官幕）
		建幕			拜表（救苦表）
		拜表		下午	<b>頒赦</b> 、召魂
		誦經			晚上
	晚上	關九陽燈 接濟幽爽		關燈（破獄燈）	
		<b>攝召正度亡魂 及祖先冤仇</b>			
沐浴					
<b>全形醫治</b>					
咒食安奉					
第二日	早上	啟師	第二日	上午 下午 晚上	三朝行道
		捲簾、分燈			<b>設供普度</b> （青玄普度淨供）
		敕水、安鎮、行香			
	下午	宿啟告符			<b>鍊度傳戒</b>
	晚上	關燈破獄、召魂			
		沐浴			
		安靈咒食、濟接孤爽			
第三日	上午 下午	三朝行道	第三日	上午	誦經（救苦經）
		二上轉經			下午
	晚上	鍊度		晚上	
					<b>傳授符命、 發詣東極注生宮</b>
送聖					

<sup>20</sup>惟這本來就可以歸入宿啟的程式當中。

		設醮			設謝恩醮
--	--	----	--	--	------

### 3. 五鍊生尸齋三日齋儀的分析與比較

《大成金書》 平常三晝夜齋儀			《濟度金書》 五鍊生尸齋三日齋儀			
日	時	儀節	日	時	儀節	
第一日	上午 下午	發文書	上午	發文書		
		揚旛		建師幕、小禁壇		
		建神幕		揚旛（遷神旛）		
		建寒林所		建幕 （六師幕、三官幕）		
		建幕		拜表（救苦表）		
		拜表		立監臨幕		
		誦經		呼陰召陽儀		
		晚上		關九陽燈 接濟幽爽	下午	召魂
	第二日	早上	啟師	第二日	上午 下午	分燈、宿啟 （強調補職說戒及安鎮五 方符） <sup>21</sup>
			捲簾、分燈			頒告赦符
敕水、安鎮、行香			關燈（破獄燈）			
下午		宿啟告符	攝召正度亡魂 及祖先冤仇			
			沐浴、化衣			
			咒食安奉			

<sup>21</sup>惟這本來就可以歸入宿啟的程式當中。

	晚上	關燈破獄、召魂			鍊度傳戒
		沐浴			
		安靈咒食、濟接孤爽			
第三日	上午 下午	三朝行道	第三日	上午	誦經
		二上轉經		下午	誦經、散壇、 言功上表
					辭幕、送聖
	晚上	鍊度		晚上	設鍊度醮 (鍊度正薦亡靈)
		設醮			傳授符命、 發詣南昌上宮
				送聖	
				設謝恩醮	

#### 4. 小結

「九天生神齋三日齋儀」、「玄黃籙救苦齋三日齋儀」、「五鍊生尸齋三日齋儀」三者的科儀結構可以說是一樣的，僅是所請神明、所上表章、所誦經典、淨供及將亡者發詣的處所不同。

誠如前述，很明顯《大成金書》的「平常三晝夜齋儀」乃是較為簡化的儀式。因此，我們可以確定，周思得確實在編撰《大成金書》時，試圖呼應執政者的要求。

### 肆、代結論

本文的個案，某程度可以顯現，所謂的「標準化」並不是可以完全依照著執政者的意志完全及徹底地貫徹。人民或精英階層會透過論述（或著作）的形塑與執政者進行對話與商討（當然這不是一種真實的談判過程）。

本例中，精英階層乃是以過去的師承、科書、經典作為依據，去實踐並調整政府的政策。這似乎與杜贊奇的「刻畫標誌」理論遙相呼應。蓋周思得在簡化科儀的同時也必須考慮是否使師承之儀式背離，致使失去儀式的「功效」或



意義，因此只能逐步地推移、改變，調和政策與宗教內部的需求。<sup>22</sup>

本文算是一個未完之作，因這個個案是否能形成一個普遍現象尚待比對更多的同時代作品，例如：《道法會元》。另周思得的《大成金書》並未編入明英宗年間所編的《正統道藏》，是否與周思得未完全依明政府的意志編撰其書有關，也需進一步的資料考論。再者，本文所稱的明政府的宗教政策多以太祖、成祖的資料為據，雖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說：「凡我子孫，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張德信與毛佩琉編，1995）。」然而，後世的帝王是否均（或大部分）恪遵祖訓仍不得而知。因此，明太祖、成祖所訂下的宗教政策是否即足以說明明朝整體的狀況，非無疑義，須再予補遺。

最後，本文所談論的理論模型若能再繼續開展，或許也可用以思考現今的宗教問題，例如，當政府在重新型塑燒香及燒金紙文化時，若未能顧及本土既有的信仰文化論述，一味地藉一個完全沒有文化根基的「以米代金」策略，妄圖革除燒香及燒金紙文化，是否過於昧於歷史經驗？最後也將僅達成人民「陽奉陰違」的結果？非常值得進一步觀察。

---

<sup>22</sup>相類似的見解可以參見李忠達（2020）。

## 參考文獻

### 傳統文獻

- 南北朝·撰人不詳（1988）。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道藏**，6，北京：文物、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
- 西晉·撰人不詳（1988）。太上洞淵神咒經。**道藏**，6，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
- 宋·王契真撰（2004）。上清靈寶大法。**中華道藏**，33，北京：華夏。
- 宋元·林靈真編（1988）。靈寶領教濟度金書。**道藏**，7，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宋元·林靈真編（2004）。靈寶領教濟度金書。**中華道藏**，39，北京：華夏。
- 明·宋宗真等撰（2004）。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中華道藏**，44，北京：華夏。
- 明·周思得編（1433）。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哈佛藏本。
- 朱元璋（1936）。**釋道論**。載於（明）葛寅亮（編），金陵梵剎志，1，南京：金山江天寺。
- 明·李景隆等修撰（1966）。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清·張廷玉等撰（1739）。明史。清武英殿本。
- 張德信、毛佩琉編（1995）。洪武禦制全書。合肥：黃山。

### 近人論著

- Schipper, Kristofer Marinus and Verellen, Franciscus（2004）*The Taoist canon :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I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丁煌（2009）。臺北藏明宣德本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載於丁煌（著），**漢唐道教論集**。北京：中華。
- 山田利明（1999）。六朝道教儀禮の研究。東京：東方。
- 王福梅（2013）。明代靈濟道派研究。成都：巴蜀。
- 孔德維（2022）。異端為官——雍正年間穆斯林官員的不道德嫌疑。**新史學**，33（2），1-61。
- 汪桂平（2006）。鄂東地區民間道士所用度亡科書的研究—兼論《上清靈寶濟度大

成金書》的流傳地域。**世界宗教研究**，3，123-136。

宋怡明（2011）。帝制中國晚期的標準化和正確行動之說辭：從華琛理論看福州地區的儀式與崇拜。載於劉永華（主編），**中國社會文化史讀本**（153-159 頁），北京：北京大學。

李忠達（2020）。元代禪宗清規祈禳儀式的標準化。**佛光學報**，6（2），41-90。

呂鵬志（2008）。**唐前道教儀式史綱**。北京：中華。

周西波（2003）。**杜光庭道儀範之研究**。台北：新文豐。

徐天基（2013）。帝制晚期中國文化的研究框架与范式\_反思華琛的標準化理論。**世界宗教研究**，2013 年（6），178-186。

徐雨村（2018）。非官方標準化與廟祠同構化：臺灣及馬來西亞的土地神信仰發展的比較研究。**華人宗教研究**，11，101-130。

杜贊奇（2006）。刻劃標誌：中國戰神關帝的神話。載於（美）韋思諦（Stephn C. Averill）（主編）；陳仲丹（譯）（第 1 版），**中國大眾宗教**（93-114 頁），南京：江蘇人民。

姜生、郭武（1999）。**明清道教倫理及其歷史流變**。昆明：四川人民出版社。

科大衛、劉志偉（2008）。「標準化」還是「正統化」？——從民間信仰與禮儀看中國文化的大一統。**歷史人類學**，6（1-2），1-21。

淺野春二（2015）。明代道教の黃籙齋における召魂から鍊度に至る儀礼について：周思得修集『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讚道節次品を中心に。国学院中国学会報，61，45-62。

張珣（2015）。媽祖造像、挪用現象與「標準化」問題討論。**考古人類學刊**，82，5-26。

張廣保（2015）。明代的國家宮觀與國家祭典。載於王崗、李天綱（主編），**中國近世地方社會中的宗教與國家**（157-200 頁），上海：復旦大學。

張超然（2019）。規模與取捨：近世黃籙齋儀變遷與明初儀式改革。**華人宗教研究**，14，111-145。

陳文龍（2015）。**王契真《上清靈寶大法》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陳春聲（1995）。三山國王信仰與臺灣移民社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80，61-114。

濱島敦俊(2011)。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經濟的發達與農民信仰。載於劉永華(主編)，**中國社會文化史讀本**(108-121頁)，北京：北京大學。

寇鳳凱(2016)。**明代道教文化與社會生活**。成都：巴蜀。

酒井規史(2013)。正一教・玄教と江南の在來道觀。**東洋の思想と宗教**，43(2)，16-35。

楊士霈(2014)。**皇權與教權：明初道教的管理與規範—以張宇初《道門十規》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滋賀高義(1963)。明初の神樂觀と道教。**大谷學報**，43(2)，32-45。

趙軼峰(2008)。**明代國家宗教管理制度與政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蔣竹山(1995)。湯斌禁毀五通神：清初政治菁英打擊通俗文化的個案。**新史學**，6(2)，67-111。

華琛(2003)。中國喪葬儀式的結構——基本型態、儀式次序、動作。**歷史人類學**，1(2)，98-114。

華琛(2006)。神明的標準化：華南沿海天后的推廣，960-1960。載於(美)韋思諦(Stephn C. Averill)(主編)；陳仲丹(譯)(第1版)，**中國大眾宗教**(57-92頁)，南京：江蘇人民。

蘇堂棟(2009)。明清時期的文化一體性、差異性與國家——對標準化與正統實踐的討論之延伸。 **歷史人類學**，7(2)，139-163。

謝世維(2012)。宋元時期的「東華派」探討—系譜、聖傳與教法。**東吳大學中文學報**，23，161-190。

謝貴文(2016)。神明的標準化—從老二媽、玉二媽、六房媽的傳說談起。**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2，7-47。

謝聰輝(2008)。一卷本《度人經》及其在台灣正一派的運用析論。**中國學術年刊**，30，105-136。

## 研究論文

# 原住民族傳統飲食文化價值與現代食安規範之 調和\*

許博偉

靜宜大學原住民族健康與社會福利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潘 穎

靜宜大學原住民族健康與社會福利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楊品裕

靜宜大學原住民族健康與社會福利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邱惠娟

靜宜大學原住民族健康與社會福利博士

許德訓<sup>1</sup>

靜宜大學原住民族健康與社會福利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

收稿日期：2024 年 11 月 20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5 年 02 月 27 日。

\*本文作者團隊的排序已經過討論確認。

<sup>1</sup> 本文通訊作者為：許德訓 g1116010@pu.edu.tw。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正意見。

## 中文摘要

本研究探討了臺灣原住民族的飲食文化與現代食品安全標準之間的衝突與調和，特別關注臺東蝸牛小米粽事件、檳榔文化及其他原住民族飲食文化的具體案例。透過文獻回顧與實例分析，研究發現，原住民族的飲食文化在生產方式、文化象徵和手工製作等方面，與現代食品安全規範中的工業化標準、衛生檢測和市場流通規範存在明顯的制度性衝突。這些衝突體現在食品檢驗的微生物控制、標準製程的要求以及市場化規範的限制上，尤其在原住民族手工食品的商品化過程中更加明顯。

本文認為，解決原住民族食品商品化過程中的食安問題，關鍵在於政策的彈性設計，平衡「文化保護」與「食品安全」的雙重目標。未來的政策應將原住民族的文化傳承視作食品法規的核心考量，並透過法律的調整與文化保護機制的引入，達成文化傳承與公共衛生保障之間的和諧共生。

**關鍵詞：**原住民族飲食文化、食品安全、檳榔文化、文化保護

## **The Harmonization of Indigenous Traditional Culinary Values with Modern Food Safety Regulations**

**Po-Wei Hsu**

Student of Ph.D. Program in 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for Indigenous Peoples,  
Providence University

**Ying Pan**

Student of Ph.D. Program in 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for Indigenous Peoples,  
Providence University

**Pin-Yu Yang**

Student of Ph.D. Program in 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for Indigenous Peoples,  
Providence University

**Hui-Chuan Chiu**

Ph.D. in 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for Indigenous Peoples, Providence University

**Te-Hsun Hsu\***

Student of Ph.D. Program in 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for Indigenous Peoples,  
Providence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aiwan's indigenous food culture and modern food safety standard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Taitung Snail Millet Dumpling incident, betel nut culture, and other indigenous food tradition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analysis, the study identifies that indigenous food culture, characterized by production methods, cultural symbolism, and artisanal craftsmanship, faces structural conflicts with modern food safety regulations. These conflicts are evident in microbial control, the requirements for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the restrictions on market circulation,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indigenous handmade food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ddressing food safety challenges i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indigenous foods requires flexible policy design that balances the dual objectives of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food safety." Future policy efforts should view the preservation of indigenous cultural heritage as a core consideration in food regulations and achieve the coexistence of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public health protection through legal reform and cultural safeguarding mechanisms.

**Keywords:** indigenous culinary culture, food safety, betel nut culture, cultural preservation

## 壹、緒論

### 一、臺灣原住民族的傳統飲食文化及食安議題

陳宗韓、李美嬋、李珮伶（2016）指出，食物在人類歷史與文化中，從來不僅是滿足生存需求的基本要素。從食材的選擇到進餐過程中的各種儀式，食物不僅象徵著社會地位，更深刻反映了不同族群的文化認同。同樣地，原住民族的食物來源與烹飪方式，不僅承載了對日常生活的需求，更是建構其族群主體性的關鍵元素。

臺灣原住民族擁有豐富且悠久的飲食文化，傳統食品種類多樣，包括小米、山豬肉及野菜等。相較於漢族飲食文化，臺灣原住民族的烹飪方式顯現出獨特性，而在多元的原住民族群體系中，各族群的飲食文化更展現了鮮明的差異。例如，小米作為許多原住民族的主食，不僅富有營養價值，還具有深遠的文化意涵。在排灣族的文化裡，小米是重要的農作物，其栽種與使用深具文化與宗教意涵。從墾地、播種、除草到收穫的每個階段，都由巫婆舉行祭祀儀式，祈求小米的生長茂盛（洪梅花，2012）。收穫後的小米用途廣泛，可以釀酒、煮飯、製作糕點，或用來包製小米粽（Cinavu）等。傳統上，小米粽被視為高尚的食品，常用於節慶、宴客、遠行攜帶或祈福活動，象徵祝福與珍重，充分體現了小米在族群文化與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在阿美族、泰雅族等原住民的飲食中，小米不僅是日常飲食的基本元素，更是社會活動、宗教儀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野味和野菜同樣是原住民族飲食文化的重要部分，其採集與製作方法體現了對自然環境的尊重與智慧。然而，隨著現代食品安全標準的普及，這些傳統食品的生產與消費方式正面臨挑戰。例如，許多原住民族群在製作傳統食品時，並未完全遵循現代食品衛生標準，導致其產品在市場上受到質疑，甚至被禁止銷售。這種現象不僅威脅到原住民族的飲食文化，也對其經濟生計帶來不利影響，迫使他們在傳承文化與適應現代規範之間做出艱難抉擇。

以加拿大為例，食用自行醃製的肉類是原住民發生肉毒桿菌中毒事件最常見的一個原因，根據 Hauschild 與 Gauvreau 於 1985 年的研究統計，1971 至 1984



年間，發生肉毒桿菌中毒的患者有 93 % 是原住民，而這些中毒事件中有 59 % 是由家庭醃製的肉類所引起，又以中國為例，從 1958 到 1983 年曾發生的 986 件肉毒桿菌中毒案中，其中 91 件（9 %）的肇禍元凶就是自行醃製的肉類(Shih & Chao, 1986)。諸如此類之情況對原住民的飲食文化及其生計造成了嚴重影響，迫使他們在傳承與改變之間進行艱難的抉擇。

2024 年 9 月在臺東金峰鄉發生的「蝸牛小米粽」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由於資訊傳播的不完整和媒體報導的偏差，一部分社會大眾錯誤地將小米粽與食品安全風險聯繫在一起，甚至對原住民族的傳統飲食文化產生負面觀感。原視新聞網記者 Kacaw・Mayaw 與陳民紋（2024）更指出此事件發生後，各大媒體以聳動標題大篇幅報導，在網路上引發廣泛討論，卻導致部落傳統食物受到汙名化與歧視。針對這樣的誤解不僅損害了原住民族的文化形象，也對他們推廣傳統美食的努力造成阻礙，進一步影響文化復振的進程。而這一事件凸顯了主流社會與原住民族文化之間的認知差距，強調了加強文化理解與尊重的重要性。唯有透過精準的資訊傳播與多元文化的深度交流，才能有效消弭誤解，讓原住民族的飲食文化在現代社會中得以延續與發揚。

## 二、全球食安機制對於原住民族食安事件的衝突與影響

近年來，臺灣接連發生多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其根本原因在於現代社會中飲食體系的生產端與消費端之間出現了斷裂，導致制度的失能與彼此信任的崩解（葉秀燕，2020）。學者的研究指出，食品安全問題從來不僅僅是單純的食安議題，其背後更深受全球經濟、政治與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周桂田、徐健銘，2015）。在全球食安機制的大背景下，原住民族的飲食文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許多國家為了提高食品安全標準，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法律法規，這些規範往往忽視了原住民族的生活習慣和生產方式。例如，衛生檢查、食品標示及生產流程的標準化，可能對一些原住民族傳統食品的生產造成壓力，甚至導致其被排除在市場之外。此外，全球對於食品來源和生產過程的透明性要求，對原住民族來說也是一種挑戰，因他們的生產方式往往基於世代相

傳的智慧，而不是現代化的標準化流程。這樣的情況不僅影響了原住民族的經濟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他們的文化身份和自豪感。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於 2019 年發表一篇有關食品安全是實現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重要基石的文章。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與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呼籲各國加強對食品安全議題的重視，推動法規完善、研究與監測工作，並強調食品安全是全球共同責任。自 2019 年起，聯合國將每年 6 月 7 日定為「世界食品安全日」，聚焦糧食安全、公共衛生、減貧、環境永續等議題。透過推動食品安全日，促進對食源性風險的預防與管理，安全食品將助力經濟繁榮、農業發展與永續進步，成為全球共同關注的重要目標。

另外，李鳳綺與吳帛儒（2024）於全球食品安全倡議 2024 年度會議的出國報告中提到，全球食品安全倡議（The Global Food Safety Initiative, GFSI）係由歐盟通路業者於 2000 年提出，致力於促進全球食品供應鏈的食品安全及品質管理標準的發展和應用，以增強消費者信任度，並提供食品供應鏈利益關係人之知識交換平臺。但對於原住民族的傳統飲食文化，卻時常帶來衝突與挑戰。原住民族的飲食文化深植於自然與社群生活，強調手工製作和自然採集，這與全球食品安全倡議中的工業化標準和衛生規範形成鮮明對比。例如，在食品加工過程中，全球標準要求的微生物控制和統一製程，對以傳統方式製作的原住民族傳統食品如小米粽（Cinavu）、野菜、醃製品構成了壓力。這種衝突不僅限於生產過程，還延伸到市場流通環節。在全球化的食品市場中，許多原住民族傳統食品因未達現代食品安全標準而被排除在正式市場之外，導致經濟機會受限。同時，原住民族傳統食品的文化價值在全球化語境中往往被忽視，甚至受到汙名化。為減少這些衝突，政策設計需注重平衡全球食安標準與原住民族文化傳承。應鼓勵以文化尊重為基礎的彈性規範，支持傳統食品的安全改良，並在全球市場中展現其文化價值，實現文化保護與食品安全的雙贏。

## 貳、文獻探討

### 一、食品安全定義及分類

食品安全廣泛的定義為：食品的生產、加工、儲存、運輸和銷售等全過程中，確保食品不受生物性、化學性和物理性污染，並避免食品對消費者的健康構成危害的一套管理體系和標準。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食品安全的核心在於控制和預防各類食品污染源，從而保障人類健康（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2）。食品安全的概念涵蓋了從「農場到餐桌」的全程監管，涉及生產、加工、包裝、運輸、儲存和銷售的各個環節，這一概念不僅強調食品生產者的責任，也涉及相關監管機構、流通環節以及消費者的共同努力。

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必須採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實施良好的生產和加工規範（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GMP）、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HACCP）系統等風險管理機制，並加強政府的監管政策和企業的自我檢測措施。食品安全的確保不僅關乎消費者的健康，也直接影響食品行業的信譽和經濟效益。若企業未能妥善控制食品安全風險，將可能導致大規模的食物中毒事件，進而影響企業形象並面臨法律責任。綜上所述，食品安全不僅僅是一個公共健康問題，更是一項社會責任和經濟挑戰。透過有效的食品安全管理機制，社會大眾的飲食健康才能得到保障，同時也能促進經濟的穩定與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 二、全球的食物安全事件

世界糧農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專家委員會曾多次指出，經由食物污染所造成的疾病，可能是當今世界上最廣泛的衛生問題，而且也是經濟生產力降低的主要原因。如 1980 年全球人類死亡原因統計，當年全球死亡人數為 5,091 萬人，死於多種感染的高達 1,686 萬人，居各種死亡原因的首位。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約 560 多萬人係死於食物中毒及與飲食有關的腫瘤、高血壓、糖尿病和心血管等疾病（陳政忻，2011）。

無論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皆經常傳出重大食源性（foodborne）疾病案例，造成人們食品中毒，生命安全遭受威脅，如 1985 年美國爆發巴氏殺菌乳遭受沙門氏鼠傷寒桿菌（*S. Typhimurium*）汙染，估計當時病患數高達 17 萬人；另外，1991 年中國上海則因蛤蜊遭受 A 型肝炎病毒汙染，導致 30 萬人感染（Holly, 2010）。在全球化的食品供應鏈下，食安事件對於國際貿易與國家形象具有直接的影響力。食品安全事件一旦發生，可能導致消費者信心下降，國際市場對該國農產品與食品的信任度也會受到影響，對經濟和社會穩定構成威脅。

### 三、臺灣的食安議題

根據衛生福利部資料顯示，自 2017 年至 2022 年間，台灣每年發生的食品中毒案件平均約有 488 起，這顯示出食品衛生問題的嚴峻性（食品藥物管理署，2022）。而在近兩年（2023-2024 年），台灣所發生之食安事件包含：

- （一）2023 年「巴西蛋事件」：進口自巴西的雞蛋被發現有效日期過長，且製造地標示為台灣，引發對進口食品標示與安全性的質疑。
- （二）2024 年 2 月「蘇丹紅事件」：市售辣椒粉被檢出含有致癌物質蘇丹紅，這些受污染的辣椒粉被製成各式產品，流入市場，對消費者健康構成威脅。
- （三）2024 年 3 月「寶林茶室食物中毒事件」：台北市知名素食餐廳「寶林茶室」發生重大集體食物中毒事件，導致多人受害，甚至有 6 名死亡案例。

這些事件顯示，食品衛生問題在台灣仍時有發生，強調了加強食品安全監管與消費者自我保護意識的重要性。根據 Li 與多位學者於 2012 年的研究中，彙整出台灣食安事件發生的原因包含三個面向：（一）檢測技術不足：如塑化劑的檢測技術在事件發生前並未建立。（二）跨機構管理不一致：農委會和衛福部的標準不一致，導致管理混亂。（三）例如萊克多巴胺在美國、台灣和世界衛生組織的殘留標準不同。

##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探討各國重要之食品安全基本法原依據，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織的檢驗制度與台灣的食品安發展，作為研究方法。

### 一、全球的食品安發展

自 2002 年以來，歐美等國家已相繼以「食品安」作為食品基本法的法律名稱，如：歐盟《78/2002 規則》日本《食品安基本法》以及美國 2011 年訂定之《食品安現代法》...等。這些法規皆以消費者權益與公共健康保障為主要目標，並兼顧食品產業的發展與公平競爭。台灣的法律名稱原為《食品衛生管理法》，於 2014 年正式修正為《食品安衛生管理法》。從此管理法可得知，食品安的管理應是從生產源頭到終端消費，凡不適合食用的食品皆不得提供，以對消費者提供更全面性保障。食品安的範疇因此不僅是食材的檢核，更必須同時包括整個食品鏈生產過程，意即「從農場到餐桌」皆符合規定，才算食品安（洪德欽，2015）。

### 二、食品安的檢驗制度

目前國際上對食品追溯制度的一致要求為食品業者須能使權責機關或其它利害關係人在需要時，得知所有食品及所有加入食品之物質來源與去向（陳政忻，2011）。根據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4 年的食品標準委員會將食品追溯（Traceability/Product Tracing）定義為「可以追蹤食品在生產、加工及流通某一或多個特定階段的移動情形之能力」。換言之，建構完整的食品追溯制度可用來預防並減少食品中毒所造成之危害，而相關技術的開發則能協助提升食品安及追溯性。近期相關之技術如無線射頻辨識（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等微晶片及其讀取設備，能提供消費者每頭動物從出生到被屠宰的相關資訊（生產履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認為，生物技術、奈米技術及資通訊科技的蓬勃發展將可協助提升食品安。

### 三、臺灣的食品安全發展

我國的食品安全法規發展歷史悠久，自 1975 年以來已經歷了多次的演變與更新。當時建立的《食品衛生管理法》是台灣最早的食品安全法規，該法旨在規範食品的生產、加工、包裝及銷售等各個環節。然而，隨著全球食品安全標準的提升及國內消費者對食品安全意識的增強，該法規逐漸顯露出不足之處，迫使其進行必要的修訂和完善。2013 年，由於「大統油品事件」引發的食品安全危機，使得《食品衛生管理法》進行了重大的修正，這次修訂標誌著法律名稱的變更，成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這一變革不僅反映出臺灣對於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視程度提升，也顯示出政府對於食品安全的管理不再局限於食品衛生的範疇，而是擴展至食品的來源可追溯性及生產過程的全程監控（范代志，2017）。而在 2014 年的「餽水油事件」和「頂新劣質油事件」再次震動了社會，使得政府不得不加強食品安全的監管機制。在這一系列事件中，民眾對食品的來源及品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政府引入了吹哨者保護機制以及懲罰性賠償的條款，這些措施旨在鼓勵內部舉報並懲處違法行為。這些法規的修訂顯示出台灣對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視，並彰顯出政府希望利用更為嚴格的法規架構和更高的罰則來提升食品產業的透明度，進而增強消費者的信任感。在這樣的背景下，食品安全相關法規的變化不僅反映了政策制定者的應對策略，更是消費者對於安全食品需求不斷上升的體現。

目前，台灣的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已逐漸與國際標準接軌，採取了「從農場到餐桌」的全面風險管理模式。透過《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中的「食品追溯系統」，得以確保食品供應鏈的可追溯性。這一系統的建立使得消費者能夠追蹤食品的來源，從而增強了對食品安全的信心。此外，食品藥物管理署（FDA）和各地方衛生局負責食品的日常檢查和風險評估，這不僅確保了食品安全的即時監控，也為政策的落實提供了可靠的數據支持。透過這些機構的合作，我國在食品安全管理上建立了一個相對完善的制度。簡言之，台灣的食品安全法規經過近 50 年的發展，不僅反映了國內外食品安全事件的變化，也顯示出社會對食品安全問題的日益關注。在未來，隨著新挑戰的出現，臺灣的食品安全法

規將持續進行調整與創新，以滿足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和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期望。因此，這一法規的持續進化不僅是對歷史的回應，也是對未來食品安全環境的前瞻性思考。

## 肆、臺灣原住民族飲食及檳榔文化的研究結果

### 一、臺灣原住民族飲食文化

飲食是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同時也是文化傳承與表現的重要元素。臺灣多元族群共同塑造的飲食景觀與文化生態，不僅體現了地方特色，還承載著豐富的文化資本（許景秀、葉秀燕，2015）。其中，臺灣原住民族的飲食文化以其多樣性與獨特性，展現了與自然環境的緊密聯繫及深厚的歷史背景。然而，隨著全球化與都市化的加速，這些傳統飲食習慣正面臨外來文化的衝擊，並伴隨食品安全風險的增加，使得傳統飲食更難開展和傳播。研究指出，飲食文化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受地理環境、社會結構和歷史背景的影響（Wahlqvist, 1993）。飲食習慣不僅反映了族群的生存智慧，也體現了其對自然的適應能力。從社會學的文化適應理論（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y）來看，文化會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而逐漸演變；而人類學的文化身份理論（cultural identity theory）則強調飲食在文化認同中的核心作用。這些理論為分析臺灣原住民族飲食文化的演變提供了有效框架，並有助於探討食品安全問題的深層原因。

如前述，臺東金峰鄉發生的一起集體中毒事件，充分揭示了食品安全議題的多重挑戰與複雜性。數十名部落族人因食用含「蝸牛」的食品而出現中毒現象，其中有人不幸死亡。這起事件反映出不當的食材處理方式可能引發嚴重的健康問題，也對原住民族的社會形象造成負面影響。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公眾與媒體的焦點往往集中於生產與製造端，特別是添加物、殘留物或成分的安全性。然而，食品安全風險同樣存在於保存、運輸過程中，甚至可能源於不當的料理或食用方式。又某些長期存在的飲食習慣，因受文化影響而形成，也可能

對食品安全構成挑戰。以卑南族為例，年祭以驅邪儀式揭開序幕，青年塗炭揮舞芭蕉葉驅除晦氣。接著的猴祭，少年完成模擬殺猴與葬猴儀式（現以草紮猴替代），象徵成年與生命意涵，並接受「杖臀訓誡」學習長幼有序。高潮部分為大獵祭，男性入山受訓，學習狩獵技藝與部落傳統，歸來後婦女搭建凱旋門迎接，以圍圈歌舞結束（李怡欣，2021）。因禁獵政策影響，卑南族大獵祭改以捕捉田鼠，逐漸形成田鼠（kulabaw）料理的文化特色。田鼠料理的形成深受環境變遷、生態調整及文化認同等多重因素的影響。然而，其傳統製作方式是否符合現代食品安全標準，仍是一個有待深入探討的議題。

在此背景下，相關機構應強化對傳統食材的科學研究，並制定適切的食品安全標準，實現保護原住民族飲食文化與保障公共健康的平衡。這不僅有助於傳承與弘揚這些文化特色，還能增進社會對原住民族飲食文化的理解與尊重。透過政策支持與文化教育的推動，原住民族的飲食文化將能在現代社會中持續發展，兼顧文化保存與食品安全的雙重目標。

## 二、臺灣原住民族檳榔文化與公共健康

檳榔在 21 世紀因被研究證實具成癮性且顯著提高口腔癌風險，已成為公共健康警示的象徵。其文化與社會意涵隨著時代變遷展現多樣性，從明鄭時期原住民族的祭品與禮物，到光復初期藍領勞工的提神食品，再到現今與口腔癌及「臺客文化」的連結，反映了不同時期臺灣族群的生活與風俗變遷（林家仔，2021）。然而，隨著健康議題的重要性提升，檳榔的公共形象逐漸受到污名化，其文化價值與社會角色亦被簡化為負面的健康與環境問題。

對於臺灣原住民族而言，檳榔不僅是日常食物，更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其意涵超越了基本食用需求。檳榔在原住民族的社交場合中，作為交換禮物、祭祀供品以及文化傳承的象徵，類似於漢族文化中的茶道，體現了尊重與待客之道（楊政賢，2021）。儘管如此，檳榔的健康風險亦不可忽視。研究指出，長期嚼檳習慣，特別是在使用石灰搭配的情況下，會顯著增加口腔癌的發病率，且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口腔癌已成為臺灣男性十大癌症死因之一，與檳榔咀



嚼習慣密切相關。同時，檳榔的生產與消費過程中存在多重挑戰。例如，其生產環節中農藥、重金屬及其他添加物的使用缺乏有效監管，對食品安全構成潛在威脅。此外，檳榔與健康問題的聯結也進一步強化了「原住民族愛吃檳榔」的刻板印象，無形中助長了對原住民族的文化偏見與社會歧視。此類刻板印象忽視了檳榔在原住民族文化中的歷史與象徵意義，僅從單一健康風險角度將其簡化為負面問題，反映了公共健康論述與文化多樣性之間的張力。

2021 年，國人因攜帶檳榔入境土耳其，遭海關以「輸入毒品或違禁品罪」移送法辦，引發廣泛關注。檳榔內含的「檳榔素」被證實具有成癮性，可引發依賴、唾液分泌過多、心悸等症狀，停用後甚至可能導致睡眠障礙與焦慮等戒斷反應。基於此，土耳其、澳洲、加拿大、新加坡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均將檳榔列為毒品，美國亦將其視為違禁品禁止攜帶入境（林逸卉，2022）。此事件凸顯全球健康與法規對檳榔的高度警戒，亦反映其文化價值與國際規範間的張力。這些案例為臺灣提供了借鑑的管理參考，特別是在如何平衡公共健康與文化保存之間的矛盾。然而，完全仿效國際禁令模式或許並非最佳選擇。臺灣應在考量本地文化與經濟現實的基礎上，探索更為多元且具包容性的管理策略。例如，可以加強對檳榔生產的規範與監管，減少農藥及其他有害物質的使用，同時推動健康教育，減少嚼檳人口並降低相關健康風險。政策制定者需充分理解檳榔的文化意涵與經濟影響，從而制定兼顧公共健康與文化多樣性的整合性政策，避免簡單的禁令政策可能導致的文化斷裂與社會對立。

我國衛生福利部將於 2024 年底提出《檳榔健康危害防制法（草案）》，針對檳榔嚼用行為進行嚴格規範。明確規定禁止未成年人及孕婦嚼用檳榔，並限制在公共場所使用。同時，考量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與祭儀需求，草案特別擬定例外條款，允許在此背景下使用檳榔不受上述限制（陳婕翎，2024）。此法案體現了多元文化保障政策的初衷，旨在在公共健康與文化保存之間取得平衡。然而，該法案的實施仍存在潛在挑戰。例如，如何界定何為「基於傳統文化與祭儀需求」的正當使用，可能在執法過程中引發爭議。此外，若未成年人或孕婦參與此類祭儀活動，相關規範是否適用亦可能產生模糊空間。這些問題

反映出文化例外條款在實施層面可能面臨的操作困難。從學術視角看，此法案在公共健康與文化多樣性之間的權衡值得肯定，但應避免形式化的例外規定，導致文化價值被工具化或健康政策失焦。未來可建議未來政策規劃中，結合原住民族代表意見，細化文化例外條款的適用範疇與標準，並加強健康教育，促進族群對檳榔健康風險的理解，實現更具包容性與執行力的法規設計。

基於上述背景，臺灣政府近年來開始逐步對檳榔實施管制政策。馬維芬等（2017）指出檳榔在臺灣原住民族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文化意涵深植於日常與傳統中。然而，專業人員在推動戒除檳榔的倡導過程中，由於未能充分理解其文化價值與社會意義，導致相關宣導無法有效獲得原住民族的認同。這種文化與健康政策間的落差，使得原住民族在實施戒除檳榔行為時面臨困難，嚼食檳榔的比例始終維持在較高水準。故早期因檳榔與原住民族文化的深厚聯繫，政府對其管理態度相對寬容，然而隨著健康風險的科學證據累積，相關政策開始轉向強化控管。當前，政府已禁止檳榔在學校及公共場所的販售與使用，並推動產業轉型計劃，對檳榔從業者提供健康風險教育，鼓勵其向其他經濟模式轉型。

綜觀上述為，平衡文化保護與健康風險管理，政府在政策制定與推行中需充分考量原住民族的文化脈絡與權益保障。廣泛進行族群協商，聆聽原住民族的聲音，並尊重其飲食與文化習慣，是政策成功的關鍵。同時，應提供替代的文化象徵與經濟支持方案，以減少對族群傳統的衝擊。透過妥善的政策設計與溝通，臺灣可以在保護公共健康的同時，維護原住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實現健康與文化的雙贏局面。

## 伍、結論與建議

臺灣原住民族的食品衛生安全問題具有多層次性，涉及文化、歷史與社會經濟等多方面因素。近年來的集體中毒事件突顯了正視並解決這些問題的緊迫性。透過政府、社會與部落的共同努力，推動原住民族食品衛生安全的提升，

不僅能有效保障族群健康，更能彰顯對其珍貴文化遺產的尊重與永續傳承的重要性。

## 一、研究結論

除了小米粽（cinavu）和檳榔文化外，臺灣原住民族的其他飲食文化也面臨類似挑戰。許多原住民族群在傳統的捕魚、狩獵及採集活動中，所使用的食材和製作方法未必符合現行的食品安全標準。為了緩解這些衝突，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時需充分考量原住民族的文化特性與實際需求，茲分述如下：

- (一)應在食品安全標準中引入彈性設計，允許原住民族在特定文化脈絡下使用傳統方法製作食品。在檢驗過程中，應考慮到傳統製作方式的特點，而非僅依賴現代化標準。這樣的彈性規範能更有效地平衡文化保護與食品安全要求。此外，政府應設立專門的食品安全監管機制，針對原住民族的手工食品進行更具彈性的檢驗，以確保食品安全的同時尊重文化多樣性。
- (二)應加強原住民族對食品衛生安全的教育與宣導，提升其對相關知識的認知水平。通過舉辦工作坊和講座，向原住民傳授食品衛生的最佳實踐，幫助他們安全地處理和選擇食材。這不僅能促進食品安全，也能支持原住民族在現代環境下更有效地保護與延續其傳統飲食文化。
- (三)針對如何在原民傳統飲食文化及食安標準間取得平衡，本文提出三個核心的解決方案：
  - 1.制定專屬於原住民族食品的特殊標準：
 

考量文化保護的重要性，設立適用於原住民族傳統飲食製作方式的彈性規範，確保文化傳承與食品安全共存。
  - 2.推行原住民族食品的標籤制度：
 

通過產銷履歷系統，提升消費者對原住民族食品的信任度，同時促進市場對這類食品的接受與認同。
  - 3.促進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對話與合作：

建立政府、原住民族社區及食品安全檢驗單位之間的溝通與協作機制，共同探討平衡文化多樣性與食品安全的有效解決途徑。

## 二、研究建議

以下建議旨在為未來研究者提供參考，深入探討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在傳統文化保護與食品安全需求之間實現適切的平衡。透過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增進對原住民族飲食文化的理解與尊重，同時有效保障其健康與安全，將有助於推動文化多樣性與公共健康目標的協調發展。

### (一)推動文化敏感的風險溝通

建立針對原住民族文化飲食權利的豁免機制，可參考其他國家的模式，允許特定文化食材在特定條件下豁免於一般食品安全法規的限制。同時，針對傳統食材制定必要的衛生條件，以在尊重文化價值的同時保障食品安全。

### (二)制定原住民族食材的專項檢測技術

開發適用於原住民族特色食品的檢測標準，涵蓋田鼠、飛鼠、馬告、檳榔等常見傳統食材，並針對重金屬殘留、農藥使用及寄生蟲檢測建立專門技術規範，確保傳統食材的安全性與科學管理。

### (三)構建原住民族專屬的風險溝通平臺

開發針對原住民族的食品安全教育資源，透過社區導向的風險溝通平臺，提升對健康風險的認知，例如正確處理田鼠與野菜等食材的方法，避免因資訊不對稱而引發的集體中毒事件，實現公共健康與文化傳承的雙重目標。

## 參考文獻

### 中文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2019）。聯合國將6月7日定為「世界食品安全日」。食品安全資訊網-食安報馬仔。取自：

<https://www.ey.gov.tw/ofs/15881103EFD02C4/1eee4a9e-c0f9-4259-835d-732f660479f5>

李怡欣（2021）。島嶼群慶。鄉間小路，47(1)，i-ii。

李凰綺、吳帛儒（2024）。全球食品安全倡議（Global Food Safety Initiative）2024年度會議出國報告。行政院。

Kacaw · Mayaw（周浩伊）、陳民紋（2024）。媒體聳動標題引熱議：原民飲食文化受汙名。TITV News 原視新聞網。取自：

<https://news.ipcf.org.tw/139736>

林家仔（2021）。臺灣檳榔意象。載於中原大學設計學院（主編），ICFXD 2021 未來x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e45-10-1-11）。桃園市：中原大學設計學院。

林逸卉（2022）。檳榔竟然在國外算是毒品?!時代新知不可不知。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健康促進管理中心。取自：

[https://www.cth.org.tw/?aid=409&pid=0&page\\_name=detail&iid=921](https://www.cth.org.tw/?aid=409&pid=0&page_name=detail&iid=921)

周桂田、徐健銘（2015）。從土地到餐桌上的恐慌。臺北：商周。

洪梅花（2012）。排灣族身體文化之探究 -以屏東縣三地門鄉小米收穫祭(masalut)為例（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屏東市。

洪德欽(2015)。歐盟食品安全制度對臺灣食安改革的啟示。臺大法學論叢，(44), 1163-1236。

范代志（2017）。台灣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與國際接軌之可行性研究－以TQF為例。管理與系統，24（3），341-360。

陳宗韓、李美嬋、李佩伶（2016）。台灣原住民的食物接觸與認同之分析。全人教育集刊，(3)，17-34。

陳政忻（2011）。全球食品安全發展趨勢。農業生技產業季刊，(27)，7-10。

陳婕翎（2024年12月22日）。檳榔專法草案預告兒少孕婦禁吃-擬原民文化不受限。中央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412220077.aspx>

許景秀、葉秀燕（2015）。原民飲食作為文創產業－臺東達魯瑪克部落的創意／異／藝族群料理。《中國飲食文化》，11(2)，69-109。

馬維芬、李佳霽、Ellen R. Gritz、Irene Tamí-Maury、Cho Lam、林正介（2017）。連接自我與家鄉的信物－檳榔在台灣原住民族文化中的角色。《護理雜誌》，64(3)，65-73。

葉秀燕（2020）。原食力：原住民飲食文化做為食農教育的社會實踐。《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8(3)，167-212。

楊政賢（2021）。打開綠色的文化膠囊——臺灣原住民族「檳榔」的多重品味。《原住民族文獻》，(46)。

衛生福利部。《歷年食品中毒資料》。取自

<https://www.fda.gov.tw/TC/sitecontent.aspx?sid=323>

## 外文

Hauschild, A. H., & Gauvreau, L. (1985). Food-borne botulism in Canada, 1971-84. *CMAJ: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133(11), 1141-1146.

Holly, Rick. (2010). Product Traceability.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hih, Y., & Chao, S. Y. (1986). Botulism in China. *Review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8(6), 984-990.

Wahlqvist M. L. (2000). Clinicians changing individual food habit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9(1), S55-S59. Retrieved from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439827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2). *Food Safet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food-safety>

## 研究論文

# 青少年偏差行為防治教育與輔導策略之研究<sup>\*</sup>

楊安仁

靜宜大學社會企業與文化創意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潘孝勤

靜宜大學原住民族健康與社會福利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郭俊巖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特聘教授

莊慧民

靜宜大學犯罪防治法學碩士

胡宜芳<sup>1</sup>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

收稿日期：2025 年 02 月 20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5 年 04 月 09 日。

<sup>\*</sup> 本文作者團隊的排序已經過討論確認。

<sup>1</sup> 本文通訊作者為胡宜芳：d1213002@ncue.edu.tw。感謝二位匿名審查委員的肯定，並提供寶貴的修正意見。

## 中文摘要

本研究聚焦於探討台灣兒童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防治教育與輔導策略，強調社會快速變遷、家庭功能失調及價值觀扭曲對青少年行為的影響。研究指出，青少年偏差行為包括逃學、翹家、偷竊、霸凌、抽菸、藥物濫用等，並可從心理學、社會學與犯罪學等多角度分析其成因。心理層面包括衝動控制、自我效能、同儕壓力等；社會因素則涵蓋家庭結構、教養方式與社會環境影響；而犯罪學視角則涉及社會控制失衡與偏差學習。

研究採用質性研究與文獻分析法，結合教師實務經驗與研究生課程回饋，分析偏差行為的輔導與處遇策略。具體策略包括品格教育、心理輔導、家庭介入、同儕互動引導、校園安全機制與社區支持系統。法規層面上，研究評析了《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家庭教育法》等，認為應強化早期預警與跨部門合作，並落實監督與資源分配，以提升政策成效與干預力。

本研究建議，針對偏差行為之防治應採多層次綜合策略，整合學校、家庭、社會與法律資源，提升師長與家長介入能力，並建立有效的輔導機制，以促進青少年健全發展。

**關鍵詞：**偏差行為、防治教育、輔導策略



## **A Study on the Prevention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Strategies for Adolescent Deviant Behavior**

**An-Jen Yang**

Associate Professor, Master Program in Social Enterprise &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Providence University

**Hsiao-Chin Pan**

Student of Ph.D. Program in 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for Indigenous Peoples, Providence University

**Chun-Yen Kuo**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t. of Social Work & Child Welfare, Providence University

**Hui-Min Chuang**

Master of Law in Crime Prevention

**Yi-Fang Hu\***

Student of Ph.D.,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deviant behavior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aiwan. It emphasizes the influence of rapid social changes, dysfunctional family structures, and distorted values on youth behavior. The research identifies various forms of deviant behavior such as truancy, running away from home, theft, bullying, smoking, and substance abuse. These behaviors are analyzed from psychological, sociological, and criminological perspectives.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clude impulse control, self-efficacy, and peer pressure; social factors involve family structure, parenting styles,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while criminological views consider social control imbalances and deviant learning processes.

The study adopts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s, integrating practical experiences from educators and feedback from graduate-level coursework to examine counseling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Specific approaches include character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family involvement, peer interaction guidance, school safety mechanisms, and community support systems. At the legal level, the study reviews relevant laws such as the Juvenile Delinquency Act, the Child and Youth Welfare and Rights Protection Act, and the Family Education Act. It advocates for strengthening early warning systems, inter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and effective supervis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to improve policy effectiveness and intervention capacity.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a multi-level, integrated strategy is essential for preventing deviant behavior. It call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chool, family, social, and legal resources, the enhancement of teacher and parent engage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ffective counseling mechanism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Keywords:** deviant behaviors, prevention education, counseling strategies

## 壹、前言

本研究緣起於教育研究所教授「兒童青少年偏差行為專題研究」，轉銜至犯罪防治碩士學位學程開設「青少年犯罪與處遇專題研究」，以青少年犯罪防治教育與輔導策略主題作為研究，用課程之準備與研究生對防治教育之回饋與建議，探討青少年偏差行為之輔導策略，促成此研究的成果。

本研究亦希望能瞭解，目前台灣對於偏差行為少年輔導處遇的研究發展與專業論述發展為何，探詢其中的共通點，並從中發現對於偏差行為青少年實際有效的輔導及處遇方式，透過檢視過往經驗探詢進步的方向，而不只是各單位逕自照著各自的期待投注資源，多頭馬車雖可能有機會對於單一少年產生影響，然而卻難以擴展良好之成效。

### 一、研究背景

台灣由過去傳統的農業社會，快速轉型成為工業化、商業業化與都市化的社會，在新舊社會轉型過程中產生出許多重大的社會問題。又隨著當今台灣社會家庭結構的變化、少子化及多元發展的影響，不難發現由於父母過度的呵護與無節制的關愛，致使青少年價值觀與獨立判斷的能力不斷地扭曲與流失，因而造成現今台灣社會諸多青少年新興的犯罪議題日趨嚴重。在社會整體環境急速的變動下，國內近年犯罪型態發展出過去前所未見的多元社會犯罪現象，如網路世界的崛起擴大了社會整體性價值觀更新或扭曲，而造成青少年許多不為社會認同的思維與風潮。故此，如何輔導與導正在青少年階段出現偏差行為的青少年應是為當前教育與家庭重要的課題。

司法體系對於諮商心理及助人專業有其限制，儘管部分法院編制內專業人員，例如少年保護官或心理輔導員，個人持有心理師或社工師等專業證照，司法院卻未開放執業登記，也就是讓這些具備助人專業的公務員必須抉擇自己的專業角色。然而，基於偏差行為少年輔導處遇的工作本質，並未抵觸，而是相輔相成的專業能力。如此一來，發現到少年司法體系相關專業人員秉持無公務職責，儘管處於助人領域，實際從事輔導偏差行為少年輔導處遇工作，卻不便

運用職權充分發展助人專業。

矯正系統之少年中途學校雖然曾有開放接受諮商心理師實習訓練之經驗，卻也恰逢空間及人力緊繃而難以接受大量申請安排，遺憾諮商人力在青少年司法領域尚未能獲得重視。縱然遭遇阻礙困難，遺憾難以在實習階段進入少年司法體系貢獻一己所能。本研究不忘初衷，秉持對於偏差行為少年輔導處遇之熱忱與使命，希望透過內容分析以呈現台灣偏差行為少年輔導與處遇之相關研究及專業論述的發展，深入分析探討妥善而有效之偏差行為少年輔導處遇模式，整合分析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作為實務及學術發展參考。

## 二、研究目的

有些青少年在犯罪行為後呈現出無所謂的態度，何以當今的青少年會有如此的樣貌，沒有完備的輔導機制適時的介入及配合，無法有效導正其偏差行為，青少年偏差行為及犯罪行為在行為初期的介入輔導得重要，方能達到犯罪預防的措施。然而，青少年為國家未來之棟樑，青少年若在此階段因初期偏差行為導致犯罪行為，除危害社會安全外更會造成國家競爭力下降。故此，國、高中學齡階段中重要的角色是其父母與學校老師，倘父母的關愛與陪伴，及學校老師適切且有效處理青少年初期產生的偏差行為，如逃學、翹家、說謊、偷竊等，如能施以協助與輔導，方能導正其偏差行為並能建立其良好的品格，始能遏止將來步入歧途成為社會法治之問題。

所謂偏差行為（delinquency）一般指違反一般人適用的固定行為標準模式之行為。根據學者彭怡芳、曾育貞（2003）指出「偏差行為既是由社會規範所界定，在認可或排斥之規範本身，會因時間與空間的轉移及社會、文化與情境的不同而轉變」。偏差行為的範疇比犯罪行為更為廣泛，舉凡違反法律規定之犯罪，如殺人、聚眾、偷竊及違反社會價值與道德觀之行為，如逃家、翹課皆屬之（許春金，2003）。本研究所指之偏差行為是指違反常規行為（如逃學、翹家、抽菸）及法律明定之犯罪行為（如偷竊）進行探討。

一般而言，輔導是指透過受過專業的輔導人員，用以專業幫助個案在了解

自己，在學校、社會要求的關聯之下，期用專業知能協助了解自己的能力和興趣、人際關係等，對於生活環境上的適應問題能夠做自我的判斷，發展潛能與建立健全的自我概念，做出在學習、生活、生涯等各方面的明智選擇，以達成社會自我實現(social-self direction)的教育功能。

## 貳、文獻探討

人們的行為偏差在社會各個階層都普遍存在著，國、高中學齡階段中的青少年尤為顯著，由於此一時期青少年個體上身體、生理正迅速地發展，且青少年獨自面對身心變化及又在家庭與社會解構變遷下等多方的壓力，皆有可能致使青少年因身心狀態產生不平衡及適應不良的現象，繼而出現脫序的偏差行為。

青少年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其身心發展與行為模式不僅影響自身的成長，更攸關社會的安定與發展。然而，隨著社會快速變遷與價值觀多元化，青少年所面臨的挑戰與壓力也日益複雜，偏差行為的發生頻率與類型呈現多樣化趨勢，包括逃學翹家、說謊偷竊、藥物濫用、網路霸凌等，對家庭、學校與社會造成深遠影響。蕭孟平與黃國彰（2020）指出，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形成往往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涉及家庭功能、學校環境、同儕影響及社會文化等面向。因此，對於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預防與介入策略，需從多角度探討其成因，並設計切合實務需求的輔導方案。

本研究旨在回顧並整合現有文獻，以理論與實務相結合的方式，探討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關鍵因素及相關輔導策略之成效。首先，討論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定義，並進一步分析逃學、翹家、偷竊行為、抽煙、喝酒和藥物濫用行為的成因；其次，檢視國內外有關青少年偏差行為輔導策略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多機構合作模式的實施經驗；最後，反思文獻中的研究空白與不足，為後續研究設計與實證分析奠定基礎。通過系統性的文獻探討，期望為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預防與輔導提供更具前瞻性與操作性的理論支持與策略啟示。

### 一、青少年偏差行為

## (一)偏差行為定義

青少年偏差行為（juvenile deviant behavior）通常指未成年者在心理、社會或法律層面上，違背社會規範、倫理或法律的行為表現。這些行為雖未必構成刑事犯罪，但其偏離常規的特質，可能對個人、家庭及社會帶來負面影響。根據 Lemert (1951) 的偏差理論，偏差行為可分為初級偏差（primary deviance）和次級偏差（secondary deviance），前者指個體初次偏離社會規範的行為，後者則因社會標籤化導致行為者自我認同為偏差者，進一步加劇其偏差行為。

### 1.偏差行為的類型範疇

偏差行為（deviant behavior）泛指未遵循社會普遍接受的規範、道德準則或法律規定的行為表現。對於青少年而言，偏差行為不僅是其生理和心理發展過程中常見的挑戰，也是家庭、學校及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文獻指出，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類型在不同的時空架構及文化塑造下，會延伸出不同型態的偏差行為表現，細分下可歸類為學校、家庭及社交等多個層面，若不及時做出相關的預防或輔導措施，極有可能進一步演變為違法行為（Hirschi, 1969）。這些行為不僅會對青少年自身的身心健康和未來發展造成影響，還可能危害社會秩序與公共安全。因此，探討偏差行為的範疇及特徵，對制定有效的預防與輔導策略具有重要意義。尤其又 Merton (1938) 的緊張理論（strain theory）進一步闡明，偏差行為往往是青少年在無法合法實現社會目標時的替代策略。這些行為多數集中於下列四個主要範疇：

#### (1)學校相關偏差行為

學校是青少年社會化的重要場域，但也可能成為偏差行為的溫床。逃學、翹課、考試作弊、霸凌同學等行為，是學校相關偏差行為的典型表現。在黃永輝（2010）的研究中即指出，學校相關的偏差行為背後，往往隱含著複雜的心理與社會因素，其中學校壓力及缺乏歸屬感是重要的誘發原因。青少年在學校中感受到的壓力，例如學業負擔、同儕排擠或與教師的衝突，往往是這類行為的主要原因。此外，在校園中的霸凌行為隨著通訊軟體及硬體設備的日新月異，

近年來更逐漸呈現網路化的趨勢，因此網路霸凌已成為全球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新類型。

## (2)家庭相關偏差行為

家庭是塑造青少年行為模式的基礎，但家庭功能失調或親子關係緊張可能引發一系列偏差行為，因此，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產生，部分往往與家庭環境相關，進一步言說，家庭作為孩子成長的首要環境，對其行為、價值觀及心理發展有著相對深刻的影響。家庭功能的完整性、父母的教育方式、家庭結構、家庭暴力及親子關係等因素，均可能是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根源。以下將詳細探討這些家庭因素如何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發展。離家出走、頂撞父母或逃避家庭責任，均屬家庭相關偏差行為。

## (3)社交相關偏差行為

社交相關偏差行為是指青少年在社交互動中表現出不符合社會規範或期望的行為，這些行為可能包括對他人不尊重、攻擊性行為、社交孤立、欺凌或其他反社會行為。這些行為通常會影響青少年在學校、家庭及社區中的人際關係，並且可能對他們的社會適應能力產生長期的負面影響。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對同儕群體的歸屬感需求強烈。當這種需求無法在正向環境中滿足時，可能轉向參與幫派、打架鬥毆或其他反社會行為。

## (4)違法及危害性行為

當偏差行為跨越法律界限时，便成為刑事問題。偷竊、吸毒、非法駕駛、毆打他人等行為，均屬違法行為範疇。這類行為不僅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重大威脅，也可能導致其進一步陷入犯罪的惡性循環。青少年違法及危害性行為的問題，向來是社會學、心理學及犯罪學等領域的研究重點。這類行為不僅會對青少年個人的成長與發展造成深遠影響，也可能對社會造成不小的威脅。因此，分析青少年違法及危害性行為的原因及其影響。

## (二)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多角度成因

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研究涉及心理學、社會學和犯罪學等多個領域，每個領域根據其不同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對偏差行為有不同的定義和理解。從心理學、社會學和犯罪學角度來看，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定義和成因各具特色，但無論從哪個角度出發，都可以發現這些行為的多因性。心理學強調內在心理發展與情緒控制問題；社會學關注社會環境、社會結構與社會化過程中的問題；而犯罪學則側重於法律和社會控制機制的缺乏以及犯罪行為的學習過程。綜合這些角度的理解，青少年偏差行為可以被視為多重因素交織影響的結果，需要從多維度綜合考慮其成因和干預策略。

### 1.心理學角度

在心理學中，偏差行為通常與個體的情緒、認知和行為發展有關。心理學家認為，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往往與其心理發展過程中的某些困難或異常有關。這些行為可以看作是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不足、情緒調節困難或人格特徵異常的表現。

#### (1)情緒與認知發展的影響

青少年正處於心理發展的過渡期，情緒波動大、衝動性強、認知發展不完全，這使得青少年容易做出衝動的決策，甚至表現出反社會或不規範的行為。例如，青少年期的自我認同危機和探索行為，可能會引發與家長或社會規範的衝突，表現為偏差行為。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son）提出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就指出，青少年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自我認同與角色混亂的問題，如果無法成功解決這一階段的衝突，可能導致行為上的偏差，如叛逆、暴力、吸毒等。

#### (2)心理健康與偏差行為

心理學中，許多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可與心理健康問題，如焦慮、抑鬱、情緒障礙等有所關聯。這些心理問題可能導致青少年對生活和社會規範的理解有所偏差，從而表現出反社會行為。根據徐美玲（2007）的研究，青少年偏差行

為的發生與其心理發展的未成熟有很大關聯，特別是情緒調節能力的缺乏和自我控制能力的不足。心理健康問題是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重要因素。

### (3)人格特徵與偏差行為

心理學也關注青少年的人格特徵，特別是衝動性、冒險性及低自我控制等特徵。這些人格特徵的異常發展可能使得青少年更容易進行衝動的違法行為。青少年若具有高衝動性或低自我控制，可能容易進行危險行為或表現出反社會行為，這與其人格特徵有密切關聯。

## 2.社會學角度

社會學的視角強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社會背景，特別是社會結構、文化規範和社會化過程對青少年的影響。社會學家認為，青少年的偏差行為不僅僅是個人的心理問題，還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尤其是家庭、學校、同儕群體等因素的影響。

### (1)社會化過程中的偏差

社會學家認為，偏差行為可能是在社會化過程中，青少年對社會規範理解不一致或無法有效內化規範所導致的。這種社會化過程可能受到家庭教養、學校教育、同儕群體等方面的影響。貝克（Becker, 1963）在其標誌性作品《外部標籤》中提出了「偏差標籤理論」，認為青少年若在某一階段被標籤為「問題青少年」，這種標籤會進一步加劇他們的偏差行為，形成自我實現的預言。

### (2)社會結構與不平等

社會學家也強調，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可能是由社會結構的不平等所造成的。貧困、失業、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家庭結構問題等都會影響青少年的行為選擇。處於弱勢群體的青少年可能更容易表現出偏差行為。社會結構中的不平等現象可能會導致青少年感到社會排斥，進而選擇通過偏差行為來表達反抗。

### (3)同儕與文化影響



青少年期是同儕影響力最大的一個階段。同儕群體的影響常常決定了青少年的行為選擇，特別是當同儕群體持有反社會態度或價值觀時，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儕的推動，參與到偏差行為中。馬丁（Matza, 1964）在其「中立化理論」中提到，青少年可能在受到同儕的影響下，進行一些輕微的偏差行為，而這些行為逐漸累積，形成更嚴重的偏差行為。

### 3.犯罪學角度

犯罪學的研究視角主要聚焦於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法律層面，尤其是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動機和後果。犯罪學家認為，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根源在於其對社會規範的無視，這可能與結構性因素、家庭背景、社會支持體系等密切相關。

#### (1)社會控制理論

犯罪學中的社會控制理論認為，偏差行為是由於青少年在社會中缺乏有效的控制或約束機制。當青少年缺乏來自家庭、學校或社會的正向控制時，他們就容易進行偏差行為或犯罪。李茂生（2000）引用墨頓（Merton）的緊張理論（Strain Theory），認為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和目標與手段之間的失衡，會導致犯罪行為的產生。是以，當青少年缺乏強烈的社會連結和控制時，他們容易對社會規範產生疏離感，從而衍生偏差行為。

#### (2)結構性與功能性犯罪理論

犯罪學的結構性與功能性理論認為，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出現與社會結構的功能失調密切相關。結構性的社會問題，如貧困、失業、教育不公平等，會使青少年在生活中面臨更多挑戰，從而增加其偏差行為的產生。換言之，當青少年所處的社會環境提供的合法手段有限時，他們可能會選擇非法手段來達成目標，這就可能引發犯罪或行為偏差。

#### (3)差異接觸理論

差異接觸理論認為，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出現，是由於其長期接觸到特有偏差態度的群體，並在這些群體中學習到反社會的行為模式。此理論更進一步的

核心觀點總結了青少年處於不同環境之中所引發的價值觀變異，有以下三點：  
a.學習的社會性，即犯罪行為並非天生，而是透過與人互動學習而來。b.影響的多樣性，則闡釋了犯罪行為的學習受頻率、持續時間、親密程度和重要性的影響。c.價值觀的傳遞：犯罪行為的學習不僅包括技術，還包括對行為正當性的合理化解釋。

以上述三個角度的成因面向可以觀察出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多因性與交互作用，清晰解釋了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產生並非單一因素導致，而是心理、社會、家庭及環境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青少年可能因家庭壓力而情緒失控，進一步因同儕影響而加入犯罪次文化群體。

青少年是人格與行為形成的關鍵階段，特定的環境或社會影響在此階段作用放大。若未及時介入輔導，偏差行為可能延續至成年。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防治應採取多層次的策略，包括心理輔導，如情緒管理與自控訓練、改善社會結構，如教育平等與經濟支持以及社區干預，如強化社會連結與增加正向活動。心理學、社會學與犯罪學的整合視角，不僅幫助深入理解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成因，也為未來的干預與預防措施提供了科學依據與實踐方向。

## 二、青少年逃學、翹家成因

青少年逃學與翹家行為一直是社會各界與教育領域關注的重要議題。這些行為通常被視為偏差行為的一部分，不僅影響個體的學業與心理健康，也可能導致更嚴重的社會問題。根據相關研究，逃學與翹家的成因是多重且複雜的，涵蓋了家庭、學校、同儕和個人心理等層面，且這些因素之間存在交互作用，使問題更加難以單一解釋。

### (一)逃學行為的成因

青少年逃學行為是一種普遍且值得關注的教育與社會問題。該行為的發生往往與學校內部的經驗及情感相關，研究指出，學校環境中的壓力源及社會互動不良是主要的成因之一。以下將從課業壓力、師生關係以及校園霸凌與同儕

影響三個層面進一步探討。

### 1.課業壓力與逃學行為

在學術競爭激烈的環境中，課業壓力是導致青少年逃學的重要因素之一。學校對學生成績的高期待，經常使學生感到負擔過重，尤其是在應試教育體系中，青少年往往因無法達到成績要求而選擇逃避學校（黃志成，2018）。研究顯示，當學生感到學業無法負荷或缺乏學業成就感時，便會對學校產生排斥心理（蔡茂松，2013）。類似地，國外文獻亦指出，過重的學業壓力與高期望可能導致學生的焦慮水平升高，進而以逃學作為緩解壓力的方法（Finn, 1989）。因此，如何減少課業壓力對學生的負面影響是教育體系亟待解決的問題。

### 2.師生關係與逃學行為

青少年與教師之間的互動質量在逃學行為中也扮演關鍵角色。研究顯示，當學生與教師關係疏遠，或感到教師對其缺乏支持時，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會顯著降低（李茂生，2005）。例如，教師的批評或過於嚴厲的管理可能會使學生產生反抗心理，進一步促使逃學行為的發生（王馨婷，2017）。國際研究則強調，正向的師生關係能增強學生的學校參與度，進一步降低逃學的發生率（Wentzel, 1998）。因此，培養和諧的師生互動，並建立信任與支持的關係，對於減少逃學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 3.校園霸凌與同儕影響

校園霸凌和同儕排擠是另一個造成青少年逃學的顯著因素。受害者通常因害怕再次受到欺凌或排擠，而選擇逃避校園生活（陳麗萍，2015）。國內研究顯示，霸凌受害學生往往表現出焦慮、抑鬱等心理問題，並伴隨著逃學的傾向（劉怡欣，2019）。此外，國際學者 Rigby（2000）也指出，長期暴露於霸凌情境中的學生，可能因缺乏支持系統而最終放棄學校教育。同儕排擠不僅使學生感到孤立，還會削弱他們對學校環境的歸屬感，進一步影響他們的學業持續性。因此，建立包容性和支持性的校園文化，是預防逃學行為的重要一步。

根據上述分類，顯而易見青少年逃學行為是一種由多重因素交織而成的現象。課業壓力、師生關係不良及校園霸凌等問題，均會削弱學生對學校的認同與參與感，進而導致逃學行為的發生。透過文獻分析可以發現，學校內外部環境的改變，以及提供情緒支持和學業輔導，是減少逃學行為的關鍵策略。希望未來的教育政策能針對這些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從而為學生創造更加健康的學習環境。

## (二)翹家行為的成因

翹家行為是青少年偏差行為中較為常見的一種，其原因通常與家庭結構、親子關係及教養方式密切相關。家庭作為青少年社會化的主要環境，其功能若失調，容易對青少年心理與行為造成負面影響，導致翹家行為的產生。以下將從家庭結構變動、親子關係，以及教養方式三個方面進一步探討翹家行為的背景。

### 1.家庭結構變動與翹家行為

家庭結構的變動是引發青少年翹家行為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顯示，父母離異、再婚或家庭經濟困難等問題，可能削弱青少年對家庭的情感聯繫，並使其感受到家庭支持的缺乏（蔡墩銘，2003）。例如，當父母離異時，青少年可能因缺乏穩定的情感支持或受到父母爭吵的影響而感到無助，最終選擇翹家（陳麗萍，2015）。類似的國外研究指出，家庭結構的不穩定性與翹家行為之間具有顯著相關，尤其是在單親家庭或重組家庭中，青少年更容易因家庭功能缺失而產生翹家傾向（Demo & Acock, 1988）。因此，家庭結構的穩定對於預防翹家行為至關重要。

### 2.親子關係與翹家行為

親子關係的質量對青少年的行為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當親子關係緊張或缺乏溝通時，青少年容易產生孤立感，並選擇以逃離家庭方式來表達內心的不滿（張美慧，2012）。例如，父母與青少年之間若缺乏有效的溝通，青少年可能會

感到不被理解或支持，進而採取翹家行為作為一種反抗的方式(黃志成, 2018)。國際研究亦支持此觀點，Baumrind (1991) 指出，當家庭中缺乏情感交流或親子衝突頻繁時，青少年容易因情緒壓力而選擇翹家。此外，與父母情感聯繫較弱的青少年，在面臨生活困難時，傾向於尋求外界支持，而非向家庭尋求幫助，這也增加了翹家行為的可能性 (Evans, 2004)。

### 3. 教養方式與翹家行為

父母的教養方式對青少年行為具有深遠影響。研究顯示，過於嚴厲或忽視性的教養方式容易導致青少年在心理上產生對抗性或逃避心理，進而選擇翹家 (陳麗萍, 2015)。例如，過度嚴厲的父母可能會讓青少年感到壓力過大或缺乏自主權，而忽視型父母則可能無法提供足夠的情感支持，導致青少年感到被冷漠對待。國外學者 Maccoby 與 Martin (1983) 將教養方式分為「專制型、權威型、放任型與忽視型」，研究表明，專制型與忽視型教養方式下的青少年最容易產生翹家行為，因為他們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無法獲得情感滿足或安全感。

此外，國內研究亦指出，父母對子女缺乏適當的情感支持與關懷，會增加青少年產生翹家行為的可能性 (李茂生, 2005)。例如，當青少年感到父母的期待過高且無法達成時，可能會採取翹家作為反抗或逃避的手段。因此，適當的教養方式，尤其是權威型教養，能有效減少翹家行為的發生，並促進親子關係的健康發展。綜上所述，翹家行為的成因涉及家庭結構變動、親子關係以及教養方式等多方面因素。穩定的家庭結構、和諧的親子關係與適當的教養方式，對於預防青少年翹家行為具有關鍵作用。未來在研究與實務中，應更加重視家庭因素的改善，並結合心理輔導與社會支持系統，為青少年提供一個更安全、穩定的成長環境。

### 三、青少年偷竊行為成因

青少年偷竊行為作為一種犯罪行為，不僅會對青少年自身的生活和發展產生影響，還會對家庭、學校及社會造成不良後果。從心理學與犯罪學的角度來看，青少年偷竊行為的形成是多層次因素交織的結果，既有個體心理發展的因

素，也有社會結構與文化背景的影響。深入剖析這些成因，不僅有助於了解行為的根本驅動力，也能為相應的預防和干預提供理論支持。

### (一)青少年偷竊行為的心理學成因

#### 1.自我控制與衝動控制

根據自我控制理論，青少年的行為往往受到自我控制能力的影響。格里菲斯（Griffiths, 2013）指出，青少年在心理發展的過程中，衝動性較高，這使得他們更容易選擇短期回報而忽略長期後果。對許多青少年來說，偷竊可能是一種立即獲得所需物品或情感滿足的手段，而這種行為往往不會被他們即時聯想到未來的負面後果。因此，缺乏自我控制的青少年容易選擇冒險行為，如偷竊、破壞等，並且難以抗拒內心的衝動。自我控制能力較弱的青少年，為有效抑制即刻的欲望或需求，可能促使青少年在感受到誘惑或壓力時選擇偷竊，來達成某種短期目的。

#### 2.情感發展與認知偏差

心理學家研究表明，青少年的情感發展與認知過程尚不完全成熟，這使得他們在面對困難時，可能作出不理性的行為決策。根據科恩與菲爾德（Cohen & Felson, 1979）的「機會理論」，青少年在面臨機會時，若缺乏足夠的道德判斷，容易產生不良行為。偷竊行為往往是在青少年感到沮喪、焦慮或情感困擾時的一種情緒反應。此外，青少年可能會存在一種認知偏差，即低估偷竊行為的風險與後果，並將偷竊視為一種輕微的行為或解決問題的方式。根據艾克曼（Eckman, 2005）的研究，許多青少年可能會合理化偷竊行為，認為自己只是「拿走」一些自己需要的東西，而不是「偷竊」，這種認知偏差使得他們對行為的倫理性產生錯誤判斷。

#### 3.社會認同與同儕壓力

青少年處於強烈的社會認同建構階段，對同儕的依賴性極高。許多青少年會受到同儕的影響，尤其是在群體中尋求認同感。根據社會學習理論，青少年

會通過模仿他人來學習行為，若同儕中有偷竊行為的存在，這些青少年很容易受到影響，進而模仿這些行為，尤其是當偷竊被視為提高地位或維持群體認同的手段時。根據艾斯特（Esther, 2006）的研究，許多青少年會因為同儕的支持或鼓勵而進行偷竊，尤其是當他們感覺到在社交圈中被排斥時。

## （二）青少年偷竊行為的犯罪學成因

### 1. 機會理論與環境因素

根據犯罪學中的機會理論（routine activities theory），犯罪行為的發生需要有三個必要條件：犯罪行為的誘因、犯罪機會的出現以及缺乏有效的控制。對於青少年偷竊行為而言，環境因素和社會結構提供了偷竊的機會，特別是在學校、社區和家庭等場所。如果青少年所處的環境中缺乏足夠的監管和約束，並且經常暴露於物質或情感需求的困境中，他們就可能在面對偷竊的機會時，選擇不假思索地去實踐偷竊行為。例如，青少年在學校裡可能會因為缺乏對物品的控制，或是學校監管力度不夠而更容易發生偷竊行為。如果學校環境中存在較為鬆散的管理或無人察覺的偷竊行為，則青少年更有可能趁機偷竊。

### 2. 社會學習與模仿理論

犯罪學中社會學習理論強調，犯罪行為的形成和發展與個體所處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透過模仿、認同以及對特定行為的社會支持，青少年可能會學習到偷竊行為。當青少年身邊的家庭成員、同儕或社會環境中有偷竊行為的時候，這些行為就可能被視為「正常」或「可接受」的行為模式。例如，若家庭成員經常從事偷竊行為，青少年可能會將其視為一種「可行」的行為模式，並在相似情境下進行模仿。根據班迪（Bandy, 2008）提出的社會學習理論，青少年會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模仿他們所見到的行為，尤其是當這些行為在社會中未受到有效的約束時。

### 3. 文化與社會結構的影響

犯罪學中的結構功能理論指出，社會結構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性會對青少

年的行為產生深遠影響。社會中存在著一定的文化與經濟差距，這使得一些青少年可能感受到社會的排斥，並因此選擇透過非法手段來獲得資源。根據福斯特（Foster, 2012）的觀點，青少年生活在貧困或社會邊緣化的環境中時，會更容易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從而形成偏差行為。偷竊行為便可能成為他們試圖獲取所需資源的手段，這種行為本身也是對社會不公平現象的一種反應。

青少年偷竊行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心理學、犯罪學、社會結構等多種因素。從心理學角度來看，青少年由於自我控制能力較弱、情感發展不成熟、容易受同儕壓力影響，因此更容易從事偷竊行為；從犯罪學角度來看，機會理論、社會學習理論以及結構功能理論均指出社會環境中的不平等、缺乏有效監管等因素會增加青少年犯罪的風險。因此，理解青少年偷竊行為的多層次成因，有助於制定更有效的干預措施，從而減少偷竊行為的發生，促進青少年健康成長。

#### **四、青少年抽菸與藥物濫用行為成因**

青少年抽菸與藥物濫用行為是全球公共健康和社會治理的重要議題。這些行為不僅會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直接損害，還可能導致長期的行為偏差和犯罪風險。從心理學和犯罪學的角度分析，青少年的不良行為受多層次的內外因交織影響，涵蓋個體心理特質、家庭結構、同儕影響以及社會文化等多方面因素。透過對行為成因的詳細探討，不僅有助於理解行為的深層驅動機制，還能夠為制定干預策略提供理論依據。本節將從心理學與犯罪學的角度，結合國內外文獻，全面分析青少年抽菸、喝酒與藥物濫用行為的成因，並探討其中隱藏的社會與心理動力。

##### **(一)心理學視角**

###### **1.自我控制與衝動性**

心理學家認為，青少年的行為受其自我控制能力和衝動性的影響較大。根據前述的自我控制理論，個體自我控制能力低，容易做出不顧後果的行為，



例如抽菸。青少年正處於腦部發育的關鍵期，尤其是負責自控和決策的大腦前額葉皮質尚未完全成熟，這導致他們難以抵抗即時誘惑，例如菸草對感官和情緒的短暫滿足。青少年抽菸往往始於對「即時快感」的追求，這種快感可能包括尼古丁帶來的放鬆感、減輕焦慮的效果，或者僅僅是嘗試新事物的刺激感。由於他們在短期獎賞與長期風險的權衡中傾向於選擇前者，抽菸行為得以發生和延續。

## 2. 認知偏差與冒險傾向

青少年的認知能力和風險評估往往存在偏差，這是抽菸行為的重要心理成因之一。許多青少年低估抽菸對健康的危害，認為「少量抽菸不會成癮」或「短期內不會影響身體」。這種錯誤認知降低了他們對抽菸行為的抵抗力，增加了行為發生的可能性。此外，青少年具有較高的冒險傾向，喜歡挑戰規範和嘗試新鮮事物。抽菸常被視為一種「叛逆」的象徵，能夠滿足青少年對自主性和身份認同的需求。這種心理需求特別強烈地出現在家庭管控過嚴或對父母權威不滿的青少年中，他們可能將抽菸視為對權威的挑戰或對自我成長的表現。

## 3. 同儕壓力與社會認同

心理學中的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指出，個體會努力融入群體，並模仿群體成員的行為以獲取認同。在青少年的生活中，同儕影響力遠大於父母或教師，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時候，建立同儕關係和獲取群體認可是其重要任務。抽菸行為在某些同儕群體中可能被視為「酷」或「成熟」的象徵，吸引青少年模仿。特別是當他們處於與抽菸者頻繁互動的環境中，模仿行為的發生率顯著提升。研究表明，若青少年的朋友中有抽菸者，他們開始抽菸的可能性比沒有抽菸朋友的青少年高出兩倍以上（陳建文，2018）。

## 4. 情緒調節與壓力應對

抽菸行為也可能是青少年應對壓力或情緒困擾的一種方式。情緒調節理論認為，個體會通過特定行為來調節自身的負面情緒，而尼古丁具有緩解焦慮和

壓力的作用，因此容易成為青少年舒緩情緒的工具。例如，來自家庭（如父母衝突）或學校（如學業壓力）的壓力可能促使青少年選擇抽菸來逃避現實或緩解情緒困境。這些壓力源不僅驅動了行為的開始，也可能導致其進一步強化和持續性。

## (二)犯罪學視角

### 1.社會學習理論：模仿與強化

犯罪學中的社會學習理論指出，個體行為的形成主要通過觀察、模仿和經驗強化實現。青少年抽菸行為常因觀察他人（尤其是父母、兄長或同儕）的抽菸行為而產生，並在得到正向反饋（如被認可或感到愉快）後加以強化。若青少年成長於抽菸行為普遍的環境中，例如，家庭成員普遍有抽菸習慣或社區中吸菸率高，他們對吸菸的接受度和嘗試意圖會顯著增加。此外，廣告和影視作品中對抽菸的美化也可能加強這種行為。例如，某些青少年可能認為抽菸是一種展現魅力和自信的行為，進而模仿。

### 2.社會控制理論：家庭結構與監管缺失

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認為，社會化過程中的控制機制缺失會增加犯罪行為的風險。青少年抽菸行為的發生往往與家庭結構不穩定或監管不足密切相關。如果青少年的父母關注度不足或家庭規則鬆散，孩子更容易接觸並嘗試菸草產品。例如，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家庭的孩子，因缺乏穩定的監護或家庭支持，容易受到外部環境的不良影響（陳淑芬，2020）。此外，父母本身的吸菸行為也會降低他們對孩子行為的約束力，並傳遞一種信號，即吸菸是可接受的行為。

### 3.機會理論：環境與資源可得性

犯罪學的機會理論（Routine Activities Theory）指出，犯罪行為的發生需要有「動機」、「目標」和「監控缺失」三個條件。青少年抽菸行為的發生也符合這一邏輯：動機表示個體的情緒需求或對身份認同的追求。目標則顯示出菸草

產品的易得性。監控缺失則指家庭、學校或社區中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

在一些青少年可輕易接觸到香菸的環境中，行為發生的可能性更高。例如，若便利商店對未成年購菸者執行規範不嚴，或家庭中存放有菸草，青少年就會面臨更大的嘗試機會。

#### 4.結構功能理論：社會規範與文化影響

結構功能理論認為，社會規範和文化背景對青少年行為有深遠影響。當地區或國家對吸菸的態度較為寬鬆，或存在將吸菸與男性氣概、成熟度相聯繫的文化時，青少年抽菸行為的發生率通常更高（劉俊輝，2019）。例如，某些社會可能將吸菸視為成年儀式的一部分，這會促使青少年在心理上將抽菸與「長大」、「自立」相聯繫，進而積極模仿並參與這一行為。

心理學與犯罪學視角提供了分析青少年抽菸行為成因的多層次框架。在心理學層面，自我控制能力的欠缺、冒險傾向、同儕壓力和情緒調節問題構成了行為的內在驅動力；在犯罪學層面，社會學習、家庭監管缺失、機會可得性和文化影響構成了行為的外部動力源。理解這些成因有助於制定針對性的干預措施，如提高青少年的自控能力、加強家長教育與監護、加大對青少年購菸行為的管控力度，以及營造健康的社會文化氛圍，從而有效降低青少年抽菸行為的發生率，促進其健康成長。

### 五、青少年輔導策略

青少年輔導是教育與心理學中的重要領域，旨在幫助青少年應對成長中的挑戰並促進其心理、行為與社會適應能力的發展。由於青少年正處於生理與心理快速變化的時期，他們往往面臨學業壓力、家庭衝突、同儕關係和自我認同等多方面的困難。因此，有效的輔導策略需整合心理學、教育學與社會學等學科的知識，針對青少年需求提供多層次支持。本節探討青少年輔導的核心理念，分析具體輔導策略，並提供理論基礎與實務應用建議。

#### (一)青少年輔導的理論基礎

## 1.發展心理學視角

根據艾瑞克森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青少年處於「身份認同對角色混淆」的發展階段，他們努力探索自我定位並尋求在社會中的角色認同。然而，身份認同的建立並非一帆風順，青少年可能因缺乏支持而感到迷茫，導致自我懷疑或偏差行為。輔導策略應重視促進青少年對自我價值的認知，幫助其建立積極的身份認同。

## 2.認知行為理論

認知行為理論（Cognitive Behavioral Theory, CBT）認為，青少年的行為受其認知模式影響，負面的思維方式會引發消極情緒和不良行為。輔導策略可以幫助青少年識別並挑戰不合理的認知，建立積極的思維模式，從而改變行為。例如，針對對學業失敗感到恐懼的學生，輔導者可以引導其重新解讀學習困境，採取有效的應對策略。

## 3.社會學習理論

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社會學習理論強調，行為是通過觀察、模仿和強化學習而來。青少年受到同儕和社會環境的顯著影響，尤其是在行為習慣形成的關鍵階段。同儕壓力、家庭模式和媒體信息是影響青少年行為的重要因素，因此，輔導策略應重視積極的行為榜樣和正向強化。

### (二)青少年輔導的具體策略

#### 1.心理支持與個別輔導

##### (1)信任關係：

青少年輔導的首要步驟是建立輔導者與學生之間的信任關係。這可以通過積極傾聽、同理心和真誠表達實現。輔導者需創造安全且無評價的環境，讓青少年感受到被理解和支持。

##### (2)情緒管理與壓力調節

青少年常因學業或人際關係壓力而出現焦慮、抑鬱等情緒問題。輔導者可以採用正念（mindfulness）或認知重建等技術，幫助青少年識別和調節負面情緒。例如，教導深呼吸技巧或放鬆練習，減少壓力對行為的負面影響。

### (3)增強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個體對自身完成任務能力的信念，直接影響青少年的行為表現。輔導者可以通過設計小目標，讓青少年逐步體驗成功，增強對自身能力的信心。例如，針對學習困難的學生，可以制定分階段學習計畫，讓其逐步達成目標，提升自尊與效能感。

## 2.團體輔導與品格教育

### (1)促進同儕互動：

團體輔導是有效提升青少年社會能力的途徑之一。通過角色扮演、小組討論或合作任務，青少年可以學習人際溝通技巧，增強解決問題的能力。例如，針對同儕衝突問題，可以設計模擬場景，幫助學生練習有效的衝突解決方法。

### (2)推動品格教育：

輔導策略應將品格教育納入課程，幫助青少年建立道德價值觀與責任意識。例如，通過參與志願服務計畫，讓學生體會助人的快樂並發展同理心。同時，教師應透過日常課堂活動融入誠實、尊重和團隊合作等核心價值的教學，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品格素養。

## 3.家庭參與與支持

### (1)增強親子關係：

家庭是青少年成長的重要支柱，輔導策略應包括家庭參與。例如，舉辦家長工作坊或親子活動，幫助家長了解青少年在心理與行為發展中的需求，並學習有效的溝通技巧。親子關係的改善可以減少青少年因情感孤立而出現的行為偏差。

## (2)指導家長建立規範

青少年需要清晰且一致的行為規範，輔導者應幫助家長建立合理的家庭規則，並以支持性而非懲罰性的方式執行。例如，當青少年未遵守規範時，應優先採取溝通和教育的方式，而非僅依賴懲罰的方式，以促進青少年內化行為的規範。

## 4.社區資源與社會支持

### (1)整合社區資源：

輔導策略應積極連結社區資源，如青少年中心、志願者組織或心理健康診所，為青少年提供多元化支持。例如，通過參與社區運動隊或藝術工作坊，幫助青少年發展興趣愛好並建立正向的社交圈。

### (2)營造安全環境：

犯罪學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行為偏差常與不良環境有關。輔導策略應包括改善校園和社區的安全環境，例如加強對暴力或毒品行為的監控，為青少年創造健康的成長氛圍。

## (三)青少年偏差行為之法規

青少年偏差行為不僅是家庭和教育的挑戰，也是法律與社會制度需要面對的重要議題。我國針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與相關政策，如《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家庭教育法》等相關法規。

### 1.《少年事件處理法》

《少年事件處理法》是針對青少年偏差行為設計的專門法律，強調「教育、感化優先，處罰為輔」的原則。根據該法規，青少年因偏差行為進入司法程序時，法院會依案件性質與嚴重性，採取包括感化教育、觀護輔導、安置機構或矯正措施等處置，以期矯正行為並幫助其回歸正軌。

## 2.《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該法的重點在於保障兒童及少年的基本權益，並規範家長或監護人的責任。例如，若父母或監護人未履行教育及照顧義務，可能構成家庭功能失調，進而引發青少年偏差行為，政府機構可依據該法介入，提供輔導或安置服務。

## 3.《家庭教育法》

《家庭教育法》重視家庭作為預防偏差行為的第一道防線，規範政府需推動親職教育，幫助家長建立正向的教養態度，並加強親子互動品質，從根源上降低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風險。

#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索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成因、特徵及輔導策略，填補相關研究的不足，本研究方法主要採取質性研究法，從文獻的探討及大量文獻研究的蒐集分析等等做為基礎，再從課程及研究生的回饋做綜合分析。透過分析師長們在處理青少年偏差行為時的實際案例與工作經驗，總結有效的輔導方法，並提出可行的實務建議，期望深入了解教師在預防與干預青少年偏差行為過程中的挑戰與策略，並從中提煉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輔導模式。將詳述研究設計與方法，包括質性與文獻研究法、觀察研究法，為後續研究結果的呈現提供扎實的基礎。

## 一、質性研究法

研究方法是學術研究的核心，選擇適切的方法對研究結果的深度與效度具有關鍵影響。質性研究與文獻研究法為人文與社會科學中常用的兩種方法，各有獨特優勢與適用情境。本研究旨在探討兩者的理論基礎、方法特徵、實施步驟及其優劣，並分析其整合應用的可能性與實際效益。

### (一)質性研究法

#### 1. 定義與特徵

質性研究法主要探討人類行為、經驗與社會現象的主觀意涵，透過訪談、觀察與文本分析等方式，呈現研究對象的觀點與處境（Creswell, 2013）。Denzin 與 Lincoln（2018）指出，質性研究的特徵包括：

- (1)情境性：關注現象在特定脈絡中的意義。
- (2)主體性：重視研究對象的聲音與視角。
- (3)過程導向：著眼於現象的動態發展。
- (4)解釋性：致力於詮釋深層意義，而非僅做表面描述（Denzin & Lincoln, 2018）。

2. 主要方法：李克東與黃光雄（2003）將質性研究法歸納為以下三大向度：

- (1)深度訪談：藉由開放式問答了解受訪者經驗與想法，適用於探討內在動機與個人意義建構。
- (2)參與觀察：研究者進入場域，觀察實際互動，有助於捕捉自然語境中的行為模式。
- (3)文件分析：解讀政策、公文、日記、影像等文本資料，探索文化或歷史脈絡下的深層意義。

3. 優缺點分析

質性研究的優勢在於能深入理解複雜且情境化的現象，適合理論尚未成熟的領域。其研究策略具彈性，能隨情況調整。然而，質性研究也面臨樣本量小、結果主觀、可普遍性有限等挑戰，且資料分析耗時，對研究者素養要求高。

## 二、文獻研究法

(一)定義與特徵

文獻研究法（Literature Review Method）指透過系統性蒐集、整理與分析既有研究成果，建立理論背景與發展研究問題的方法（Boote & Beile, 2005）。



其特徵如下：

- (1)基礎性：提供理論與知識基礎。
- (2)系統性：強調資料的全面性與結構性。
- (3)批判性：辨識文獻的優劣與適用性。
- (4)時間跨度：歷史性，能追溯議題的發展過程。

(二) 主要步驟：文獻研究的操作歷程包括：

- 1.界定主題與範圍：根據研究問題設定關鍵詞、學科與時間範圍；
- 2.資料蒐集與整理：運用資料庫蒐集學術期刊、報告與書籍等；
- 3.批判性分析：評估文獻的方法、結論與適切性；
- 4.統整與綜述：分類整合文獻，提出有邏輯的觀點或研究缺口。

(三) 優缺點分析

- 1.文獻研究的優點：快速建立研究背景，例如，透過文獻分析，研究者可以了解相關問題的歷史發展脈絡及現存的爭議點，從而更準確地定位自己的研究方向；節省成本與時間，可利用現有的數字化資料庫，成本效益高；有助於聚焦問題與整合理論；通過文獻研究，研究者能夠辨別已經被充分討論的問題，避免研究重複。
- 2.文獻研究的缺點：文獻研究依賴於現存的資料，而現有文獻可能存在樣本不足、方法偏誤或數據陳舊等問題，進而影響研究的結論；由於文獻研究不涉及一手資料的收集，缺乏原始數據驗證；結論間接，實證基礎較弱；易受研究者偏見影響選材方向。

### 三、質性研究與文獻研究的結合應用

質性研究與文獻研究雖各具特色，但整合應用能發揮互補效益。前者提供

深度的情境理解，後者構建廣度的理論脈絡。兩者結合可提升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形成更具整合性與應用性的成果。

### (一) 互補性意義

文獻研究能指引質性研究問題的形成與理論建構；質性研究則可反思與補足文獻中的不足或假設，並在特定脈絡下驗證既有理論（Creswell, 2013）。

### (二) 結合方法

- 1.問題設計：透過文獻了解研究空白，發展具體質性研究問題。
- 2.資料收集：文獻提供理論脈絡與訪談設計依據；質性資料則豐富文獻觀點。
- 3.資料詮釋：質性發現與文獻資料對照，能提出具理論意涵與實證基礎的結論。

### (三) 實例應用

在探討青少年偏差行為時，文獻研究可呈現制度性與社會結構面向，質性研究則深入受訪青少年的心理歷程與價值觀（張瓊芳，2018）。再如教育政策研究中，文獻整理出政策理論與經驗，質性資料補充個體觀點與落實情況（林聰明，2019），兩者結合能提出更具操作性與前瞻性的政策建議。

質性研究法強調深層意義的探究，文獻研究法則重在知識統整與理論建構。兩者在方法與應用上互為補充，整合運用能促進學術研究的深度與廣度。未來研究者應靈活運用兩者，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設計適切的研究流程，並發展具批判性與整合力的學術觀點。唯有如此，方能在理論與實踐之間架構穩固的橋梁，推動知識的進步與社會的理解。

## 肆、青少年問題與教育輔導之研究分析與討論

### 一、青少年逃學、翹家之回饋建議

### (一)逃學輔導

青少年的行為通常受過去兒童時期狀況的影響。當在學之青少年出現逃學現象時，首要了解每位青少年的背景、教育、家庭及每一個青少年過去的生活狀況。然而，青少年逃學原因有學校因素（如同儕問題、課業壓力）和家庭因素（如家庭暴力、親子不和）等，皆需作綜合考量。

### (二)翹家問題

所謂翹家係指青少年未經家長允許離開指定住所，其原因可能是家庭暴力、親子關係惡劣及青少年叛逆等。通常處理方法要注重親子間的溝通，學校和家庭需加強合作關切。

### (三)回饋與建議

青少年的行為問題通常錯綜複雜，與家庭、學校及個人因素互相影響。學校輔導人員需留意法律條文變化及改變教學策略，保持冷靜的在青少年與家長中溝通，避免第一時間對青少年給予批評與責備，陪伴青少年一同找到問題癥結所在再協助與家庭，並進行有效溝通與合作，尤其當家庭本身缺乏協助學生能力時。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個人內在的心理與情感因素，也有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的綜合作用。回饋與建議，分別以輔導人員、員警、特殊教育與補救教學、預防和保護效果效果作論述：

#### 1.輔導人員（包括家長、老師或社工人員）：

應協助學生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及發展學習興趣。校方應落實各級預防工作，導師及任課教師/輔導老師需密切合作。提供青少年大學及外部資源合作，如科技部計畫、社區警察局參訪或志工服務等。偕同利用家校合作課程，例如高關懷課程，幫助中輟生逐步回歸校園學習。

#### 2.特殊教育與補救教學：

對於學習障礙或情緒行為障礙的學生，學校提供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以滿足他們的特殊需求。透過適性教育，降低因學業挫折引發的偏差行為。此外，補救教學針對成績落後的學生，協助其重新適應課堂環境，避免因挫折感而逃學或輟學。

### 3.預防效果：

現行青少年偏差行為相關法規在預防偏差行為方面展現了一定的效果，透過早期介入、教育引導、輔導支持等措施，試圖減少青少年進一步發展為犯罪行為的風險。《少年事件處理法》強調對行為偏差但尚未犯罪的青少年進行觀察與輔導，避免其進一步陷入犯罪循環。例如，對於涉及輕微違法行為的青少年，法規允許採取非司法化處理，透過感化教育或參與社會服務，幫助他們改正行為，降低再次偏差的可能性。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聚焦於高風險群體的保護與輔導，特別是在貧困、家庭功能失調或遭受暴力的情境中，提供心理支持、經濟援助及教育機會，試圖減少環境壓力對青少年行為的負面影響。這些法規在預防層面的另一項重點在於增強家庭功能，例如《家庭教育法》透過推動親職教育和家庭輔導，提升父母的教育能力，幫助家庭建立和諧的氛圍，進一步影響青少年的正向成長。同時，校園安全相關政策則強調在學校環境中創造有利於青少年發展的氛圍，像是反霸凌計畫、心理輔導與生命教育課程等，這些措施提高了青少年對於自身行為後果的認識，並促進健康的同儕關係。

然而，這些法規的實施過程中也存在挑戰。首先是資源分配不足的問題，尤其是在偏遠地區或社經地位較低的家庭，缺乏足夠的專業人力與經費支持，使得部分預防措施難以有效落實。其次，家庭參與與配合度不高也是一項挑戰，部分家長對於法規的了解有限，或因本身生活壓力而無法積極參與相關教育與輔導計畫，導致法規設計的效果難以完全實現。此外，媒體影響與同儕壓力也是難以透過法律直接管控的因素。

### 4.保護效果：

《家庭教育法》致力於提升家庭的教育功能，通過推動親職教育與家庭輔導服務，幫助父母提升教養能力，避免因管教不當或忽視而導致青少年出現偏差行為。這些措施不僅強化了家庭對青少年的支持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青少年因家庭失衡而遭受的壓力與傷害。

## 二、攻擊行為與校園霸凌之回饋建議

社會多元化與青少年接收爆量的網路訊息，致使青少年攻擊行為和霸凌現象日益普遍與嚴重，攻擊行為和霸凌行為對於青少年在校學業成績和心理健康都易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然而，霸凌行為會導致學生自我認知、人際關係及心理發展的障礙，進一步惡化校園學習環境。

### (一)攻擊行為和霸凌

攻擊行為泛指導致他人身心痛苦的行為，校園中的攻擊行為即稱為霸凌，而校園霸凌包含肢體霸凌、言語霸凌、關係霸凌、性霸凌、反擊型霸凌及網路霸凌。

### (二)導致霸凌的因素

在現代商業化社會中，多數家庭為雙薪家庭，父母因工作忙碌而忽略對子女的關注與管教，導致部分青少年出現行為偏差。缺乏父母肯定、家庭暴力或離異等問題，皆可能使青少年模仿不當行為、形成衝動個性，甚至陷入霸凌等負面互動。犯罪預防學強調家庭是防止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首要防線，父母應以身作則，進行正向溝通與教育。針對家庭功能薄弱的青少年，學校與社工應介入輔導，協助家長改善教養方式，促進家庭穩定。此外，網路與媒體中的暴力、不良價值觀亦對青少年造成影響，學校與家庭應加強媒體素養教育，並與社會機構合作推動網路安全課程，協助青少年遠離網路犯罪與錯誤價值觀的誘惑。

### (三)回饋與建議

青少年霸凌問題須透過系統化預防與處遇措施因應，分為初級預防、二級介入與三級處遇。初級預防著重於強化班級規範與人際教育，透過學校日常教

學，培養學生正確的人際相處觀念與界限，並促進親師合作，建立安全校園氛圍。二級介入則針對已發生的霸凌事件，強調即時通報、校內處理機制啟動，以及增加校園巡視與監控，防止事件重演。三級處遇針對涉入霸凌行為的雙方進行心理狀態評估，必要時結合外部資源，提供心理輔導或行為矯正。

學校輔導與諮商系統亦扮演重要角色。設置專業輔導教師或心理師，針對有偏差行為傾向的學生進行個別輔導，內容涵蓋情緒管理、衝突解決及生涯規劃，協助學生應對成長困難，降低風險行為發生。教育部推動的「校園霸凌防制措施」要求學校成立反霸凌委員會，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規範事件處理流程，並提供心理支持，協助學生回歸正向校園生活。校園安全管理與危機應對機制，亦為預防暴力及偏差行為的重要保障。

法規面向方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聚焦於高風險青少年的保護與資源支持，包括心理輔導、經濟援助與教育資源。《家庭教育法》則透過親職教育與家庭輔導強化家庭功能，提升父母教養能力，進一步影響青少年的正向發展。同時，校園安全政策中包含生命教育與媒體素養課程，提升學生對行為後果的理解與社會責任感。

實務上，《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明訂學校需在霸凌事件發生後立即啟動調查與輔導，保護受害學生、矯正施暴者行為，確保校園安全。同儕影響亦不容忽視，學校應致力於建立正向同儕文化，透過社交技巧與人際關係教育，幫助學生遠離不良團體。此外，結合社會資源提供必要支持，可協助問題學生重建良好人際互動。

綜合而言，預防與介入青少年霸凌事件需學校、家庭與社會共同參與。教師應具備處理霸凌事件的知識與技巧，校方需建立明確處理機制與定期培訓制度。警政單位則可配合校園進行反霸凌與犯罪預防宣導，強化學生法律意識與風險辨識能力。透過多層次、跨系統的合作，可有效遏止校園霸凌行為，促進青少年的健康發展。

### 三、青少年偷竊之回饋建議

### (一)青少年偷竊行為問題

青少年的偷竊行為常為父母與教師教育上的難題，卻是其成長過程中常見的外顯偏差行為。從道德發展的角度來看，青少年多處於道德觀尚未成熟的階段，若缺乏正確引導，可能會因內在需求未被滿足而選擇偷竊作為最快的解決方式。常見原因包括：物品被父母拒絕購買、零用錢不足、模仿同儕或為了融入團體而偷竊等。根據犯罪預防學，偏差行為的產生與價值觀未成熟、家庭教養不足、學校疏忽與同儕影響密切相關。

因此，預防青少年偷竊行為應從教育與輔導入手。學校方面應強化品德教育與情感管理，建立支持心理健康的校園環境。品格教育不應流於形式，需透過課程與日常活動，幫助青少年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與責任感。同時，學校應納入心理健康教育，協助學生認識並處理情緒壓力與自我認同困擾，以減少偏差行為的發生。

家庭亦是預防的關鍵。良好的親子互動與教養態度，有助於青少年建立自我價值與行為準則。家庭應提供情感支持與適當的管教，成為孩子品格發展的第一道防線。

### (二)回饋與建議

青少年出現偷竊行為最好的介入時機為行為初犯，建議請對青少年融入金錢管理與物前觀念的教育，設計青少年正確的價值觀並強化青少年法律及道德觀的輔導課程，針對金錢和物權觀念的輔導教育，設計正向的金錢運用學習與討論環境，與家長保持有效溝通，讓家長適度了解青少年對於金錢使用的金錢的使用與習慣，偷竊行為處理需要重心理、學校與家庭多方入手，傾聽青少年內在的聲音，了解其問題癥結方能協助導正青少年之偷竊偏差行為。後文分別以輔導人員及預防效果做出回饋與建議：

#### 1.輔導人員（包括家長、老師或社工人員）：

(1)個人心理層面：使用角色扮演與案例分析法教育學生了解行為的法律責任。

(2)學校與同儕層面：強調班級輔導的重要性，促進正向的班級文化。教育部推行的「正向行為支持系統」(Pos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and Supports, PBIS)，旨在透過營造友善校園環境，幫助學生建立正向的行為模式。該系統著重於教導學生遵守規範、培養同理心，並透過表揚與獎勵機制，鼓勵良好行為表現。

2.家庭層面：與家長協調實施有效的零用錢管理及正面的行為導向。政府與學校合作，針對家長推出親職教育課程，強調正向管教與有效溝通的重要性。建議在家裡貴重飾品及現金，妥為放置，不讓小孩容易取得，大人發現現金部分短少時，應立即追問查明，並應適度關心青少年的需求。針對偏差行為的高風險家庭，政府提供家庭輔導服務，協助改善親子關係。地方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亦設立支持性計畫，如家庭訪視、親子活動與心理諮詢，減少因家庭功能失調對青少年行為的負面影響。

3.預防效果：透過早期介入、教育引導、輔導支持等措施，試圖減少青少年進一步發展為犯罪行為的風險。《少年事件處理法》強調對行為偏差但尚未犯罪的青少年進行觀察與輔導，避免其進一步陷入犯罪循環。例如，對於涉及輕微違法行為的青少年，法規允許採取非司法化處理，透過感化教育或參與社會服務，幫助他們改正行為，降低再次偏差的可能性。我國強調政府部門與非政府組織（NGO）之間的合作，例如「張老師基金會」與「家扶基金會」等組織，提供個案輔導、家長教育與心理諮詢。同時，學校與地方政府亦積極合作，透過資源共享與經驗交流，提升教育與輔導的整體效能。雖然偏差行為案件數逐年下降，但仍存在挑戰。資源分配不均、高風險地區輔導資源不足，以及部分家庭或社區對政策缺乏認同，都是現行措施面臨的問題。因此，未來需進一步強化政策執行力，並透過數據分析優化資源配置。

4.矯正效果：家庭教育與矯正措施的結合也在現行法規中佔據重要地位。例如，《家庭教育法》規定地方政府可提供針對偏差行為青少年家庭的專業教育支持，包括親職指導與家庭輔導，幫助父母提升管教與支持能力。這種家庭與個人矯正的雙管齊下模式，使得青少年的問題行為能夠在更全面的環境中得到改



善。同時，針對犯罪行為的青少年，《刑法》與《少年事件處理法》允許採取特別輕緩的刑罰措施，如以觀察處分替代拘留或刑期，並引入專業心理輔導，以修復其內在行為動機。這種模式強調對問題根源的處理，而非單純的行為懲罰，旨在從心理層面矯正偏差行為。

5.保護效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進一步強化了對弱勢青少年的保護，特別是在家庭功能失調、經濟困難或遭受暴力的情況下，提供法律與社會資源上的支持。例如，針對受虐青少年，法規授權社政單位進行即時介入，必要時可將青少年安置於保護性機構，確保其生命安全與基本需求不受侵害。同時，透過定期檢視與心理治療，幫助受虐青少年逐步恢復心理健康，進而重新適應正常的生活環境。

#### **四、青少年抽菸和藥物濫用之回饋建議**

##### **(一)青少年抽菸行為問題**

青少年吸菸將導致危害健康，更可能影響其未來身心及社會之發展，根據國民健康署 112 年青少年吸菸行為調查發現，逾五成的青少年第一次吸菸，主要是因為好奇(國中生：54.5%、高中職生：50.2%)，近兩成的青少年是別人吸菸而跟著吸(國中生：15.8%、高中職生：15.5%)，而持續吸菸的主因，是為了紓解壓力。紙菸吸菸率在國中生為 2.0%，高中職生為 6.7%，具體而言，國、高職生的吸菸率在菸害防制教育下，已漸漸獲得控制。

##### **(二)青少年藥物濫用行為問題**

隨著社會快速發展與價值觀的轉變，青少年藥物濫用之成因一般歸納為下列因素：個人因素方面如滿足好奇心，好刺激感，追求享樂，自卑、自我意志力薄弱，逃避現實等。家庭因抽菸或濫用藥物情況或紀錄，家庭結構不完整等。社會環境的影響，如提供菸或非法藥物、教授使用之方法、誘使運輸、販賣毒品等偏差行為的產生。

##### **(三)回饋與建議**

### 1.輔導人員（包括家長、老師或社工人員）：

解決青少年藥物濫用的問題，首應加強預防措施，積極建立家長與青少年對於自我保護因子的正確認知，於學校端加強反毒教育之宣導，醫療端提供藥物相關教育常識，並提升藥物與毒品的相關認知，從家庭學校到社區建立保護網，以達成預防效果。為避免少年因為對藥物濫用的無知而染上毒癮，以及因為不明白法律常識而不小心觸法，應強化反毒宣導，配合學校執行學生賃居校外處所的安全訪視及校園安全聯繫，讓青少年遠離毒害及犯罪，找回健康的身心靈。

### 2.社會資源與社區支持：

#### （1）青少年活動中心與課後輔導

我國全國各地設有青少年活動中心，提供課後輔導、技能培訓、志工服務與娛樂活動，為青少年創造健康的休閒環境。這些活動中心的目標是讓青少年遠離犯罪誘因，培養積極的興趣和技能。

#### （2）高風險青少年輔導計畫

針對行為偏差的青少年，地方政府與民間機構合作推出專案輔導計畫，例如「替代性教育課程」或「生活重建營隊」。這些計畫通常包括行為矯正課程、社會技能訓練與團體輔導，幫助青少年重新融入正向社會網絡。

3.矯正效果：現行針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法規在矯正效果方面呈現出一定的積極性，主要通過教育輔導、行為矯正、心理支持等多重機制，幫助偏差青少年回歸正軌。

其中，《少年事件處理法》針對違法行為的青少年，採取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強調矯正措施應以培養良好行為習慣與價值觀為核心。法院根據青少年的行為嚴重程度、家庭背景及心理狀況，可能判處保護管束、安置輔導或感化教育。社會矯正措施的推行進一步加強了法規的矯正效果。例如，《社區矯正法》對輕微違法的青少年提供替代性處分，如社區服務或公益勞動，這些

措施讓青少年能夠在社會情境中體驗責任與貢獻感，進一步內化正向行為。這些措施不僅避免了傳統懲罰模式可能帶來的標籤化與負面影響，還提供了一個支持性的環境來促進行為矯正。例如，感化教育機構為青少年提供職業技能培訓與學業輔導，幫助他們建立實現個人價值的能力，從而減少再犯風險。

4.保護效果：《社區矯正法》在保護效果上也具有重要的貢獻，特別是針對輕微違法的青少年提供社區服務或公益勞動的替代處分，讓其在不剝奪自由的情況下，承擔責任並體會對社會的貢獻感，避免因正式監禁處罰而遭受標籤化或負面影響。社區矯正的模式充分體現了對青少年身心發展的保護性考量。

然而，現行法規的矯正效果在實施過程中仍面臨一些挑戰。首先，專業人力資源不足導致矯正措施難以全面落實，特別是感化教育機構與家庭輔導的專業人員長期處於人手短缺的狀態，影響青少年獲得足夠支持的機會。其次，部分家庭因經濟困難或認知不足，無法積極配合矯正計畫，進一步削弱了法規的效果。此外，青少年在進入矯正程序後，仍可能因標籤化效應而遭受社會歧視，降低其重回正常生活軌道的可能性。同時，缺乏系統性與長期的成效追蹤機制，也使得法規的矯正效果難以全面評估與改進。

政府應投入更多資源於專業人力培訓與支持系統的建設，確保青少年能獲得足夠且適切的矯正服務；同時，應推動家庭教育的普及與親職教育的強化，增強家庭在矯正過程中的合作能力。此外，應強化對青少年矯正過程的成效追蹤與數據分析，確保相關措施能夠根據實際需求進行調整與優化；同時，應加強對社會大眾的宣導與教育，減少對偏差青少年的標籤化與歧視。

## 五、青少年偏差行為之輔導策略

青少年偏差行為已成為當前社會的重要課題，對個人、家庭與社會秩序造成深遠影響。根據犯罪預防學的理論與實務經驗，有效的政策應從早期預警、學校教育、家庭支持、社會與網絡環境治理等多層面同步推動。

首先，應建立健全的青少年行為問題預警與干預機制。犯罪預防學指出，偏差行為往往在早期就有徵兆，因此政策應支持建置全國性的行為監測與預警

系統，整合學校、警方、社會服務等資源，對高風險青少年進行早期識別與介入，提供心理輔導與行為矯正。政府可推動地方成立專責機構，並強化跨部門協作，形成有效的通報與處遇體系。其次，學校是青少年行為塑造的重要場所。應將偏差行為預防納入學校管理體系，強化品格與情緒教育，引導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與健全的人際關係，減少因壓力或衝突產生的行為偏差。當前許多學校心理資源不足，政府應提供資源支持，包括增加輔導人力與專業培訓，使教師具備識別與因應問題行為的能力。

家庭亦是影響青少年行為的關鍵。研究指出，家庭功能失調、親子關係疏離、教養方式不當，常為偏差行為的根源。因此，政策應加強家庭教育的普及與輔導，推動家長課程、家庭心理支持等措施，提升家長教養能力與情緒管理能力，修復親子關係，減少青少年因家庭因素走偏的可能。

同時，青少年所處的社會與網路環境也需納入規範。現今青少年深受網路、社交媒體及網路遊戲影響，若缺乏正確引導，易受暴力、色情等不良內容所影響，導致模仿與越界行為。員警處理許多青少年案件時，發現背後常涉及網路詐騙、霸凌或色情內容。因此，應強化網路內容監管，特別針對青少年的使用行為，限制不良資訊的接觸，並推廣網路素養教育，協助其建立風險辨識能力與安全使用觀念。從宏觀角度來看，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預防需強調跨部門整合與社會共同參與。犯罪預防學主張預防應多層次、系統化，結合家庭、學校、社區與執法機構力量，形成聯防聯治的網絡。政策可推動社政、教育、司法單位間的協作平台，例如學校與警方、社工合作，對高風險個案進行聯合輔導與追蹤管理，提升干預成效。

雖然現行法規已致力於預防與保護措施，例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與《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針對網路犯罪與性剝削等新興威脅提供法律依據與保護規範，但實際施行仍面臨挑戰。資源分配不均與執行力不足，使偏遠地區或弱勢家庭無法獲得完整支持；部門間協調與通報系統也有待加強，常因溝通不良或權責不明導致延誤處理。此外，部分青少年在進入保護性機制後，可能因標籤化或家庭排斥而遭遇二次創傷，削弱了政策的保護效果。

因此，政府應檢討並強化現行法規的執行與評估機制，建立系統性回饋與數據監控平台，了解長期介入成效，調整政策方向。推動資源的均等分配亦是重點，讓所有青少年不論背景都能享有同等支持。為提升法規與政策的長遠影響，建議政府整合科技發展與社會資源，加強社交媒體監管、網路行為治理，並賦予學校與家庭更多參與空間。例如，推動校園導師制度、社區心理諮詢站、家庭教育中心等多元支持網絡，並強化社工、教師、心理師的培訓與待遇，保障第一線工作者的專業與穩定性。

總結而言，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預防應強調早期識別、教育引導、家庭功能強化、網路環境治理與社會整合治理。學校應建立完整行為監測系統，對有偏差風險的學生提供一對一輔導與行為矯正服務；家庭應落實親職教育與親子溝通支持；政府則應整合各部門資源，強化社會系統協作與法規配套，形塑青少年健康成長的支持性社會環境。唯有如此，方能有效降低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發生率，促進其正向發展與社會融合。

## 伍、結論與建議

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產生往往與家庭、學校及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對社會治安與青少年自身成長皆具有深遠影響。本研究探討現行輔導策略的成效與限制，期望提供具體建議以改善青少年偏差行為問題。研究結果顯示，現行輔導策略在執行上雖有成效，但仍面臨資源不足、跨單位合作不順暢及輔導方法單一等挑戰。因此，本研究發現，歸納影響輔導成效的關鍵因素，並針對政策制定與執行層面提出具體建議，以期促進學校、家庭及社會資源間的和諧共作，進一步建構完善的青少年輔導機制，減少偏差行為的發生。

### 一、研究結論

本節將從文獻探討及現行實務之面相作切入，並以犯罪預防為中心思想作結論，概述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多樣行程原因、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教育現象以及

相關法規針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預防效果，作出本研究之相關結論。

### (一)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多因性

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研究涵蓋心理學、社會學與犯罪學等多個學科，每個學科基於其獨特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對此現象有不同的定義與詮釋。心理學主要關注內在心理發展和情緒控制的問題，認為偏差行為可能源自人格特質、情緒管理困難或心理健康問題。社會學則從社會環境、社會結構和社會化過程的視角出發，探討外部條件如何影響青少年行為。犯罪學則聚焦於法律規範、社會控制機制的不足，以及偏差行為的學習與模仿過程。綜合這些學科的視角可以發現，青少年偏差行為是一種多因性現象，是內在心理、外在環境與社會結構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因此，探討偏差行為的成因與干預策略時，需採取多元整合的方式，從多角度全面分析與應對。

### (二)現行青少年偏差行為之教育措施

我國在應對青少年偏差行為方面，結合了教育、法律、心理輔導和社會服務等多重策略，以預防和矯正偏差行為。這些措施主要從學校教育、家庭參與、社會支援及政府政策等層面展開，形成一套系統性的干預機制，旨在幫助青少年改正行為，重回健康成長的軌道。然而，持續檢視成效與改進措施，仍是確保青少年健康成長的關鍵。唯有透過跨部門合作與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才能有效降低偏差行為的發生率，並為青少年創造更加友善的成長環境。

### (三)現行青少年偏差行為之法規效果

青少年偏差行為從保護、教育、矯正與懲戒等多層面進行干預。為進一步提升現行法規的保護效果，應加強專業人力與經費的投入，特別是在高風險地區與群體中提供更多的支持資源。同時，應強化部門間的協作機制，建立一個跨領域整合的青少年保護網絡，確保相關措施能夠快速且全面地到位。此外，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應共同推動對社會的宣導與教育，減少對偏差行為青少年的歧視與標籤化，進一步促進其身心健康與社會適應能力的提升。

總體而言，現行法規在保護效果上已展現出一定的成效，通過立法保障、教育輔導與社會支持等多方面措施。然而，隨著社會環境與挑戰的變化，只有持續完善法規內容與執行機制，才能使其在保護青少年方面發揮更長遠與深遠的作用。

## 二、研究建議

### (一)針對教育端之建議

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問題一直是社會治安與教育界的重大挑戰，如何有效預防與矯正青少年的偏差行為，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針對這一問題，結合教育實務與犯罪預防學的觀點，從教育端出發，提出一系列具體建議，是提升青少年行為發展的重要途徑。

綜上言之，針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教育端建議應該從多方面入手，結合教育實務經驗與犯罪預防學理論，強化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同儕影響與社會支持系統，並通過早期干預與綜合治理來預防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發生。

### (二)針對政策端之建議

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問題對社會安全及個人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因此，如何有效預防和矯正這些行為，已成為政府和社會各界亟需解決的問題。針對政策端的建議，需要結合教育實務經驗和犯罪預防學的理論，提出一系列綜合措施，以期能在全社會層面上達成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有效預防和矯正。

綜上言之，針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政策端建議應該從多方面入手，結合教育實務經驗與犯罪預防學的理論，強化預警機制、學校支持、家庭教育、社會環境監管以及跨部門合作等措施，以達到全面預防與有效矯正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目標。

### (三)針對社會端之建議

此外，社會環境，特別是網絡和媒體的影響，對青少年行為的形成也具有深遠影響，因此，對網絡內容進行有效的監管，並加強青少年網絡素養的培養，

將有助於減少青少年受不良資訊影響的風險。在政策層面，政府應該建立完善的青少年行為預警系統，並加強跨部門的協作，形成一個多方參與的綜合治理網絡。

根據教育的實務經驗，及早識別並介入具有偏差行為風險的青少年，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其行為的惡化。綜上所述，將教育、家庭、社會與執法機構的資源有效整合，才能夠為青少年創造一個健康、積極的成長環境，幫助他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與行為規範，從而減少偏差行為的發生。



## 參考文獻

### 中文

- 王柏頌、劉育璋（2018）。**青少年歷程發展及偏差行為**。台北：紅葉文化。
- 王曉梅（2021）。團體輔導對青少年情緒管理的效果研究。**應用心理學報**，**39(1)**，102-115。
- 王馨婷（2017）。師生關係與學生逃學行為：中學生的調查與分析。**教育心理學研究**，**39(1)**，88-104。
- 內政部警政署統計通報（2021）。**青少年犯罪人口率及嫌疑犯人數占比圖**。取自：  
<https://www.npa.gov.tw/ch/app/data/list?module=wg057&id=2218&page=0&pageSize=15>
- 內政部警政署（2022）。**青少年犯罪表人口及嫌疑犯人數占比統計**。取自：  
<https://www.npa.gov.tw/ch/app/data/list?module=wg057&id=2218&page=0&pageSize=1>
- 全國法規資料庫，**警察勤務條例**。取自：<https://law.moj.gov.tw/>
- 江明慧（2010）。**教師負面評價、同儕關係對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影響**(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臺南市。
- 石文宜（2006）。**國中生人格特質、師生互動關係與偏差行為之關係**(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大學，台北市。
- 內政部警政署統計通報（2021）。**近5年青少年犯罪概況**。取自：  
<https://www.npa.gov.tw/ch/app/data/list?module=wg057&id=2218&page=0&pageSize=15>
- 李克東、黃光雄（2003）。**教育研究方法**。台北：心理。
- 李志華（2019）。同儕壓力與青少年犯罪行為。**犯罪研究學刊**，**12(4)**，98-115。
- 李志華（2019）。青少年同儕互動與行為偏差分析。**社會學研究**，**12(3)**，78-92。
- 李茂生（2000）。少年犯罪的預防與矯治制度的批判——一個系統論的考察。**臺大法學論叢**，**29(2)**，79-96。
- 李茂生（2005）。青少年家庭結構變動與行為偏差的相關研究。**家庭研究期刊**，**13(4)**，45-62。
- 李茂生（2005）。校園壓力對青少年心理健康與逃學行為的影響。**教育研究季刊**，**22(4)**，56-73。
- 吳武典（1993）。**青少年問題與對策**。台北：張老師。
-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取自：<https://www.hpa.gov.tw/Home/Index.aspx>
- 林育陞（2016）。從正向心理觀點看到認知行為治療對負向認知調整與復原之探討。**諮商與輔導**，**365**，7-12。

- 林怡禮、陳嘉彌 (2001)。青少年問題行為與對策-42個案例討論。台北：揚智
- 林朝夫 (1995)。偏差行為輔導與個案研究。台北：心理。
- 林聰明 (2019)。質性研究法應用於教育與社會現象之探討。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35(2)，45-62。
- 徐美玲 (2007)。青少年早期社會關係與其心理健康、偏差行為、快樂感相關性之探討。新臺北護理期刊，9(2)，23-34。
- 張春興 (2007)。張氏心理辭典。東華。
- 張美慧 (2012)。家庭教育對青少年心理健康與行為發展的影響。教育心理學季刊，28(3)，211-230。
- 張書華 (2021)。青少年抽菸行為與情緒調節策略的關聯性。應用心理學研究，37(2)，134-152。
- 張淑綺 (2000)。我是誰？青少年的再現－以平面媒體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新北市。
- 張景然 (2001)。青少年犯罪學 (第二版)。台北：巨流。
- 張華葆 (1991)。少年犯罪預防與矯治。台北：心理。
- 張雲龍 (2016)。家庭與學校知覺影響高中職生偏差行為之探討。輔導與諮商學報，38(1)，53-82。
- 張楓明 (1999)。社會控制與少年偏差行為－以雲嘉地區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南華大學，嘉義縣。
- 張瓊芳 (2018)。文獻分析法在學術研究中的應用及挑戰。社會科學評論，26(3)，98-115。
- 許春金 (2003)。犯罪學。台北：三民。
- 許春金 (2007)。犯罪學。台北：三民。
- 許春金 (2010)。人本犯罪學。台北：三民。
- 郭靜晃、吳幸玲 (1993)。發展心理學：心理社會理論與實務。台北：揚智
- 陳建文 (2018)。青少年行為與神經心理發展。台北：心理。
- 陳淑芬 (2020)。家庭參與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心理與教育研究，45(2)，34-48。
- 陳淑芬 (2020)。家庭結構對青少年行為偏差的影響。社會科學期刊，58(3)，45-62。
- 陳麗萍 (2015)。父母教養方式與青少年翹家行為之探討。教育與心理學報，29(2)，101-120。
- 陳麗萍 (2015)。校園霸凌對受害學生心理與行為影響的研究。心理學報，29(3)，241-258。
- 彭怡芳、曾玉貞 (2003)。偏差行為之定義。載於台灣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剖析。

- 黃永輝(2010)。青少年逃學行為的成因與干預策略研究。**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6(2)**，73-92。
- 黃志成(2018)。青少年逃學行為之成因與對策。台北：心理。
- 黃德祥(2016)。青少年發展與輔導精要(第一版第十五刷)。台北：五南。
- 董旭英(2000)青少年偏差行為成因研究：驗證一般化緊張理論的實證性。**犯罪學期刊**，**6(1)**，89-128。
- 趙雍生(1997)。社為變遷下的少年偏差與犯罪。台北：桂冠。
- 齊力、董旭英(2003)。台灣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剖析。南華大學，嘉義縣。
- 劉怡欣(2019)。青少年校園霸凌與逃學行為之關聯探討。**教育與心理學期刊**，**11(1)**，15-29。
- 劉俊輝(2019)。吸菸文化與青少年行為模式分析。**東亞社會學研究**，**14(2)**，67-82。
- 蔡文貴、余元傑(2010)。社會問題。台北：一心文化。
- 蔡茂松(2013)。臺灣青少年學業壓力與逃學行為相關研究。**教育與心理學報**，**45(2)**，101-120。
- 蔡墩銘(2003)。青少年翹家行為與家庭功能的關係研究。**心理學報**，**25(3)**，56-68。
- 蕭孟平、黃國彰(2020)。青少年偏差行為成因探討及防範。**諮商與輔導**，**418**，35-38。
- 賴慧敏、鄭博文、陳清檳(2017)臺灣青少年憂鬱情緒與偏差行為之縱貫性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8(3)**，370-426。

## 外文

- Bandura, A.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Bandy, S. (2008). Community initiatives in reducing juvenile crime. *Social Work in Public Health*, 22(4), 33-48.
- Baumrind, D. (1991). Parenting styles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In J. Brooks-Gunn, R. M. Lerner, & A. C. Peterson (Eds.), *The encyclopedia of adolescence*, 746-758. New York: Garland.
- Becker, H. S. (1963).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Free Press Glencoe.
- Boote, D. N., & Beile, P. (2005). Scholars before researchers: On the centrality of the dissertation literature review in research prepar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4(6), 3-15.
- Cohen, L. E., & Felson, M. (1979). Social change and crime rate trends: A routine

- activities approa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4), 588-608.
- Creswell, J. W. (2013).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 (3r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emo, D. H., & Acock, A. C. (1988). The impact of divorce on 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0(3), 619-648.
-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2018).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5th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Eckman, P. (2005). *Emotions revealed: Recognizing faces and feelings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al life*. Henry Holt and Company.
-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 Evans, G. W. (2004). The environment of childhood pover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9(2), 77-92.
- Finn, J. D. (1989). Withdrawing from school.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9(2), 117-142.
- Foster, H. (2012). The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on juvenile delinquency. *Sociology of Education*, 59(3), 285-300.
- Griffiths, M. D. (2013). *Self-control theory and crime: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self-control in criminal behavior*. Springer.
- Hirschi, T. (1969). *Causes of delinquenc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mert, E. M. (1951). Primary and secondary deviation. In E. Rubington, & M. S. Weinberg (Eds.), *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 Seven perspectives*, 192-19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ccoby, E. E., & Martin, J. A. (1983).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P. H. Mussen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1-101. New York: Wiley.
- Matza, D. (1964). *Delinquency and Drift*. New York, NY: John Wiley and Sons.
- Merton, R. K. (1938).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 672-682.
- Rigby, K. (2000). Effects of peer victimization in school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n adolescent well-being.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3(1), 57-68.
- Wentzel, K. R. (1998).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motivation in middle school: The role of parents, teachers, and peer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0(2), 202-209.

## 研究紀要

# 以 AI 繪圖課程共創社區新景觀之問題本位學習 實踐研究\*

徐雁

靜宜大學原住民族健康與社會福利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汪淑珍<sup>1</sup>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廖啓旭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博士

---

收稿日期：2024 年 03 月 18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4 年 07 月 29 日。

\*本文作者團隊的排序已經過討論確認。

<sup>1</sup> 本文通訊作者為汪淑珍：scwang3@pu.edu.tw。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正意見。

## 中文摘要

2023 年 AI 在全球蓬勃發展得到廣泛應用。許多創作的技術要求門檻也因 AI 的介入大幅度降低。如何善用 AI，使 AI 成為人類創意與創作工作的最佳助手，仍需要使用者擁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並掌握相關技術。在學校端的教師該如何將此 AI 創新技術教導學生，並使學生有能力善用 AI 工具，甚至以 AI 激發創意、提高效率。如果將此技術帶入社區，與社區展開密切合作，將有效的幫助社區進行活化與創新。本研究以學生團隊合作共創的執行方式，結合場域進行跨領域課程培訓設計，以問題導向學習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 模式，由小組成員的互動反饋，探悉 AI 繪圖工具的使用與創意發想，並輔以 Lindgren 與 Suter (1985) 的發現學習 (guided discovery) 概念設計教學，以落實學術與實務之結合。由研究結果可明顯看出 AI 利於創新想法的延伸與實踐，無異於日後可作為深入引導學生思考探究的思考工具箱。AI 協助進行創意發想，能快速高效的展開畫面構圖與色彩的各種嘗試，以利與目標對象進行有效的視覺溝通，再進行迭代創作修正，以更符合實際需求。學生透過主動參與解決社區景觀之真實議題，累積跨領域合作的實務經驗，讓學生有能力將所學之理論知識進行適切之轉化應用，發揮知識的實際效能，蓄積未來職業生涯中的量能，提升就業競爭力。也藉此激發學生啟動自主學習的能力，未來成為數位人文的實踐者。

**關鍵詞：** AI 繪圖、社區、問題導向學習、發現學習

# **A Practical Study on Problem-Based Learning to Create a New Community Landscape Using AI Drawing Courses**

**Xu Yan**

Student of Ph.D. Program in 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for Indigenous Peoples,  
Providence University

**Wang Shu-ch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Providence University

**Liao Qi-xu**

Ph.D,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2023, AI flourished and was widely used in the world.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threshold for many creations has also been greatly reduced due to the intervention of AI. How to make good use of AI to make AI the best assistant for human creativity and creative work still requires users to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ing relevant technologies. How teachers at school should teach students this AI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make students have the ability to make good use of AI tools, and even stimulate creativity and improve efficiency with AI. If this technology is brought into the community and close cooperation with the community, it will effectively help the community to revitalize and innovate.

This study uses the operation mode of student team cooperation and co-creation, combined with the field to carry out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training design, problem-oriented learning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 mode, with the interactive feedback of the group members to explore the use and creativity of AI drawing tools, and It is supplemented by Lindgren and Suter (1985) guided discovery conceptual design teaching to implement the combination of academic and practical practice.

From the research results, it can be clearly seen that AI is conducive to the extension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ve ideas, which can be used as a thinking toolbox to guide students to think and explore in depth in the future. AI assists in creative thinking, can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carry out various attempts of picture composition and color, so as to facilitate effective visu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target object, and then carry out iterative creation and correction to better meet the actual needs.

By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solving the real problems of the community landscape, students accumulat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so that students have the ability to properly transform and apply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they have learne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knowledge, accumulate creative energy in future careers, and improve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It also stimulates students' ability to start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become digital humanities practitioner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AI drawing, community, problem-oriented learning, discovery learning

##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面對資訊快速發展，社會議題多元複雜，產業所需多為跨域人才。正如翟本瑞所說：「要知道，在知識爆炸的當前，任何大學四年時間，不可能把所有特定領域的專業都教完。充其量，只能把專業的知識框架讓學生掌握到，讓他們在未來面對專業議題時，能在知識框架中找到適當位置，以利深入理解，同時知道要到那裏找尋答案，或是能用相同思維與術語，和其他人溝通以利團隊合作。這意味著，大學應從『知識傳授』轉型成為『能力培養』，在能力培養過程中兼顧專業知識的內涵，而不是僅以專業知識為唯一目標。」(翟本瑞，2023)

2023 年 AI 在全球蓬勃發展得到廣泛應用。許多創作的技術要求門檻也因 AI 的介入大幅度降低。例如可輸入文字指令請 AI 進行音樂、寫作、繪畫的自動生成。「創作」對一般人而言已不再難以參與。但如何了解 AI 的限制與相關規範並善用 AI，使 AI 成為人類創意與創作工作的最佳助手，仍需要使用者擁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並掌握相關技術。在學校端的教師該如何將此 AI 創新技術教導學生，並使學生有能力善用 AI 工具，甚至以 AI 激發創意、提高效率、節省時間。

任何工具的學習與使用都是在不斷實踐中落實。在實踐場域的選擇上，由於台灣有許多社區亟需活化與協助，學校與社區若能相互合作，以 AI 進行互協，將 AI 相關技術帶入社區，注入創新活水，幫助社區進行改造，則將開啟社區另一新扉頁。

2016 年國發會提出「地方創生」計畫，參考日本經驗，期待提升地方能量，人才回流，活化地方。台灣於 2019 年訂為「台灣地方創生元年」，援引日本安倍政府所實行之「地方創生」概念，為地方的產業困境、人口外移，提前進行相對應準備，並積極培育地方創生所需之相關人才。「地方創生不只是設計商品，而是設計『生活體驗』、『文化創新』，可歸納出地方創生 10 個重要元素：食、住、衣、農、健康、環境、療癒、藝術、遊、集。若能將這 10 個元素融入地方，便能創造出『無可取代的地方特色』，讓離鄉的人願意回流，讓外來的人



願意再次造訪，讓在地的人願意停留，透過設計『場域』的『體驗』（祭典、飲食、藝術文化）」，讓『人』對『土地』產生參與感、榮譽感與認同感，進而發展出正向的經濟循環。」（徐重仁，2018）。欲協助地方創生，須盤點社區能力及資源，並找到其專屬 DNA 及其缺口，進而引進各方資源加以串聯，以進行社會創新、社區再造，賦予地方嶄新面貌。「大學」在此扮演人才培育的角色，若可積極導入符合時代所需的創新教學工具或教學方法與技術，將可協助培養學生擁有因應社會變遷的能力。

新時代需有符應新時代的帶領與引導之教學方式，「在 Bruner 的教學理論裡，Bruner 十分關切如何激發學習者的思考能力。Bruner 主張，學校裡的老師應該幫助學生成為一位主動而能自我推進的思考者，學生能用自己的思考去發現所有形式的知識，因此，在此處所謂的『發現』，並不只是侷限於『發現』人類未知的知識。Bruner 認為，有些特定的家庭與學校氣氛較有利於激發學習者的思考能力。老師的職責便是營造利於激發學生思考能力的學習情境。」（張新仁、邱上真、張酒雄、方吉正、莊麗娟、簡妙娟...、李長燦，2003）。

李宏毅認為「未來用 AI 的人將分成 3 種等級：我要做什麼？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要如何做到它。後者將變得愈來愈不重要，創意和策略思考將更為吃重。」<sup>1</sup>為了培養學生擁有未來創新工作型態人才所需之能力，本研究將以 2023 年 11 月靜宜大學二位教師（國際學院寰宇外語教育徐雁老師、中文系汪淑珍老師）和專案顧問廖啓旭老師所帶領的一組學生團隊（靜宜學生壁畫創意團隊）以下簡稱「壁畫創意團隊」，進行社區合作之專案。以學生團隊合作共創的執行方式，結合場域進行跨領域課程培訓設計，以落實學術與實務之結合。

師生團隊與台中清水區裕嘉里社區里長和居民共同進行社區牆面創新繪製。繪製過程將以傳統人文知識、社區文化為主軸，AI 進行創意與創新加值，輻射出跨領域之能量，為培育新世代之學子成為跨領域之創新人才。學生成員來自台文系、中文系、應化系，本團隊學生以跨科系組成方式，期待培養同學

<sup>1</sup> 漢儒·薩爾彌 (Hannu Salmi) 著；范純武，湯瑞弘譯〈導讀〉《何謂數位歷史學？現在我們是數位歷史學家》（台北：貓頭鷹出版，2024 年 2 月），頁 13-14。

們擁有跨領域系統思維與解決問題能力。

本研究藉由問題導向學習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 模式，經由團隊小組成員的互動反饋，探悉 AI 繪圖工具的使用與創意發想。並輔以 Lindgren 與 Suter (1985) 的發現學習 (guided discovery) 概念設計教學。本研究與現實場域結合，引導學生發覺社會相關議題，瞭解「永續發展」的重要性，培養公共參與的能力，並將此成果轉化為參與競賽之作品。

## 貳、教學方法設計理念與理論基礎

本研究的教學理論為 Bruner 所提出之發現式學習 (discovery learning)。根據張新仁等 (2003) 學者的論述，發現式學習的概念乃屬重視學生為導向的學習、強調學習的主動性並主張開放式的教育。認為人類的學習，絕不僅僅是機械式的記憶或者是刺激與反應之間的制約而已。所謂的學習，應該是學習者透過與環境的互動，主動探索各種不同的資訊。Bruner 所關切的主題在於人類如何主動地選擇、保留並轉換知識，並能超越具體的資訊，而獲致抽象的領悟與理解。

因此本研究教師在規劃發現式學習的做法中，先建構一個訊息豐富的環境，讓學生在自由活動中進行學習。在這環境中，教師並不直接給學生一個已完全整理好的知識體系，而只是提供充分但尚未組織好的訊息給學生，然後讓學生主動地去「發現」這些訊息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建構對知識結構的理解 (張新仁等，2003)。

本研究中教師帶領學生以 AI 生圖並迭代修正，而後完成社區彩繪設計與施作。在議題發想與繪圖設計甚至實際操作，皆邀請社區人員加入，讓社區夥伴對此活動更有參與感，共同為創造社區人文新景觀貢獻心力。Hitsuwari 等人 (2023) 在論文中指出「人工智慧的協助可以促進創造力，幫助藝術家生成品質更好的藝術作品，相似的論文如 Booten 與 Geroy 在 2021 年的研究，也同樣

指出人類與 AI 的共同創作，可以生產更多具創意的作品。有了人類的介入之後，想必也帶入了某些人類獨有的經驗進入到作品當中，因而更能使得藝術欣賞者產生共鳴。」<sup>2</sup>

本研究所建立的 AI 共創教學模式將可提供 USR 計劃、社區營造與在地創生借鑒參考。而學生團隊在完成此專案的過程中，將傳統被動學習的歷程轉化為主動解決問題的深入探究，將產生的創意與科技結合，融合 AI 工具以及設計思考、水平思考的概念，成功突破本身思考框架。畢竟「創造力的培養不只是用想的，還需要有知識做為燃料，加上對於真實世界廣泛的認識，能擁有在不同知識領域自由轉換的創造力。」(陳雅慧、賓靜蓀、溫怡玲、親子天下，2023) 本研究讓學生做中學、畫中學，以應用導向的訓練進行學習，賦予創意有更遼闊的想像以及更多元的實踐。

### 參、教學方法設計結構與內容

本研究以問題導向學習 (PBL) 的概念規劃課程教學設計，透過小組學習模式以及 AI 繪圖工具的教學與導入，加上結合在地場域作為實踐標的，如圖 1 所示。PBL 的大方向包括：一、問題設定 (problem sets)：保持問題的開放性，讓學生推導出可能的答案；二、個案研究 (case study)：讓學生先瞭解個案，排除初步問題，然後發現新問題，進一步獲得解決，如此不斷循環，直到滿意為止；三、深度學習 (immersion in a topic)：學生藉由圖書、網路以及和導師或同儕的討論，使其保持學習狀態；四、團體合作 (group work)：藉由小組之間的討論，讓各種意見彼此激盪，導師只需引導每個人思考與交流。(閻自安，2015)

<sup>2</sup> 王冠云 (2023 年 11 月 2 日)。面對 AI 近乎完美的作品，為什麼我們還是更喜歡人類的藝術創作？【TNL Mediagene 關鍵評論網】。取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93963>。2023 年 11 月 17 日查詢。



圖 1：本研究課程教學設計規劃

教師在課程開始之前，同時進行課程內容準備以及與在地社區相關人員先進行觀念溝通。在課程開始後，以 PBL 的作法帶領小組團隊進行協助在地社區以彩繪牆達成「在地文創」。在這過程中，教師引導學生定義問題、創意發想、小組腦力激盪與互動，以及協助與在地里長進行對話。過去在創意發想的階段多數是依賴小組成員之間的腦力激盪以及教師傳授相關知識。然而，傳統的方法常面臨小組成員同質性高，雖然也會有創新想法，但是往往受限本身的經歷與知識範疇，導致在小組討論時，創意延伸有侷限性。為了可以擴展創意的多元性，培育學生跨域思考的能力，透過導入 AI 生圖輔助設計（AIGC）相關工具，作為觸發創意的來源。

「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 的概念和技術背景：AIGC 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生成的各種內容，例如文章、詩歌、故事、視頻、音樂和圖像等，此技術的核心在於利用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模型，通過分析龐大的數據庫和訓練資料，讓機器能夠學習並模仿人類的創作風格、語言結構和情感表達，這樣的技術突破了傳統上人類創作的限制，並在生成內容的質量和多樣性上取得了重大突破。」<sup>3</sup>

這類工具的使用，不僅可以幫助學生從語言、文字轉換成圖像、影像，更可以藉著 AI 工具的天馬行空，突破本身思維的限制，顯著提升創造力的想像空間。然而 AI 能夠用得好，關鍵在於先問對問題，且需蒐集相關資料與素材

<sup>3</sup> <https://maxfinanciallife.com/aigc/> 2023 年 10 月 10 日查詢。

進行參考。老師在此過程扮演教練角色，引導、陪伴學生，關懷並鼓勵給予信心。也讓其有機會體會人機合作的工作模式。

## 肆、教學方法實踐模式

Bruner 強調教育的歷程便是協助學生掌握知識的結構。Bruner 認為當學生經由協助而發現並掌握知識的整體結構時，學生會對其所習得的知識有較好的記憶、較深的理解以及較有效的學習遷移。(張新仁等，2003)。這種發現式學習在教學上的應用相當廣泛，它重視概念的獲得、知識結構的發現以及思考方式的訓練。本課程的設計即是透過不同教學主題的工作坊，讓學生建構學習概念以及本身的知識結構。同時教師更帶領學生以問題本位學習的教學模式進行學習。步驟為：一、組成小組，二、研讀問題，三、分析假設，四、建立議題，五、採取行動，六、反思檢討，七、修正問題，八、再次行動等。(閻自安，2015)我們也綜合 Lindgren 與 Suter (1985) 的發現學習概念設計教學方法：

- 一、老師提出問題，要求學生使用邏輯，檢驗學生自行設定的假設、結論與推理。
- 二、安排一系列的問題，逐漸增加難度，以引導學生達到正確地找到原理、原則的程度。
- 三、提供原則給學生，然後讓學生想出例子。或者提供例子，讓學生思考為原則。
- 四、給學生一些方向或線索，以引導『發現』知識。
- 五、提供示範、特殊活動或其他種類的經驗，以激發學生發現知識。」(張新仁等，2003)。

在執行上，我們訓練學生團隊進行社區訪談，踏查蒐集地方人、文、地、產、景等在地元素，並進行閱讀、詮釋。同時學習多元 AI 生圖方式，輔以美

學與藝術設計原則，將代表社區精神的核心理念進行視覺圖像的轉譯，形成具體可視化大型原創彩繪壁畫作品。

比吉斯說：「若要有適當的後設認知，學生應該真切意識到自己有什麼認知資源可以協助自己完成任務，然後去規劃、監看及掌控這些資訊，這種對自我學習歷程的意識及掌控，比吉斯稱之為後設學習。...指一個人知道自己用什麼策略來促進或引導自我學習，.....學生，是否意識到自己是用什麼思考活動來促進學習，解決問題，做決策及辦判斷，這包括學習技巧，找出提取記憶及知識的策略」(Ritchhart, Church, Morrison, 2019)。團隊以 AI 生圖為靈感，進行多次草圖設計與修改，再與現場合成模擬草圖，與里長及社區協助人員，進行多次創作理念與設計風格的溝通。在課程實踐過程中，逐步培養學生設計思考應用及數位創作能力。

	
台中沙鹿興安社區「大地之母-和樂共融」	台中沙鹿興安社區「食農教育四季繪本故事牆」
	
彰化縣大村私立聖家啟智中心「歡樂動物星球」	台中福智員工餐廳「幸福餐桌」



圖 2：不同社區合作之壁畫作品

「壁畫創意團隊」，過去 2 年（2021-2022）已完成多幅與不同社區合作之壁畫作品，展現出社區之在地精神與獨特風格，如圖 2 所示。惟過去皆以實際進行人工草圖繪製與修改，需花費較長的時間調整以達到社區期待之成果。加上學生創意的來源非常偏重先備知識，往往也遇到創意不足，靈感枯竭的窘境。本次導入 AIGC 的方式，以提高效率。

綜合 Bruner、Lindgren 與 Suter 學者的概念並加入 AI 科技元素，本實作課程的設計規劃，分三行動進行，說明如下：

#### 行動一：擬定教學計劃

教師在備課時與場域互動決定實作主題。課程規劃包括組成學生團，並積極與社區召開工作會議、設計草圖與社區討論、安排進入社區實作等。相關行動說明如下：

1. 蒐羅社區相關資料與圖片，進行閱讀與分析。
2. 場勘、拍照，教師與社區彩繪案負責人互動並建立良好的信任與合作關係。
3. 教師與社區負責人深入討論社區對壁畫的想像、社區的願景、社區在地

精神、代表性的植物、動物與文化符號等，以及社區想要的繪畫藝術風格。初步擬定彩繪日期與備用日期（戶外需晴天）。

4. 學生團隊召開線上會議或實體會議，依據現場照片與社區關鍵字，利用多元 AI 圖畫自動生成平臺，進行 AI 意象草圖模擬與手繪草圖構思。
5. 彩繪團隊與社區召開工作會議，討論 AIGC 合成意象圖與設計草圖是否符合社區精神與對未來的想像，確定需要修改的部分與細節。
6. 「壁畫創意團隊」修改設計草圖，運用 AI 與繪圖軟體進行各種色彩的模擬，並將彩色設計效果圖合成在現有牆面產生成果示意圖，提供社區人員確認，並再次提供建議。
7. 教師與社區確認彩色設計圖，提供社區購買所需的水性油漆色彩名稱清單與數量，如筆刷尺寸與數量等用具相關之細節。
8. 擬定日期進入社區彩繪。
9. 可邀請社區長者或孩童參與，「壁畫創意團隊」也藉此累積陪伴長者青銀共創的經驗，在地長者參與，也讓壁畫作品真正成為師生與社區共創的作品。
10. 「壁畫創意團隊」分多日進場彩繪，最後進行藝術氛圍與風格的統整，完成壁畫。

## 行動二：知識建構——AIGC 訓練課程

學生團隊參與 AIGC 訓練課程，由老師帶領各種 AI 工具的實作教學工坊，讓學生熟悉各種 AI 創作工具的優缺點與特色。讓不擅長繪畫的同學，也能參與草圖與構思，為社區壁畫創作，做好充分準備。AI 意象草圖模擬與手繪草圖構思如圖 3 所示。本研究 AI 融入設計構思與草圖設計，運用之 AI 繪圖工具有：Playground AI、Moonshot、Bing Image Creator、Dream AI 等。

「壁畫創意團隊」創作前在 AI 生圖網頁與 APP 中輸入關鍵字，讓 AI 生成客製化的意象設計草圖，節省手繪不同風格創意草圖的大量時間，大幅提高工作效率，縮短工作流程與完成時間，但同時也意味著未來中階以下較平庸的創作者或不曾運用 AI 提高效率的人，將會被 AI 取代。學生在專案創作歷程中，



嘗試多種 AI 生圖工具與平臺，熟悉各種 AI 工具操作應用並瞭解其優缺點，通過與 AI 協作的實際演練，累積人機協作的實戰經驗，增進自身靈活運用 AI 工具共創的信心。







AI 意象草圖模擬	手繪草圖構思
	
	
	

圖 3：AI 意象草圖模擬與手繪草圖構思

### 行動三：創意迭代調整

「壁畫創意團隊」與社區定期召開工作會議，討論 AIGC 合成意象圖與設計草圖是否符合社區精神與對未來的想像，確定需要修改的細節。修改後再次確認，務期達到社區團隊人員確認可行，方進行實際彩繪。學生彩繪團隊不斷修改設計草圖，運用 AI 與繪圖軟體進行各種色彩的模擬，並將彩色設計效果圖合成在現有牆面照片上。如圖 4 所示，最終完成實際的作品如圖 5 所示。



圖 4：色彩模擬並合成於現實牆壁



圖 5：課程最終實際作品

本研究評量方式有二：教師評量與學員本身及同儕評量。教師評量的方式，以繪畫知識學習、AI 工具使用與創意發想以及現場彩繪實作進行三階段評估。根據本課程 12 堂工作坊，「繪畫知識學習階段」包括：團隊合作工坊、繪畫創意工坊、繪畫構圖工坊、繪畫色彩工坊、繪畫潛能開發工坊；「AI 工具使用與創意發想階段」包括：AI 繪圖工具與技巧、AI 繪圖與設計進階、社區彩繪牆草圖設計、社區彩繪牆色彩設計；「現場彩繪實作階段」包括：社區彩繪實作——構圖與色彩、色彩與細節、統整與收尾。

學員本身及同儕評估，以質性反思的方式，請學生在每次的會議討論與現場實作後提出自己的感受及想法；同儕評估則是在課程結束後，請所有成員對於整體課程的參與過程提出反思及對於同儕的評價。

## 伍、結果與建議

經過帶領 PBL 學生團隊共同完成社區彩繪，我們得到以下四點反思：

### 一、役物不役於物

善用 AI 生圖工具有助於創意生成，不僅大幅提高了設計團隊前期創意發想，對於中期草圖設計階段的工作效率也有大幅提升。AI 生成圖清晰的意象與色彩，讓團隊在和社區人員的溝通會議中，事半功倍。學生團隊再依據對 AI 生成圖討論後的建議，進行手繪設計草圖，著重加入人性對於美的獨特解讀，形成第一稿手繪設計草圖。

但需要特別留意和社區清楚溝通 AI 生成圖並非我們要實際作畫的最後彩繪設計圖。我們的 AI 合成圖主要是提供給社區一個設計意象的視覺參考，在現場粗糙的牆面上，實際作畫要達到 AI 般寫實細膩的境界並不容易達成，也需要更多倍的時間以及高超的寫實技巧。因此我們在有限的實際作畫時間裡會以寫實精細的 AI 意象為參考，進行精煉且具藝術性的風格設計，融入團隊成員獨特的創造力與表現力，如此才能完成美好作品。

未來 AI 生成圖的使用將會越來越普遍，許多的 AI 作品與人類的作品相比，有時難以辨別，甚至可以一較高下或是超越。但是人類的創造力是最寶貴的資產，如何使學生在一邊享受 AI 工具所帶來的便利；一邊不受 AI 工具的影響，直接進行抄襲或魚目混珠，此點觀念是教師必須讓學生在學習中建立。當然還有著作權與版權相關的正確觀念，亦需擁有，才能正確且合理地使用 AI 工具。

### 二、實踐激發學生自主學習

老師的主題引導與適時讚美，能有效幫助學生團隊增加凝聚力與向心力，讓學生從草圖階段展開大膽創作嘗試，充分給予學生發揮創意與揮灑色彩的自由。讓彩繪作品從一開始就是學生團隊的共創成果，而不是由老師一人完成設計，學生只是幫忙描繪其中一部分的小配角。

鼓勵學生共學共創，營造樂於分享與連結的豐盛心靈體驗，帶領學生深入社區，一起為社區新景觀貢獻心力。解決社區真實問題的專案學習最能調動學生學習自主性，激發學生能動性與好奇心，累積學生與場域合作的經驗與實力，為未來接軌職場預作準備。

未來真正需要的核心能力是思考力與創造力，在這沒有正確答案的真實世界裡，場域實作鍛鍊思考力、創造力與行動力，訓練學生以創意解決問題的能力，是培養學生跨領域合作，綜合能力的最佳舞台。學生在場域實作中，解決社區真實的問題，紮實培育自身多元能力，未來在職場更能發揮 AI 無法取代的競爭優勢。

### 三、共創基於共識

實地參訪社區，瞭解在地特色與創作主題與需求。召開多次線上會議與社區清楚溝通討論設計圖，進場彩繪時與社區保持良好互動關係，這些為建立彼此信任的合作關係而付出的努力，都是與社區合作順利進行的重要基石。

在設計美感的部分，有時需要和社區多次溝通，清楚的表達不同設計間的優缺點，將我們身為創作者的專家意見進行清晰的拆解，引導社區人員與我們達成美感共識，才能創作社區新景觀並完成學生團隊培力雙贏的成果。

### 四、跨域教師共創課程

此一實作專案課程是由不同專長的跨領域教師共同設計而成。一位熟習在地社區的教師，加上一位人文背景的教師以及熟悉 AI 知能的教師，再連結學校的課程資源，共同為在地社區的創生尋求解決方案。這本不是單一位具有教育熱忱與專業的教師可以輕易完成。透過不同專長領域的教師進行協作，不僅可以減少教師個別的負擔，也能因為跨域知識的相互碰撞，萌發出特別的教學創意。本專案提供了教學共創的成功範例，證明了跨域教師的協作課程是可行且應該是未來的趨勢。

關於 AI 在藝術創作上的影響，我們發現 AI 理解文字後所產生的創作，與人類理解文字產生的創作，兩者之間差距甚大。在本研究中，可明顯看出 AI

利於創新想法的延伸與實踐，無異於日後可作為深入引導學生思考探究的方式之一。AI 協助進行創意發想，能快速高效的展開畫面構圖與色彩的各種嘗試，以利與客戶進行有效的視覺溝通，再進行迭代創作修正，以更符合目標對象的實際需求。

雖然未來 AI 工具將更加精進，但人性的真實經驗與複雜情感亦將更顯珍貴，人類依然能創作出最優秀的作品，記錄人類的生命體驗。人們需學習 AI 工具並巧妙運用於工作與生活，才能與時俱進，不被時代所淘汰。學生透過主動參與解決社區景觀之真實議題，累積跨領域合作的實務經驗，讓學生有能力將所學之理論知識進行適切之轉化應用，發揮知識的實際效能，蓄積未來職業生涯中的量能，提升就業競爭力。也藉此激發學生啟動自主學習的能力，未來成為數位人文的實踐者。

## 參考文獻

### 專書

- 張新仁、邱上真、張酒雄、方吉正、莊麗娟、簡妙娟...、李長燦（2003）。**學習與教學新趨勢**。臺北市：心理。
- 伍晴文（譯）（2024）。**讓思考變得可見**（原作者：Ritchhart, R., Church, M., & Morrison, K.（2019）。新北市：大家。（原著出版年：2011）
- 陳雅慧、賓靜蓀、溫怡玲、親子天下（2023）。**AI如何重塑教育:ChatGPT來了！讓孩子活出熱情，啟動真探究的內在學習**。臺北市：親子天下。
- 范純武,湯瑞弘（譯）（2024）。**何謂數位歷史學?:現在我們是數位歷史學家**（原作者：Hannu Salmi。台北：貓頭鷹。

### 期刊

- 閻自安（2015）。問題導向式行動學習的整合應用：以高等教育為例。**課程研究**，**10(1)**，51-69。
- 徐重仁（2018）。地方創生，再造幸福社會。**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6(2)**，36-43。
- 究，**10(1)**，51-69。
- 翟本瑞（2023）。做好職涯發展的準備。**I LINK通訊**，**8(10)**，22-25。

### 網路資料

- 王冠云（2023年11月2日）。**面對AI近乎完美的作品，為什麼我們還是更喜歡人類的藝術創作？【TNL Mediagene關鍵評論網】**。取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93963>



## RESEARCH ARTICLES

**Not Just Returning to School: New Perspectives on Dropout Counseling Under Socialization Theory**/Hsin-Yuan Tsai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ten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rdization" in the Ming Empire—Taking Da Ming Xuanjiao Licheng Zhaijiao Yifan (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 as the Center of Discussion**/Chang-Chen Hung

**The Harmonization of Indigenous Traditional Culinary Values with Modern Food Safety Regulations**/Po-Wei Hsu、Ying Pan、Pin-Yu Yang、Hui-Chuan Chiu、Te-Hsun Hsu

**A Study on the Prevention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Strategies for Adolescent Deviant Behavior**/An-Jen Yang、Hsiao-Chin Pan、Chun-Yen Kuo、Hui-Min Chuang、Yi-Fang Hu

## RESEARCH NOTE

**A Practical Study on Problem-Based Learning to Create a New Community Landscape Using AI Drawing Courses**/Xu Yan、Wang Shu-chen、Liao Qi-xu

###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 林思伶（靜宜大學校長）  
 總編輯 賴松輝（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  
 執行編輯 楊安仁（靜宜大學社會企業與文化創意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編輯委員 王香蘋（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教授）  
 何華欽（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李明（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汪淑珍（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胡憶蓓（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劉鶴群（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副教授）  
 賴麗娟（靜宜大學生態人文學系副教授）

出版者 靜宜大學  
 地址 (43301)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7段200號  
 電話 04-26328001#1700I ~ 17002  
 網址 <http://www.huso.pu.edu.tw/pucbess/index.htm>  
 EMAIL [pu20600@pu.edu.tw](mailto:pu20600@pu.edu.tw)

本期售價：新台幣600元／美金20元整

ISSN 2223-7461